

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
(4)

第一次社會指標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廿三日
會議地點：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研討室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週年

中華民國 臺北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

第一次社會指標研討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廿三日

目 次

一、主持人致詞

大會主持人陳昭南致詞：社會指標與實證研究 1

二、論文宣讀與討論

第一次討論會 7

主席李亦園致詞 7

論文及論文評述

陸 光：社會指標之介紹、製作與評估 9

評述：陳小紅 31

賴澤涵：從中國政治哲學思想論我國社會指標的建立 33

評述：李錫鋌 47

蕭新煌：社會指標與生活素質：回顧和批判 49

評述：張曉春 70

江玉龍、周碧娥：都市計劃的設計是鄉村發展之道 73

評述：廖正宏 80

綜合評述：葉啓政 81

自由發言 85

第二次討論會	89
主席文崇一致詞	89
論文及論文評述	
練馬可：一些選擇的社會指標：台中港區發展的初步比較分析	91
評述：謝高橋	120
瞿海源：論幾個與社會變遷有關的心理指標	123
評述：高承恕	146
王湘雲、陳寬政、蔡吉源：社會經濟地位與消費型態	149
評述：麥朝成	168
綜合評述：吳聰賢	171
自由發言	173
三、專題演講	
高菲立：社會政策與社會指標之分析：朝向實踐上的整合	179
四、附 錄	
1. 社會指標研討會會議程序	191
2. 出席人員名單	193

一、主持人致詞

大會主持人陳昭南致詞： 社會指標與實證研究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承蒙諸位學者專家，冒着暑熱來參加本研討會，個人首先要代表主辦單位表達歡迎與感謝。其次，個人不揣簡陋，願以「社會指標與實證研究」為題，作一報告，望能發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 * * * *

在我國，社會指標的觀念，有其很早的起源。遠在上古時代，當孔子提出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時，就已明示一些準繩，藉以衡量某一社會是否已經達到此種理想的社會狀況。這些準繩所涉及的範圍，雖然相當廣泛，但至少必須包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方面。自此以後，大同世界的理想，便成為我國思想界的特色。中國過去久為專制所苦，然而社會中始終能夠保持若干溫暖，即使不幸遭逢水旱兩災，民間猶能相互救助，未嘗不是這種思想所發揮的作用。迨至民國成立前後，國父一方面因襲我國固有思想，另一方面規撫歐美重要學說，進而提出建國的理想。在原則上，國父用來衡量其理想社會的準繩，計有「民有、民治、民享」三種。簡單說來，從上古到現代，中國歷來的傑出思想家，在描繪其理想社會時，莫不含有社會指標的觀念。因此，社會指標的進一步

探究或發展，實有其深遠的意義。

社會指標的觀念，雖然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但社會指標的實證研究，則至今尚不多見。比如，對於「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概念，過去學者既乏精確指明的努力，也未基於經驗資料來陳示或比較諸概念所指涉的現象，又沒本於觀察來建立各個概念間的相互關係，遑論科學的解釋或預測了。這對我國學術界而言，誠是美中不足之事。平實說來，當代學者重視實證研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無論如何，實證研究的著有成效，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近數十年來，社會科學中的每一學科，在採行實證研究所指明的特定程序後，都能擴展人類的知識領域；這不但使得人類逐漸掙脫無知或神秘的籠罩，並且能在人類自身及其生存環境上，獲得適當的解釋與顯著的改善。而對社會指標的研究者來說，從事實證研究更有其特殊的意義。某些社會學家一方面深受經濟研究上的成就所吸引，另一方面却對常人單以經濟指標來衡量社會狀況或社會變遷的習慣，深感疑慮。因此，這些社會學家遂欲繼踵經濟學家，從事實證研究，進而企圖在衡量或預測社會狀況上，建立一套社會指標，藉以代替或涵蓋經濟指標。顯然的，目前我國有關社會指標的實證研究，尚處於萌芽階段。

依據當代方法論家的見解，任何實證研究皆具有兩個目標：其中一個目標，乃是描述經驗世界，另一個目標，則在建立某些解釋及預測經驗世界的定律或理論。但是，不論描述或是建立理論，這兩者都必須奠基在概念之上。換句話說，概念是任何實證研究的基石。概念既然為任何實證研究的基石，則實證研究的首要工作，端在於探求適當的概念，藉以引導研究。這對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來說，例如社會指標這一研究領域，尤其是當務之急。然而，何種概念，方屬「適當的」概念呢？依照名方法論家韓波爾（ Carl Hempel ）的見解，一個概念若能符合實證研究所要求的標準，即可稱為適當的科學概念。而判斷一個概念是否符合實證研究所要求的標準，則有兩方面必須加以注意：一個是經驗意含（ empirical import ），另一個是系統意含（ systematical import ）。前者是指概念的構成，必須關

連著經驗現象；因為若概念隔絕著經驗現象，則研究容易淪為「拼字遊戲」。後者是指概念的構成，必須容許以定律或理論的形式，來建立解釋原理與預測原理；因為若概念缺乏此一要求，則研究易於陷入「粗略經驗主義」的謬誤中。由此說來，今後我們對於社會指標的探討，若能本著這兩種標準進行，則很有可能達成上述的兩個目標。

在西方諸國中，社會指標的實證研究，雖或可追溯到十七世紀「政治算術」的探討，但遲至一九七〇年代方才蔚為風氣；這可從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中，竟無「社會指標」這一索引而略見一斑。可是，此一領域的實證研究，西方諸國畢竟始於十數年前，因而在建構社會指標上他們所處理的問題，頗可作為我們今後研究的參考。大體說來，西方學者關於社會指標的實證研究，首在探求「適當的」概念，因而他們所處理的問題，或可分為經驗意含與系統意含來說明。然而，由於「指標」係指概念的量數（measure），因此在社會指標的任何實證研究中，其概念的構成，皆能關連著經驗現象。進一步說，概念的量數，通常都跟概念的界說，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因此，經驗意含上的問題，可以轉成界說上的問題，而來加以探討。現針對社會指標的實證研究，分別從界說與系統意含兩方面的問題，扼要敘述西方學者的各種意見，俾作我們今後研究的借鏡。

首先，就界說上的問題來說。平實而言，在選擇某種指標以測量社會狀況之先，必須明示所要測量的是何種社會狀況，而這正跟社會指標的界說，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同的界說，要求測量不同的社會狀況；測量不同的社會狀況，要求不同的量化方式。關於社會指標的界說，西方學者雖然努力了十幾年，但至今尚未能達成一致的見解，甚至，各據壁壘，相互對立。這些不同的見解，展現在下述互異的用語中：「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s）、「社會會計」（social accounts）、「社會簿記」（social bookkeeping）、「社會報告」（social reporting）、「社會趨勢」（social trends）、「生活品質」（the quality of life）等等。對於這些駢出迭陳的界說，我們或可根據「規範旨趣」（nor-

mative interest) 的肯定與否，而區分為兩大立場：一為「規範旨趣」的肯定立場，另一為「規範旨趣」的否定立場。

主張肯定立場的學者認為，除了用來描述並分析社會狀況外，社會指標的主要功用，乃在於設定社會的目標或優先順序(priorities)，評定社會方案(social program)，以及建立整個社會的均衡清單(an overall social balance sheet)。因此，他們把社會指標界定為「一種直接的福利量數(a direct measure of welfare)，……當其他情況均相同時，這些量數若往『正確方向』變動，則事務將更好，或人民的境況將更佳。如此，醫生數目或警察數目的統計量，不是社會指標；健康比率或犯罪比率，才是社會指標。」由於將那些具有直接規範旨趣的統計量，視為社會指標，所以他們以為所要測量的社會狀況，將包括(1)經濟創新的社會成本及淨報酬；(2)社會病態；(3)實現社會需要的預算；(4)經濟機會與流動(mobility)。主張否定立場的學者指出，設定社會的目標或優先順序、評定社會方案、及建立整個社會的均衡清單，基本上隸屬於「評價研究」的領域，而此一領域根本不同於社會指標的研究領域。因此，他們將社會指標界定為「社會狀況中重要層面的統計量；這些統計量，除了報告社會狀況外，既能容許時序上的比較研究，又能披露社會變遷的長期趨勢及其劇烈的波動。」由於強調社會變遷的測量或社會報告的改進，所以他們所要測量的社會狀況，將包括(1)社會參與及社會疏離；(2)社經福利；(3)時間的運用；(4)消費行為；(5)期望、滿足、及風氣等。

從上述兩種立場的簡單說明看來，關於社會指標的界說問題，尚待澄清或解決的，至少計有下述幾個方面。第一，由於社會指標的觀念，有其久遠的淵源，因而如何加以界定，方能保有其習用意義，又能降低習用意義的混淆或不一致，進而提高其意義的精確性呢？換句話說，所要測量的社會狀況，究竟要包含那幾方面才是適當的呢？第二，如何區別社會指標與社會統計量呢？第三，我們可藉某些相干特徵而將社會指標分離(disaggregate)成各種次類的社會指標，但這些次類的社會指標，是否可以構成一個「綜合指標」(aggregate indices)？若是可以的話，

則如何判定其權數 (weights) ? 第四, 社會指標既包含「客觀量數」(objective measures), 又包括「主觀量數」(subjective measure), 那麼, 如何構成國別上可加比較研究的「主觀量數」呢?

其次, 就系統意含上的問題來說。根究而言, 系統意含的要求, 實際上是指概念不能構成於「孤立之中」; 一個孤立的社會指標, 其所引起的疑問, 通常遠超過其所提供的答案。因此, 不論如何界定社會指標, 任何研究者都具有一個共同的體認: 概念的構成, 必須有助於定律或理論的建立, 亦即, 我們要能提出某一理論架構, 藉以指明諸社會指標間的關係, 或社會指標跟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關於社會指標的系統意含, 目前尚待探討的問題, 至少計有: (1) 是否要建構某種「社會系統的理論型模」(theoretical models of social system) 用以含攝各種社會指標? 假使須要的話, 則如何去建構? (2) 對於各種社會指標之時序上的變動, 政策上可控制變項及不可控制變項各佔多少影響力? (3) 在諸社會指標間, 能否建立「關卡觀念」(threshold notion)? 比如, 當文盲率從 90 % 降低到 40 % 時, 生育率雖然有所變動, 但其變動量不太大; 然而, 當文盲率降低到 20 % 以下時, 生育率則隨之大幅度下降, 如此, 文盲率 20 % 為一「關卡」。

顯然的, 從上述簡單的報告看來, 於社會指標的實證研究上, 目前依然存在著許多尚待處理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 希望能在今日與會學者的研討下, 獲得某些答案。

謝謝諸位。

二、論文宣讀與討論

第一次討論會

主席李亦園致詞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這個社會指標研討會是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三民主義研究所，及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等三個單位共同主辦。但是實際上，是由三民主義研究所負責大部份的工作，民族學研究所只是形式上的主持。我因是民族所的一份子，所以被邀請來主持早上的討論會。做爲一個學人類學的人，來主持社會指標的研討會，多少有點彘扭。人類學家到底適不適合參與社會指標的研討會？這個問題也曾經在民族學研究所引起很大的爭論，大家的看法不一，大約有一半的人贊成，一半的人反對，這無所謂的對錯，純粹是興趣。我個人是贊成參與的，因爲我所從事的研究牽涉到一部份人類學應用的事，而且人類學的研究可對社會的問題，多少提出一些看法和構想。所以我不僅贊成參加此會議，而且還要建議，如果可能的話，應該聚集人類學和其它社會學者，共同研討，將之擴展爲社會文化指標的研究，或進一步發展文化指標的研究。文化指標是我造出來的名詞，也許很突然，但是在目前文化建設是現代社會建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而文化指標，不僅可標示有形文化的建設，還可指出國人文化的心態，亦可用量化的方法，指出國人在文化建設上的成就和

標點。因此，我個人不僅僅贊成人類學者來參加社會指標的研討會，還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發展文化指標的研究，和社會指標配合在一起。

社會指標之介紹、製作與評估

陸 光

一、前 言

社會指標的基本觀念，應包括目標與數據兩種內涵。文字說明政策的目標，數字表示社會的實況。我國古代有大同理想、保息六政說明施政目標，也有災歉變亂社倉義粟等統計數字，說明歷代社會的真象。西方國家，根源亦深；十七世紀初年，英國畢第（ William Petty ）爵士所著的政治算術，即以土地、人民、住宅、船港等來說明比較國家的強弱貧富〔註一〕。這些都可說是社會指標的原始型態。

現代的科學的社會指標，則是一九六〇年代產生的一個新觀念。由於美國社會科學家們在理論與方法兩方面不斷的研究發展，美國政府當局在行政實務方面不斷的製作運用，以及聯合國為促進各國經濟社會平衡發展經由大會作成決議籲請各國積極推動，現在已成為一個普遍的通用的名詞，並成為一種新的知識、方法、技術、與尺度，用以衡量社會生活的現況，社會發展的績效與社會變遷的趨向，並作為指導社會行為，規劃社會政策，選擇優先次序的重要依據。

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爲使社會指標能夠充份發展運用，類多出版社會指標或類似的書刊資料供作各方參攷，篇幅簡略者數十頁，詳細者如美國社會指標凡六百四十餘頁。我國對於社會發展向稱注意，除各有關單位根據業務需要分別編印行政統計及相關指標之外，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合計畫處並自民國六十四年起彙集各方資料逐年編印社會福利指標一種，分送各方參攷，是爲我國綜合製作社會指標之先驅。

我國社會指標雖有豐富之基本資料，並已有了好的開始。但因社會一般人士對於社會指標之意義與價值仍欠認識，各方亦未給予應有之協助與重視，致使指標編制之工作仍有困難，而指標之使用價值，尤欠發揮。茲將各國社會指標內容簡單介紹，我國社會指標製作過程略爲說明，並對我國社會指標發展現況稍作評估、試提建議意見，以謀改進。

二、社會指標之介紹

(一) 社會指標之定義

社會指標 (social indicator) 一詞，在早期與社會記賬 (social accounting) 及社會簿記 (social bookkeeping) 社會報告 (social reporting) 等名詞相互混用沒有一定範圍。

一九六六年美國社會學家鮑爾 (Raymond A. Bauer) 在社會指標一書中指出：「社會指標，亦即統計數值、統計序列及其他形式的證據，用以評定我們社會價值與目標的現況及將來趨勢，並用以評估特定的計畫及蠡測其所產生之影響。」〔註二〕

一九七三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在發行社會指標通訊第一期中指出：「何謂社會指標？我們認爲它是統計的時間數列，用以測量社會某些重要方面的變化。」接着又說明他們採用這樣一個簡略而實用的定義，因爲現在的社會指標的意義和內涵太複雜了，那些方面是重要的，大家的看法並不一致，社會範圍的大小，也隨着調查的母體而異，他們採用這一定義，只想用時間數列來說明社會的組合、結構及

其功能，並用計量的方法將其現況與過去及將來相互比較。〔註三〕

社會指標根據弗利曼(Howard E. Freeman)的說法，實在相當難下定義。它以計量方法為主，但也注意品質的探測，它注意時間數列却不包括每一種統計的數值，它包括各種不同部份的特質，但也注意區域性的整體，它有時要求衡量客觀，有時又要求好壞的判斷，它要瞭解客觀的現況但又不以反映事實為滿足，有人認為是衡量社會福利，有人認為應衡量社會問題，專家學者對社會指標沒有統一的想法，實在是一個相當混雜的觀念。但近二十年來，社會指標已為各方所重視，並為政府機構與研究單位所支援。〔註四〕

又依照日本國民生活協會研究委員會一九七四年所作的定義：「認為社會指標是一種有系統的綜合的設計，用以衡量人民福利的情況，並以非貨幣性的指標為主。」〔註五〕

茲為對於社會指標有一個清晰的實用的概念，並且便於提倡推進起見，我們可以綜合以上各種看法，對社會指標試作一個界說：「社會指標是一種科學的設計，以非貨幣性的時間序列的統計數據為主，用以衡測任何社會體系某些方面全部或部份事象的現狀，與過去的變化及未來的趨勢，希望能像經濟指標測定經濟模式一樣，進而求得社會發展的模式。

(二) 社會指標之發展

社會指標這一名詞因一九六六年鮑爾出版社會指標一書而被普遍接受，這是一本由美國太空總署資助美國藝術科學學院研究太空計劃對美國社會影響的研究報告。根據另一本書社會規劃與社會檢討的作者勃魯克司(Ralph M. Brooks)對於社會指標運動發展歷史的研究，認為社會指標的演進，應以一九三三年胡佛總統提出的「最近社會趨勢」報告為最早的先驅。該報告根據調查結果將美國社會態度與興趣，農村生活，家庭，娛樂與休閒活動，犯罪及懲罰，人口，政府與社會，衛生與醫療實務等七方面的變化情形，向國民加以說明。其次為艾森豪總統一九六〇年的報

告「美國之目標」。自從鮑爾出書之後，更有許多專家學者，相繼研究發展，對於社會指標體系建立，資料之收集編製，長期短期之預測，社會發展模式之追求等等，均有重大貢獻。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為止，有關的書籍論著已達二百五十種以上。一九六七年美國國會通過參議員孟代爾所提充份機會及社會記賬法（ Full Opportunity and Social Accounting Act）之後，政府撥出足夠的經費支援各種研究活動，並要求總統每年應向國會提出社會報告，促使社會指標向前推進一大步。一九六九年詹遜總統正式提出社會報告，一九七三年及一九七六年美國商務部又分別編製社會指標公開發表，編製社會指標業已形成一種制度，並已成為美國政府統計單位經常的業務項目。同時因為聯合國自一九七二年起提倡社會指標，各國相繼響應，成爲一種國際性的運動，後來聯合國並編製統計年鑑及各國社會發展情勢報告，使得各國社會發展的情形，可以彼此比較。目前美、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瑞士、義大利、荷蘭、芬蘭等工業先進國家及斐濟等若干正在開發中國家，均已編有社會指標，定期公佈。

（三）社會指標之內容

社會指標之內容主要包括社會發展及國民生活的各方面，用以反映社會行爲及生活品質變動的情形，各國大致相同，但因為經社發展之階段不同，各國文化傳統背景各異，加以社會指標之研究者與使用者之目的不同，各國發表之社會指標內容亦互有出入。茲就各國使用之項目及其變動之情形，擇要介紹。

1. 美國社會指標

美國胡佛總統及艾森豪總統的報告爲社會指標早期的先驅，內容簡略，約如前述。茲以詹遜總統發表的社會報告（ Toward a Social Report ）爲例，內容分爲七類：

- （1）健康與疾病：①生理健康，②預命長短，③心理健康。

- (2)社會移動：機會均等，包括教育平等與種族平等。
- (3)物質環境：①自然環境之品質（公害），②人爲環境之品質（住宅、都市）。
- (4)所得與貧窮：①所得分配，②貧窮，③保證收入。
- (5)公共治安：①犯罪情形，②懲罰設施，③預防情形。
- (6)教育、文化、科學、藝術：①教育制度，②科學的生產力，③藝術。
- (7)參與結社：①表現意見自由，②公正不分派系。〔註六〕

一九七六年美國發行社會指標，由商業部中央統計政策標準局及普查局負責編印，其主要內容增爲十一項：

- (1)人口：①人口的成長，②人口的分佈。
- (2)家庭：①家庭戶量及組合的趨勢，②生活的安排，③家庭的穩定。
- (3)住宅：①住宅數量及設施，②住宅需要趨勢。
- (4)社會安全與福利：①方案發展，②保護的提供。
- (5)衛生營養：①死亡，②殘障，③其他衛生指標，④營養。
- (6)公共安全：①犯罪報告，犯罪的受害者，③社會的反應。
- (7)教育與訓練：①登記入學與上學情形，②教育成就，③成人教育與訓練。
- (8)工作：①經濟活動與就業，②失業，③工業條件與工作品質。
- (9)收入、財富與支出：①收入水準，②財富的衡量，③貧窮的衡量，④支出的衡量。
- (10)文化、閒暇及時間使用：①時間的利用，②娛樂與休閒，③文化。
- (11)社會移動及參與：①社會移動，②社會參與。

上列各項指標，除各再分爲若干細項指標加以闡述發揚並各附加簡略的圖表與文字說明外，另加大衆觀感與國際比較兩部份，一以觀察國民對某些事象的看法與看法之變化，一以比較國際發展的情形，內容十分充實。〔註七〕近以交通運輸關係國民生活素質甚鉅，聞正計劃增加交通運輸一類。

2. 歐州各國社會指標

歐州各國採用之社會指標，均以歐州共同組織（OECD）所訂者為準，彼此大同小異，其主要項目有八：

- (1)健康：①健康的生命，②減少損害健康的衝擊。
- (2)個人透過學習而發展：①基本知識、技術及價值觀念之獲得，②自我繼續發展，③個人經濟潛能，④學習經驗，⑤文化傳統。
- (3)就業與工作生活的品質：①有給付的工作機會，②工作生活的品質，③工作生活的滿足感。
- (4)時間與休閒：①個人使用時間的選擇。
- (5)對貨物與服務的控制：①個人對貨物與服務的控制，②物質的剝奪，③個人控制分配的公平性，④取得貨物與服務的範圍及其品質，⑤對經濟危機的防護。
- (6)物質環境：①居住條件，②污染，③環境之利用與管理。
- (7)個人安全與司法行政：①暴力、欺騙、與擾害，②司法行政的公平與人道，③司法行政的信賴性。
- (8)人在社會中的地位：①社會的不公平，②參與社區生活。

歐洲各國，均為工業國家，所列項目，與美國近似，但以對貨物與服務的控制代替收入與支出，表示重視消費。並且因為社會安全制度已經全面實施，接近理想，故未將其列入。

3. 日本社會指標

東方國家的社會指標，可以日本的為代表。日本經濟發展快速，在一九七一年間便發生經濟發展與國民福利的關係問題，是年成立國民福利淨額（NNW）開發委員會，從事各項研究，指出閑暇時間，環境污染，都市損失等有關社會指標的觀念，於一九七三年提出報告〔註八〕，同時在一九七一年決定由國民生活協會研究委員

會從事社會指標的研究，一九七四年提出報告，並將其結果作為社會指標，計分十大類，二十七中類，七十六小類，一七四細類，二九四個項目。茲將大類及中類項目分述如下：

(1)衛生：①維護健康與長壽，②改善社會條件，保護並促進健康。

(2)教育學習與文化：①基本教育標準，②中等以上教育標準，③自我發展活動標準，④文化環境標準。

(3)就業與工作生活品質：①有酬就業機會可用性的增加，②工作生活品質的改善。

(4)閑暇：①生活自由水準的增進，②休閒生活的改善。

(5)收入與支出：①收入與財產之增加，②收入與財產差距的縮小，③收入與財產的穩定，④消費環境的改善。

(6)物質環境：①住宅條件的改善，②有害及危險事物損害的減少，③自然災害損害減少，④良好自然環境的保護。

(7)犯罪與執法：①個人遭受暴力、痛苦的減少，②執法的公正與人性化，③人民的信賴程度。

(8)家庭：①加強家庭功能，②家庭分解的減少。

(9)社區生活：①可供居民參加受益的民間組織，②可供居民使用受益的設施與服務。

(10)階級與社會移動：①階級間抱怨的減少，②社會階級移動的便利。

日本是東方國家，特別強調家庭的功能，並且強調社區生活，重視集體的消費與服務，確具特色。

4. 聯合國的社會指標

聯合國為促進各會員國能夠經濟社會平衡發展，曾經經濟社會理事會決定建議各國採用社會指標，促進社會發展。一九七二年亞經會曾在馬尼拉及曼谷兩次舉行專

家會議，討論社會發展指標，送供各國參考。研定指標之內容如左：

(1)人口控制：①人口成長率，②粗出生率，③粗死亡率，④淨移民率，⑤適齡婦女嬰兒出生率。

(2)健康：①生命預齡，②嬰兒死亡率，③疾病罹患率。

(3)住宅：①城鄉住宅所有率，②城鄉住宅給水方式及比率，③都市住宅每間使用人數率。

(4)營養：①每人消耗卡路量，②蛋白質量，③入學兒童體重偏低人數比率，④營養不足家戶比率

(5)教育文化：①國小適齡兒童入學率，②國小兒童中途輟學率，③中學適齡兒童入學率，④中學兒童中途輟學率，⑤中學女性新生比率，⑥大專適齡青年入學率，⑦大專科技學生所佔比率，⑧十歲以上人口中識字者之比率，⑨公立圖書館每千人擁有書本數，⑩大眾喜愛報紙每千人之發刊量，⑪收音機每千人擁有數。

(6)就業與社會安全：①城鄉男女工作年齡人口中有酬工作者所佔比率，②經濟活動人口中十五至二十四歲及二十五歲以上兩組失業人口之比率，③完成中等以上教育程度者之失業率，④從事非農業工作者中婦女所佔之比率，⑤經濟活動人口中受到社會安全制度保障者之比率，⑥經濟活動人口中參加工會組織者之比率，⑦真實工資之指數。

(7)人身安全：①每千人中犯罪有案者之比率，②人身侵犯犯罪率，③財產侵犯犯罪率，④每千個青少年中犯青少年罪有案者之比率。

(8)其他一般指標：①收入僅能維持支出戶之比率，②所得最高百分之五戶數與最低百分之二十五戶數之比率，③農戶耕作不足當地認為合理面積標準者之百分比率，④持有農地面積最多之百分之五人口，佔土地所有者之比率，⑤政府及民間機構對社會福利服務支出每千人之金額，⑥每一家庭之支出，按常值計算平均每人若干。〔註九、十〕

聯合所訂指標項目，為求便於各國使用，要求較低，旨在促進落後國家之社會

發展，特別強調人口控制，食物營養及社會安全制度之保障等項目；對我國已少參考價值。

5. 其他國家社會指標

其他各國編印社會指標多數以聯合國之內容為藍本，例如斐濟，業自一九七四年起逐年編印「斐濟社會指標」，其內容分為人口、衛生、教育、就業、公共秩序與安全、收入、支出與消費及其他七項，其他部份包括道路、運輸、住宅、電力及水利等社區性的集體消費的設施〔註十一〕。斐濟的政府與人民認為促成經濟發展，並不困難，今後目標應注意經濟與社會的平衡發展，不祇是財富的增加，並且要公平的分配，生活水準的提高不祇是個別的消费，更重視社區的消费。斐濟製作的社會指標，亦可作為其他開發中國家的代表。

(四) 社會指標之運用

社會指標，自一九六〇年代開始以來，不斷發展，主要是由於各方面對於社會問題與人民生活的重視。試以美國為例，人民已厭倦於太空計畫的競爭而希望政府多注重地上人民的福利，於是詹遜的大社會政策等措施隨之產生，政府為爭取通過法案的呼籲，為報導行政成果的說明，都運用了社會指標，並促進了它的發展。其次是由於各方面對經濟發展的再評價。各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全力追求經濟發展，各項經濟指標不斷表示發展成長，但是它對於人民生活的改善，究竟發生了多少影響，不無令人懷疑之處。不僅許多社會學家，致力於社會問題及社會現況的測度，並有許多經濟學者，除對國民生產毛額，國民平均所得等傳統性的經濟指標加以注意外，並對國民生活，社會秩序，身心健康，住宅環境等方面的問題，發生興趣，強調國民生活品質的改善，並從事有關生活品質指標的研究〔註十二〕，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指標的發展。社會指標，目前已成為社會科學家，政治活動者，立法人員、社會規劃人員、社會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及社會熱心人士所重視並予多

方運用的有力工具。其主要作用有六：

1. 作為社會現狀的說明：社會的事象，有許多是抽象的，有許多是主觀的，很難作具體而客觀的表達。採用社會指標可以計量的數字，配合時間、空間及母體的特質，加以表示。牠可以說明社會的現況，作為一個靜態的現況的陳述，也可以作為一個動態的變化的起點或終點，以便在橫斷面上觀察判析。

2. 作為變化過程的衡量：社會指標，主要是時間數列，牠可以衡量某種社會事象在一定時間內變化發展的情形，並表示推行某種方案前後的變化及該一方案執行的成就與對其他各方面影響衝擊的情形。

3. 作為彼此比較的標準：每個社會體系發展的情形與其他社會體系發展的情形，各各不同，必須要有一些相同的指標，方可相互比較。社會指標，可用以協助各個社會體系從事國際間，地區間，特定母體間的相互比較以顯示彼此之間發展變化的方向與程度之不同。

4. 作為規劃未來的依據：社會規劃人員，可以根據目前現況及已往發展過程，選定若干社會指標，作為規劃的依據，預期一定期間之內，達成某種目標，進而規劃實現之方法，籌謀需要之資源，以便作成未來的可行的方案。

5. 作為建立模式的架構：每一社會體系，均有其各別之本質、結構與功能。社會科學家為瞭解社會發展之模式，擬倣照經濟學家根據若干重要經濟指標以建立經濟發展模式之作法，利用社會指標研究建立社會發展之各種模式。

6. 作為經社發展整合的標記：各國追求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一面增加國民所得，一面改善生活品質，兩者之間相互支援合作情形如何，有賴於社會指標與經濟指標的聯合運用，方能瞭解彼此調適整合之結果，並謀進一步的配合。

三、社會指標之製作過程

社會指標製作之過程，主要在於決定製作目的，選擇相關性較高之指標項目，收集整理可用之統計資料，審查資料並作必要之修正與補充，整理製作各項基本資料之

統計表，分項按年計算各項指標之指數，將若干同類之指標歸納為一大類指標，研定各指標間比重之權數，根據權數計算整合得到各大類指標之總指數。茲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其前身經濟設計委員會綜合計劃處編印之社會福利指標為例，加以說明之：〔註十三〕

(一) 製作目的

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為「測度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福利之促進與國民對經濟成長成果之分享情形」，特依據各有關機關之統計資料，加以整理彙編，以供各方參攷。

(二) 資料來源

1. 國內原始資料除行政院經建會本身出版者外，來自中央及省市各級政府機關發佈之文件及統計數字，主要來源如次：

(1) 行政院主計處發行「中華民國勞工統計月報」，「中華民國國民所得」，「台灣地區物價統計月報」，「台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統計提要」。

(2) 行政院戶口普查處「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3) 內政部「內政統計提要」，「台閩地區人口統計」。

(4) 教育部「教育統計提要」。

(5)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統計」。

(6) 財政部「財政統計」。

(7) 經濟部「台灣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8) 交通部「交通統計月報」。

(9) 司法行政部「司法行政統計」。

(10) 台灣省勞動力調查研究所「台灣地區勞動力調查報告」。

(11) 中央信託局「公務人員保險統計」。

(12) 台閩地區勞工保險局「勞工保險統計」。

(13) 台灣電力公司「統計年報」。

(14) 其他為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資源委員會、台灣省社會處、環境衛生實驗所、台北市社會局及環境清潔處等單位之資料。

2 國外資料主要來自聯合國「統計月報」(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國民會計統計年鑑」(Yearbook of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s) 及「統計年鑑」(Statistics Yearbook)。

(三) 項目選擇

指標項目之選擇可分為主觀選擇與客觀選擇兩大類。主觀選擇，根據多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主觀的看法，認為那些項目與人類生活社會生存關係最為密切，客觀的選擇是先根據現有統計資料，列出許多項目，分別以統計的迴歸分析法研究各項目與國民生活某一觀察面之間的關係及其重要性，然後刪減不重要者保留重要者，此一方法以各別因素之重要性而定，又稱為要素分析法，這種方法雖然客觀，但需要大量可靠的統計資料與較長的時間數列，我國無法採用。因此經建會綜合計劃處乃參考國外編製社會指標項目，初步選定所得水準，經濟穩定，所得分配，生命統計，生活環境，工作機會，營養及休閒活動八項，並作成問卷，分向國內社會、經濟、衛生、教育、交通等方面之專家學者五十餘人徵詢意見，經加整理分析，並參酌現在資料之可用性與正確性於六十四年起，選定所得與分配、經濟穩定、壽命延長、公共衛生、教育文化、生活環境、就業及人口八類分作三十五種附表，編印「社會福利指標」，自六十七年起，根據各方建議及本身製作經驗，將指標項目，重新分類組合歸併，改為①經濟狀況②個人發展③社會均等④生活環境⑤教育文化⑥社會安全與福利及⑦衛生保健等七類，分作二十六種表式，繼續編印。〔註十四〕

(四) 指數編製

指數編製工作分爲四部份：

(1) 整編基本資料：將收集所得最新統計資料分按指標項目，依照時間序列，製成基本資料統計表式，一併發表，以供各方參攷。

(2) 計算定基指數：選定某一年份，作爲基期，以其實際值作爲基數然後與其他各觀察年份之實際值相比較，算出定基指數，用以瞭解各期間內之變化情形，社會指標，由於代表性質之不同部份因素對於社會福利或生活品質產生有利之影響，如教育，就業，營養等，稱爲正指標，部份則產生不利之影響，如公害、失業、犯罪等，稱爲負指標，各指標之性質，經於指標符號欄內分別以「+」「-」符號表示之。

正指標之計算公式爲 $I_{ij} = \frac{P_j^i}{P_j^0} \times 100$ I_{ij} 代表 t 年 i 類第 j 項的指標， P_j^i

代表 t 年 j 項的實際值， P_j^0 代表 j 項基年的實際值。

負指標之計算公式爲 $I_{ij} = [1 - (\frac{P_j^i}{P_j^0} - 1)] \times 100$ 各項符號代表的意義與前列

公式相同，惟在計算負指標指數之時，先求出 t 年 j 項指標對基年的增加率，再以一減之，以顯示 t 年 j 項負指標對社會福利或生活品質的正貢獻。

(3) 計算環比指數：比較各項社會指標上下兩年之實際數值或其指數計算環比指數，以明瞭社會福利水準逐年變動情形。

(4) 計算綜合指數：社會指標項目衆多，以其性質分類，可分爲大類、中類、小類、細類等若干層次。社會福利指標，除分七類外，下分項及細項及指標三層，例如生活環境類之下，有自然環境等項，該項之下，又有氣候，空氣污染等細項，空氣污染細項之下，又有懸浮微粒，落塵量及烟霧濃度三種指標，爲求細項指標之數值，除瞭解上述三種指標之指數外，並應先瞭解各指標間重要性之比重，然後方能

加權計算。行政院經建會現因決定各指標間關係比重之資料不足，難以加權，概用平均法計算之。項指標數值之計算，亦暫時如此辦理，至於各類指標之綜合指數，目前尚未攷慮。

(五) 內容重點

社會福利指標，分作七類二十六個表，其主要內容，可以下列各項為重點。①經濟狀況包括平均每人所得，平均每人消費，平均每人存款，消費者物價指數四項，②個人發展包括勞動力參與率，失業率，經濟活動人口率，平均每人實質教育經費支出，平均每千人訂購報紙雜誌五項，③社會均等包括男女失業率，薪資差異，所得分配，農家與非農家所得四項，④生活環境包括衣、食、住、行、空氣污染五項，⑤教育與文化包括不能讀寫者佔六歲以上人比率，教師與學生比率，學生佔人口比率，出版圖書數量，影劇戲院座位容量與觀賞人次，每千人電視機架數六項，⑥社會安全與福利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貧民人數，社會救濟機構收容人數三項，⑦衛生保健包括公共衛生佔政府支出比率，醫護人員及病床普及率，壽命延長，婦幼衛生，傳染病的控制五項。有此三十二項重要指標之資料，約可描繪出我國社會福利的概況。若干專家學者，亦均依此資料，論述我國國民生活品質之現況及其改進之情形。〔註十五〕

(六) 國際比較

我國社會指標，如不作國際比較，無法知道我國發展至何階段。我國社會福利指標，印有附錄，將各重要國家有關統計資料，分按平均每人所得，國民消費佔支出比例，國民儲蓄佔所得比例，失業率，生活環境，教育及衛生保健七項列表介紹並與我國比較，藉知各國發展梗概。

(七) 編印發行

社會福利指標，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其前身經設會綜合計劃處自六十四年起負責編印，每年一次，約於次年八、七月間始發行，每次約一千冊，除分送各有關機關、學校、團體、圖書館使用外，並分送國內外專家學者，以供參考。各方如有需索，可以立即寄送，別無限制。

(八) 遭遇困難

社會福利指標編製工作，遭遇若干困難。在行政方面沒有專任人員，也無獨立預算。在理論方面，專家學者的意見常難一致，項目認定時異。在實務方面現有資料不足，時間序列太短，各項原始資料常因母體大小不同，定義前後不一，調整修正困難。在技術方面，若干指標無法量化，若干指標評量困難，若干指標蒐集資料不易，若干指標之代表性不夠允當。在因應各方需要方面，因為社會福利範圍太廣，若干指標仍付闕如，諸如家庭生活，社區活動，少年犯罪，水源污染，休閒時間，專業服務等等，既乏現成資料，又難自辦調查，短期間內無法滿足各方需要，易受批評，宜再改進。〔註十六、十七〕

四、評估與建議

我國尚無社會指標，僅有社會福利指標。該項福利指標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合計劃處編製，自六十四年起逐年發行，對國內各界人士提供了最佳的服務。復因編製單位人力、物力有限，能有如此績效，更是難得。但就國家立場而言，我國社會指標之體系尚未建立，製作運用各情，亦待改善，茲加評估，並提改進建議如次：

(一) 社會福利指標應擴大改進為社會指標

(1)我國現行社會福利指標內容，分為七大類，相當週延，既有教育衛生等福利性的正指標，亦有犯罪、失業等有害性的負指標，宜改訂為社會指標。並將家庭生活，社區參與等群體生活的指標，一併列入，擴大原有範圍。

(2)國內有關社會發展的統計為數衆多，即以同屬行政院經建會的住宅及都市發展處而言，即逐年編有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內容包括都市及區域發展指標與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諸如都市計劃建設、公用事業、交通、公共衛生、住宅、環境污染、大眾秩序、教育文化、地方財政、都市經濟、家庭收入、就業及人口等項，即與社會福利指標，具有重複之感，不如將此類資料與社會福利指標連同其他單位類似之出版物，彙併為我國社會指標，統一發行，更求充實。〔註十八〕

(3)各國有關社會福利指標之編印發佈，均以社會指標名之，我國宜將現有社會福利指標，擴大範圍並正名為社會指標發行之。若干類指標之名稱，如社會安全類之下，包括警察、自殺、犯罪等有關公共安寧的項目，亦與各國常用定義及範圍不合，應加檢討改正。

(二) 編製社會指標應注重描測社會情況及其趨勢

(1)現行社會福利指標之編製，依經建會宣示之目的，在衡量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民生活素質進步之情況，用以顯示國民所得的提高與社會福利的增進之間，是否保持同一方向與步調，換句話說，社會福利指標之選擇與編製，在本質上是由經濟導向的旨在說明經濟發展造成生活品質之改善。今後宜以國家整體發展為目標，社會發展為重點。

(2)社會指標應以描述、衡量社會體系的現況與趨勢為主，對各界人士提供客觀的綜合的社會全貌，使瞭解我們的機會，也瞭解我們的問題，瞭解社會的福利，也瞭解社會的災難，尤其要能指出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勢，以便加以人為的規劃，導向理想

的境地。

(三) 社會指標的增選應使具有三民主義的特色

(1)各國社會指標，均含有其歷史與文化的特質。我國以忠孝為社會最高價值，以家庭為社會組織基石，以信義為社會行為尺度，我國研訂社會指標新的體系之時，應注意提倡及維護這些特質。並注入「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生活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之理念，使小我與大我的觀念與利益，能夠相互溝通與調和。

(2)我國社會政策，除憲法基本國策中訂有社會安全、教育文化各節外，並有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及現階段社會建設綱領兩大指導文獻，均根植於三民主義的遺教。各項應做已做或應做未做之工作，例如勞資合作，失業救濟、婦幼福利、公醫制度、社會教育、平民工廠、分工入股、獎學基金、社區建設、工礦檢查、合作事業、少年感化、民衆團體、志願服務、社會捐獻、文化建設等等均可增選為社會指標，一以充實社會發展內容，並使社會指標具有三民主義之特色，而利宣導推進。

(3)中國一向注意精神生活。兵學家蔣百里說，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相合者強。美國雷·克萊恩(Ray Cline)評估各國國力，亦注意精神意志的力量。最近有許多宗教團體，亦在注意生活素質與靈修的關係。我國社會指標亦宜研究增列精神、宗教、文化意識這一方面的項目。

(4)我國社會指標，為配合國家社會需要及世界國際潮流，今後似可擴大改訂為十二大類：①人口、家庭，②收入、分配、支出，③衛生保健，④教育訓練，⑤就業與工作，⑥社會安全，⑦公共安寧，⑧生活環境，⑨交通運輸，⑩休閒娛樂，⑪文化意識，⑫社會參與。然後慎選項指標與細項指標，以期個人與社區的生活兼顧，精神與物質的成果並重。

(四) 社會指標的內容應有施政的評估與民衆的觀感

(1)現行社會福利指標，分為文字說明、統計表件與附錄三部份，文字部份說明製

作經過及一年來台灣地區社會福利之增進情形，統計表件分列基本資料，定基指數及環比指數三種。附錄部份即為國際統計資料指標。內容從靜態觀測粗具規模，但從運用着眼，缺乏活力。今後宜參照美國社會指標顯示方法，增加上述二部份：

(2)對現有重要方案的成果加以評估。選定若干指標，用以衡量方案執行的動態，明其得失，隨時謀求改進。

(3)對民衆的觀感加以蠡測。選定若干指標，舉辦調查，以瞭解民衆對於某些問題的看法。例如美國即調查婚姻快樂的因素，期望子女的人數，墮胎合法化的意見，老人與成年子女同住的利弊等等，不但可以反映客觀的事件與社會的心態，也可作為社會決策的參攷。

(4)日本曾於一九七二、七五、七八年三次舉辦國民生活選好度調查。調查國民對於各類項目重要程度的認定，以為決定權數之基礎；滿意程度的認定，以明實際發展之情況；期望度的認定，以為決策之參考。調查分析詳盡，可為我國舉辦類似調查之參考。〔註十九、二十〕

(五)社會指標的製作應有全國性的機構主持其事

(1)現行社會福利指標，由經建會綜合計畫處編製，主辦者並無專人經費亦感不足，以致製作編印，亦稍遲延，宜即改進。

(2)國外社會指標編製工作，均由中央設置專責機構辦理。例如美國有商業部聯邦統計政策標準局，日本有經濟規劃局國民生活協會，即如低度開發國家斐濟等，亦均責由中央統計局，主持其事。

(3)今後社會指標編製發行工作，宜由中央主管統計單位或另設專員機構主辦其事，一面蒐集各單位既有資料，加以整理修正，快速編印發行，一面舉辦必要之調查，以補充現有資料之不足，並作必要之研究，期使社會指標之作業體系，更為完整。

(六) 社會指標表達之方法應再求新求變

(1) 現有社會福利指標，多以統計表式表示之，較為枯燥，並不易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今後製作社會指標，宜加統計插圖，以增表達能力。

(2) 社會指標具有相關性與互依性，各類各項指標之指數各別表示，固有其價值，但如能綜合表示，更易表達社會發展之全貌。今後宜設法倣效經濟學家衡量經濟發展模式之方式，選定若干重要社會指標，建立社會發展模型，以便各界對我社會發展情形，亦能一目瞭然。

(3) 社會福利指標，目前印成書刊形式，分送各方參攷，着重學術研究，未能廣被使用，今後發佈社會指標宜以深入淺出之文字或其他資訊，對社會大眾普遍報導，以擴大影響力量。

(4) 現有社會福利指標，均以能量化者為限，有關品質方面，尚少有效表達方法，今後製作社會指標，宜再研究創新，兼顧量與質之評量表達方法。

(5) 社會指標如欲充份利用，必須加緊研究比較的方法，將不同的統計數值換算成可以比較的共同單位，使能作地區間、群體間或國際間的相互比較。國外常用全部平均為一〇〇與部份平均比較，各年情況與基年為一〇〇比較，各別福利情形與其他福利情形最佳者至最劣者之間作為一〇〇相比較或與其他若干福利項目的算術平均（或幾何平均）作為一〇〇相比較等相對評價法比較之，或用二基準點方法（指數值

$$\frac{100 \times (\text{實際值} - \text{最低福利點} M)}{\text{期望達成福利點} F - \text{最低福利點} M}$$
），三基準點方法，（生存界點為零，未達最

低需要點為一，及完全滿足點為二），或五基準點方法等絕對評價法比較之，但我國目前僅作基年指數及環比指數比較，宜加補充。〔同註十四〕

(七) 社會指標應爭取政府之重視與運用

(1) 現行社會福利指標在本質上跡近經濟發展指標之延伸，在運用上僅以說明經

濟發展對國民生活改善有益為主，既未用以說明經濟發展帶來之利益與損害兩者相抵之後有無純益，亦未用以說明社會發展之現況、趨勢與未來發展應採之模式。此固與社會指標不夠精確詳備有關，但亦由於未受政府之真正重視所致。

(2)今後應爭取政府重視：期能於政府施政報告中，提出社會指標，以表示政府施政之重點與其關切之所在；期能於研訂計畫方案時，開列社會指標，以為工作之具體目的，代替往時之空洞口號；期能於檢討某單位工作績效之時，確立社會指標以衡量工作實際成果，避免文字之藻飾。

(3)國人對於經濟社會發展之成就，每易自我陶醉，但如將各項指標作一國際比較，即可明瞭各國發展實況，期能常將我國社會指標與他國的相比較，以便參攷改進。

(八) 社會指標應作為社會行為計畫變化的南針

社會指標不祇描述社會的現況與趨勢，它更關心個人、家庭、與團體的行為與福利。美國最近增加若干社會指標，注重生活環境品質與石油能源危機，旨在瞭解民衆關切之所在，並用以指導民衆因應之作爲。在工業化、都市化、知識爆炸的社會裡，各人的思想行為，日趨複雜，個體追求的目的或群體促進社會行動的方向，互有差異，造成社會行為與社會期望的偏差。例如父母的期望與子女的動機，政黨的決策與專家的信念，人民的需要與政府的施予，常會發生矛盾與隙縫。我們應將學術性理論性的社會指標自廟堂引入社會，化作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的價值尺度，與推動社會革新從事社會計畫變化的南針。

結 語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各國忙於戰後重建，積極推動經濟發展。美、俄之間接着又從事軍備與太空的競爭，世界各地也無不忙着物質的建設與科技的發展，全力追求貨品的生產，財富的增加，忘掉了人類生存的真正目的。一九六〇年代，創導社會

指標的先驅者，爲要瞭解經濟發展究竟帶來了多少福利，科技發明又給了我們多少衝擊，才產生了社會指標的觀念，並使人類找回了自己，勿爲物所役使。我們要用社會指標將生活的品質、生存的環境，作一客觀的衡量，並謀改進。

首先，我們希望對於社會發展的現況，能夠有所瞭解，其次希望經濟發展的領域能夠容受社會發展的插足，進而謀求經濟與社會相互配合的平衡發展。可惜有關社會指標的知識與技術，迄今還是一門新的學問，仍在不斷發展。在計量方法方面，固待繼續改進，在定性方法方面，可說尚在起步階段，致使有價值、有意義的社會指標，尚未獲得各方普遍的認識與重視。

近數年來，由於聯合國的提倡，各國政府的響應，社會指標，業已漸被重視，並成爲一種國際化的運動。若干先進國家，業將社會指標作爲政府爭取通過法案的理由，作爲施政計畫的說明，作爲新訂各種方案的依據，並作爲評估重要工作績效的工具。若干國家並專設機構，負責研訂社會指標，定期發佈，擴大報導。

各國社會指標，大致相近、惟因各國文化、歷史、及面臨問題等等背景之不同，仍各有其特質。我國社會福利指標，包括經濟狀況，個人發展，社會均等，生活環境，教育文化、社會安全與福利及衛生保健七項，與其他各國相較，範圍稍狹，今後一面應增加家庭幸福，社區生活與社會公正等有關指標，一面應顧及我國以三民主義立國之精神，將三民主義之特色，融入我國社會指標之中。

我國現已編有社會福利指標一種，是爲編製社會指標之良好開始，貢獻亦大，惜因主辦單位人力財力有限，加以編製目的重在說明經濟發展對於人民生活品質所作之貢獻，尚待擴大改進之處仍多。今後希望中央能成立一新機構或加強現有主辦單位組織，以利工作之進行，並將所編社會指標多加運用，不僅應用於報告、決策、考核、評估等公文書類之中，尤望能將社會指標從政府及學術機構帶入民間，使爲社會大眾所接受，作爲調適個人行爲與規劃社會行動之南針，促進社會改革，增進人民福祉。

附 註

- 〔註 一〕 周憲文譯 William Petty 著，政治算術，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翻譯叢書第五十六種，五十九年。
- 〔註 二〕 Raymond A. Bauer, Social Indicator, The M.I.T. Press, Massachusetts, U.S.A. 1966.
- 〔註 三〕 Karl A. Fox, Social Indicator and Social Theory, Elements of an Operational System, Wiley-Interscience Publication, New York, 1974.
- 〔註 四〕 Howard E. Freeman and Eleavor B. Sheldon, Social Indicator,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NASW. N.Y., U.S.A. 1977.
- 〔註 五〕 The Council of National Living, Research Committee, Social Indicators of Japan, Printing Bureau, Ministry of Finance, Japan, 1975.
- 〔註 六〕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Toward a Social Repro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 〔註 七〕 U.S. Deparment of Commerce, Social Indicators 1976, Selected data on Social conditions and trends in the U.S., Dept. of Commerce, U.S. 1977.
- 〔註 八〕 日本經濟審議會國民福利淨額開發委員會報告，一九七三年，行政院經設會譯印，經濟叢書八十九號，六十四年。
- 〔註 九〕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angkok, Thailand, 1972.
- 〔註 十〕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and U.N. Statistical Commissio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dia, 1973.
- 〔註十一〕 Fiji, Bureau of Statistics, Social Indicators for Fiji, Fiji, 1976.
- 〔註十二〕 Ben-Chieh Liu,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 Comparis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in China (Taiwan), U.S.A.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Midwest Research Institute, Kansas City, Missouri, U.S.A.
- 〔註十三〕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合計劃處編印，社會福利指標，六十八年。
- 〔註十四〕 施敏雄：論社會福利指標，台灣經濟第十五期，六十七年。
- 〔註十五〕 張丕繼：生活素質，中華民國經濟年鑑七〇頁，經濟日報社，六十九年。
- 〔註十六〕 席汝楫：社會發展與生活品質之衡量、新生報，六十七年五月一日、八日。

〔註十七〕 Adolfo Critto, *Methodological Aspect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Labour and Society*, Vol. 4, No. 4, 1979.

〔註十八〕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編印，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六十八年。

〔註十九〕 日本經濟企劃廳國民生活調查課編印，國民生活與意識之動向，昭和54年，1979。

〔註二十〕 日本國民生活審議會編印，第三回國民生活選好度調查，昭和54年，1979。

陳小紅評述

主席、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所要評述的論文是陸光教授的「社會指標之介紹、製作與評估」。正如剛才各位所聽到的，這篇論文的內容非常 comprehensive 和 informative。它從社會指標的意義，談到世界各國社會指標發展的歷史和內容，包括美國、歐洲、日本、聯合國及開發中國家的情況，進而談到社會指標的用途，以及在我國社會指標和社會福利指標的製作過程、方法、缺點、困難，最後也作了評估和建議。所以，評估這篇文章，等於是評估的評估，相當困難。此篇文章就其研究目的來說，是相當無懈可擊。因此，如果說是評估此篇文章，毋寧說是我個人讀完此篇文章後的一些感想。謹提出來就教各位，共分為四方面：

(1) 今天研討會的課題，是社會指標的探討。個人認為能否再擴大其範圍，把它變成社會經濟指標，或社會經濟政治指標 (socio-economic indicator or socio-economic-political indicator)。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它的理由。目前國內出版的有關刊物，就經濟或社會方面來說，最完整的可能是經建會所出版的台灣統計年報 (Taiwan Statistical Yearbook)。這本書中有幾類不同的指標，是很難區分係屬經濟性或社會性。例如：討論到人口部份的年齡結構、勞動力部份的婦女勞動力分析。另外還有工資、所得分配、消費、儲蓄、小汽車持有數、醫生就業人數等等，這些可看成是經濟性的指標，但如果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婦女就業勞動力之提昇也可視為社會變遷的結果，證明婦女在社會結構中，地位的改变，因此，它又可說是社會性的指標。同樣地，各國來台觀光數、高速公路旅程數、和台灣貿易有關的國家數…等，可看成是經濟性的指標，亦可作為政治性的指標。陸教授在文章第十五頁中建議，未來台灣省社會福利指標要改成社會指標，是否可擴大為社會經濟指標，或社會經濟政治指標。今天，在這裡談論社會指標，也可能犯了分工過細的錯誤，以科際整合的立場，似乎可將社會指標研討會擴大成社會經濟政治指標。

(2) 目前社會指標的種類，依陸教授在文章第十二頁，十三頁中指出，全世界各國的趨勢，大致可有幾種不同的分類，其中最完整的分類是大、中、小，然後下面再分成幾個細類。從經濟的觀點來分，全國性的資料可分成 macro data 和 micro data，或如蕭新煌博士所說的 aggregate 或 disaggregate data。不管用什麼名稱，大家基本上都承認一個事實，即社會指標的種類不應該停留在大類的範疇，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全國性、整體性地將社會發展階段呈現，而且更需要細類的；如經建會及其它機構，目前正討論的 regional indicator 和 sectoral indicator 這方面的努力，將來是有必要繼續發展的。我們社會指標的建立，目前仍停留在全國性資料階段，當然這一方面也是方法上的問題，因此，我們常可窺事物之全貌却很難深入其內涵。這方面比起日本實差一大截。日本不僅對現況的社會指標有深入的探討，而且對社會未來的發展，有邁向情報化社會的觀點。

(3)從計劃或政策的層面來討論，台灣或開發中國家社會指標的問題，大致有下列二大方面：①社會指標相當地缺乏，②社會指標的應用，不能符合政策的要求。因此，社會指標常無法作為決策的依據。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許多社會現象缺乏詳細的資料。第二是國內決策者公開演講、討論問題很少有引用數據的習慣，即使是有，不是「自我陶醉」就是存着報喜不報憂的態度，或者是把社會指標當成掩蓋事實的工具，因此，社會指標常無法呈現社會的現況。

(4)在資料建立方面，學術研究通常需要較長的時間，而政策決定通常需要立即的答案，所以常常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但是細水長流，如果能儘快地在學術界上從事一些基本研究，建立一些政策走向面的研究，我相信，台灣社會指標的發展仍是充滿希望的。

從中國政治哲學思想 論我國社會指標的建立

賴 澤 涵

一、引 言

追求「均富」乃是人類文明發展以來的最高目標之一。而其思想，中、外的思想家均曾討論過。惟歐、美在二次大戰前所討論的似乎不及我國來得系統。我國自孔子以來的「大同社會」境界一直為中、西思想家所嚮往的最高目標，此一理想經孫中山先生及蔣公中正先生的闡釋與提倡，成為我國推行社會福利政策最有系統的指導方針。

社會貧富差距的造成大抵與土地可自由買賣有關。蓋有積蓄者無不購買土地以置產，並以之傳留子孫，結果無土地者只得淪為佃農或從事其他行業。在傳統的社會裏，土地即財富。土地除是財富之外，科舉制度似乎對他們也較為有利。蓋參加科舉須費時花財力，如果沒有財產者似乎較難準備應舉。這就是我國仕宦之家很少不與地主分開之者，社會上「地主」與「紳士」也因此往往並舉稱呼他們。

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之後，兼併之風隨之而起，結果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無立錐之地」，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歷代的所謂明君或有為的政治家（如王安石等）沒有不想用限田政策或改革土地問題的，然而土地問題甚大，絕不是一紙命令可以解決的，這就是我國歷代的土地改革收效甚微的原故。復次，地主階級與仕宦之家易為自己利益（仕宦之后無不以購置土地為終老告鄉之準備）形成集團，反對土地改革的措施，這就是我國歷代土地改革失敗的主因。

細考「均富思想」的來源主要在於貧富的懸殊，「不平則鳴」之故，先哲以「不均」可能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危及社會秩序，甚至大亂，危及生命，乃呼籲明君早為綢繆，所以先哲的均富思想來自百姓之痛苦，因此為在位者籌劃消彌大亂之方，其基本動機乃在於「仁」的發揮。

先哲對如何才能建立和諧均富的社會雖然都沒有皇皇的大著論述，但他們的理想到今天還是各國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標。

儒、法兩家為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故本文所論及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想亦以他們為主，此並非其他諸子所談論的不重要，只是他們的著述不及儒、法兩家之稍具系統而已。

復次，社會福利措施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已逐漸付之於行動，且以國家之力全力推行之。此點在我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家，只有寄望「明君」出現，一般民衆對之也無任何之約束力，而且先哲之理想社會之藍圖只是大而化之，未能詳其具體實行步驟。

孫中山先生終身從事革命工作，他在世時對歐、美的社會病態有深切的體察，而他對先哲所描述之理想社會又極為嚮往，乃融合中、西思想家的理想社會，並採擇歐美政府所作之改革方向，提倡民生主義，以為中國未來社會建設方針，所以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兼含中、西思想之優點，且較實際可行。

中山先生不幸在民國十四年以六十歲之齡病逝，其思想惟有靠其同志或追隨者的發揮，而其社會建設之理想終有蔣公中正先生「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之闡揚，使之較為具體化，故中國未來社會指標之建立應參考先哲之大同社會思想及歐

美先進國家所行之具體社會指標措施。本文探討之中國政治哲學思想只以孔、孟、管子，孫中山及蔣中正諸人爲代表，希望能由他們之思想釐出未來中國社會指標建立的方向。

二、儒家之大同社會思想

儒家思想之最大特色乃在爲人民——即「仁」的發揮，以人民爲政治的主體〔註一〕，發揮「民爲邦本」的思想。儒家最具代表的人物即孔、孟。

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四七九）爲殷遺民貴族之後〔註二〕生於春秋戰亂之世，一世栖栖皇皇，冀能爲國所用，以展其才而不得，退而著書教學，開我國平民講學之始，其子弟將其言論輯爲論語一書。今吾人於此書及禮記禮運篇可略窺孔子之理想社會。

孔子之理想社會，簡言之，即要社會能「富」、「均」、「教」，即人民生活富庶，貧富無不均，且能受教育。〔註三〕所以孔子希望有國者能因人民之利而利〔註四〕，使民能足食，使民能富。〔註五〕然而民富而不教，甚或有貧富不均的現象，則無法使社會和諧。因富而不教則易生驕，貧者易生大憂，而大憂則易爲盜。〔註六〕驕，奢，盜的情況，社會就易動亂，天下不能太平。

孔子既感富而不教及貧富不均之弊，乃倡「富」而「教」，並力主「均」財富。「均」字當如何解呢？漢代董仲舒對孔子「均」的註解是「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註七〕這該是「均」字最好的解釋。

惟孔子之理想社會尚不只求政治的清明而已，他尚有最高理想——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孔子希望政治上能達此種境界，使「人能盡其才」——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壯有所用，男有分，女有歸。」此即教育功能的發揮。復次，孔子希望大同世界時能「物盡其用及貨暢其流」即貨不必藏於地，力不必爲己，如此使民能利用自然資源，人人能工作，人人能就業，而達富足之境，而對「矜、寡、孤、

獨、廢、疾者」國家能有社會福利措施使他們都有所養，社會上無一不被照顧，「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終」，一生到死，都能受到國家社會的照顧。那就是政治上，人盡其才；在經濟上，人人有業就，貨暢其流；在社會上，因種種福利措施，無分配之不均；教育上，從小即可受教育，有發展才能的機會。如此使社會上充滿「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的偉大愛，生活也不必受到盜、竊、亂賊的威脅，每日可過安適及夜不閉戶的生活，從生到死（from cradle to the grave）都有了照顧，這豈非今日世界各國社會指標的理想？故儘管世界各國社會指標內涵不一，惟其目標不外孔子之「富」，「教」，和「均」，即達「民有」、「民享」之境界。〔註八〕

孔子以後的大儒爲孟子。孟子（西元前三八五——三〇三？三〇二？）爲戰國時鄒人。爲我國最能夠發揮「民貴」的大哲〔註九〕，以人民爲一切施政或政治的思想的根本。〔註十〕我國的民本思想到孟子發揮到達至極的境界。

孟子一書對養民之事闡述很多，而盡心、離婁、梁惠王上及滕文公上諸篇最爲有系統且有條理，可以說發揮孔子之「均」、「富」和「教」的理想。

孟子之政治社會思想還是起源於當時社會的貧富的不均。例如當時的富人過窮奢極欲的生活，但却毫無悲天憫人之心。仕宦之家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而其家裏却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註十一〕一般的人民平時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真是民有饑色，終身難得一飽。如果天時不利，而政府又剝奪其耕種時機，那麼他們的「父母只有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的地步了，〔註十二〕一旦遇到凶年，老弱只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求食四方」，沿途自然是餓殍了。因此，孟子見到當時的王公貴族不養民行王道，只知以暴力或霸道得天下，自然不無感慨了。

爲了匡正當時爲國者之短視與偏差，孟子乃到處遊說當時的君王（如梁惠王等），告訴他們治國的大道首在使民能養致富。能養的方法在他看來也不是很困難，只要能制田里（即「均」之意），教百姓樹、蓄，不奪農民耕種時間而已。〔註十三〕

果能如此，人民因三年之作有一年之蓄，那麼一般人民到五十歲時可穿衣帛，七十歲時就可以吃肉了，那就是「樂歲終身飽，凶年可免於死亡」的境界。假如不能使人民養生送死，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樂歲要終身苦，凶年不能免于死亡，那麼百姓怎還有心去接受禮義的薰陶？〔註十四〕由此看來，孟子特重人民之基本生命——即人權，政府有「絕對養民安國之義務」〔註十五〕，否則「上慢而殘下」則人民可「反之以不親上死長」，並與國君為敵了。

所以使民富〔註十七〕，那麼，人民因有恒產而有恒心為善〔註十八〕，然後使之受教。人人受教育，明人倫及仁義之大道，此即孔子「富之教之」之義〔註十九〕如此庶可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註二十〕，而矜、寡、孤、獨皆有所養〔註二十一〕，則天下之民心歸矣而可王天下。

由孔、孟的思想看來，兩者實皆以「民」為中心而發揮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即他們的基本思想在能重「人權」。政府重視人民的生、老、病、死（養生送死）諸事。而「富」、「均」、「教」、「大同世界」則為其最高的理想社會，這與二十世紀世界各國推行之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觀念頗能一致。

三、法家之均富思想

法家雖然不是中國的正統思想，然而其理論頗能適合統治階層的需要，這就是我國歷代表面上看來儒家得勢，實內皆用「法」以治的原故。

法家論均富思想較着者的為管仲。〔註二十二〕 管子一書按學者之考證為後人之纂集非管子一人所作，〔註二十三〕惟管仲相齊頗久，似可反應其思想。

管子一書涉及論「富」、「均」、「教」、「養老」者如牧民、權修、輕重用、國蓄、五輔、禁藏、撥數等篇均極詳細，具有價值。

管子相齊桓公多年，故於治道，多少相當了解，彼亦感人民貧窮，貧富不均的不易治。〔註二十四〕因貧困使百姓「危鄉輕家」無所不為，〔註二十五〕而貧富不均之害在使天下法令不能推行。故侈靡篇有言：「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

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以貧富不齊也」。爲了使貧富不致太過懸殊，管仲的方法乃將工商之利收爲國有〔註二十六〕，政府並控制貨幣及鹽鐵數項公賣，以防不肖商人之操縱市場。〔註二十七〕至于農民政府則應給耕農耕種所需之貸款與工具。〔註二十八〕由政府控制一般重要生產交換業務，使商人無法居奇操縱，貧富懸殊之現象在他看來是可避免的。

政府除供給農民農具或貸款外，也須鼓勵他們努力開闢田野，努力耕作〔註二十九〕，如此農富，商人又不得居奇操縱，那麼治理也較容易了。因爲「民富則安逸重遷，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易治也。」〔註三十〕百姓因「食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矣。〔註三十一〕

人民富足之後，必須以教育開導人民使明國家法律，如此百姓不至於產生暴亂矣。〔註三十二〕

至于社會上無助的人們，在管子看來政府必須負起責任來，〔註三十三〕這與儒家所要行之社會救濟與福利政策接近，如此則「民富君無與貧」了。〔註三十四〕

由此看來，管子治國之基本理論是在爲統治者立論，希望由國家之力做好富民等措施，以便國家法律能夠推行。以國家之力消滅貧富之不均，使民富足。若民衆衣食不足，社會就會發生侵奪懷怨的現象。而「民富則易治也」，〔註三十五〕孤苦無助者皆由國家之力扶助之，人民基本生活安定之後，然後引導人民向「四維」（禮、義、廉、恥）的境界，最后才「申之以憲法，勤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如此百姓才會心悅誠服，暴亂之事才不致發生。〔註三十六〕所以管子的學說還是離不開法家的行法，〔註三十七〕惟其基本主張還是以經濟爲首要，而管子的牧民篇實即「中山先生所說的養民之意」。〔註三十八〕

四、孫中山先生之綜合中西理想社會之思想

中山先生一生在歐美的時間相當長久，對當時歐美的社會思潮及社會病態均曾細心的考察過，尤其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貧富相差懸殊極爲注意，因此，他對

中國未來社會建設藍圖亦以能防患歐美社會病態于未然為目標，同時，他又能把我國先哲理想社會的理論加以整理，此所以我們說 孫中山先生的社會建設指標實兼有融合中、西社會學說的優點的原故。

中山先生的理想社會為一「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大同社會」，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的國家。〔註三十九〕

中山先生的社會建設理想早在同盟會時期即有一明白的說明，〔註四十〕當時革命尚未成功，但他已認為革命成功后中國應努力的方向，譬如說，他認為地價之增價應歸國民所享，而不是地主階級。國家應使「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不獲其所」，〔註四十一〕由此可知 中山先生的第一目標還是求全國人民的「富」，此與孔、孟、管子的社會建設理想頗相吻合。

到了民國成立， 中山先生把其社會建設的理想作較有系統的闡述，尤以民國元年他所作的演講，可清晰的看出 孫中山先生所希望建立的社會了。他希望全國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從五、六歲至二十歲止），為日後參政之準備，五十歲以後由國家供給養老金，對社會上無能力自謀生活或子女過多的由國家資養，〔註四十二〕其實這就是教育機會均等和當今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的重要內涵，亦即近代社會指標重要的目標。

然而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並不只是以達到這些為目標。為滿足它最重要的還是要求「均貧富」，即分配財富，「把不平等的事打到平等」，〔註四十三〕沒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一般人都未必為生活而煩惱，如此，國家設立各種不同學校以教育〔註四十四〕，國家設立很多工廠使人人有工作做，至于其他無依無靠者由國家贍養，〔註四十五〕以達社會上之真平等。

除上述之養、教、濟貧外， 孫中山先生的社會設施還包括保育、養老、救災、救濟殘廢、失業、衛生與醫院設備及公共娛樂如公園的設立等項，〔註四十六〕惟有如此，才能達到「自由、平等、博愛」的境界，即大同世界。

至於政府舉辦如此多的福利措施，經費該從何處來？ 中山先生認為可由公營

事業或土地的歲收，增值的地價，山林川澤，礦產水利的利益來興辦。〔註四十七〕

這些福利事業照中山先生之意應由地方政府經營，換言之，即中山先生所主張土地漲價歸公，而其利益應為全國人民所共享的原則。〔註四十八〕

由上面的概述，可知中山先生的理想社會還是繼承孔、孟的大同社會思想，故他說他的「民生主義就是大同主義」。〔註四十九〕惟中山先生不僅只注意到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他尚注意到娛樂方面的精神需要，此點與目前各國的社會指標亦有吻合之處。

五、 蔣公中正理想社會之具體計劃

蔣公以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只談四講，而第四講也不過只談衣、食等二大需要而已，至于住、行兩大需要則在實業計劃中討論過，惟獨育、樂兩大人需要未能有系統的討論為憾，乃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表其對育、樂兩大問題的看法，此即其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由來。〔註五十〕此書實為中山先生理想社會最具體的討論，從養生到送死，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內容均有極詳盡的發揮，因其影響我國未來社會指標的建立，所以我們約略的加以討論。

蔣先生此書最可貴之處即把二次大戰以來各國所推行的社會福利觀念加入並融合於民生主義，使其更為具體可行。譬如生育和養育，他所論及的不僅指醫院而已，他還認為政府應設有教養院、保健院、托兒所，甚至為心理殘缺人民的照顧。至于死亡，他也嚴肅的加以討論。他認為喪事應哀而不傷，但又需能慎終追遠，改革陋俗，因此，為了環境衛生及死者，他認為每市每鄉應設有公衆的殯殮場所及公墓的設立。〔註五十一〕至於樂的方面，除中山先生所提及的公園、娛樂之外，他還注意到心理的康樂，因此，對文藝、音樂、歌曲、美術、電影、廣播、宗教等均有極精確的發揮，他不僅要政府充實內容且要提高其品質。〔註五十二〕此外，他對身體的康樂（如體育、健康習慣，必具技能如駕駛、操舟、游泳等）也都有極系統的分析，至于教育的方針，任務設施和內容等也都有極為精闢的批評與主張，

所以整書的目的，就在充實人生生活的內容，以達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和「太平世」的境界。〔註五十三〕

六、結 論

如何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指標？我國從先哲到 蔣公都有一脈相承的理想，先哲們看到一國治亂的根本在於是否能實行「均富」政策和供給完善的教育。這些看法與當今社會指標的內涵是有一致性的〔註五十四〕，而孔子的大同思想（內容包括有齊家，振濟孤苦，經濟的均富，社會秩序的維持，教育的供給知識及品德的陶冶等）更是今日世界各國社會學家所要建立社會指標的重要內涵。

惟我國過去社會思想的倡議者，大部分為不在位的知識份子，因此他們的言論也很少被採用，而他們也只能盼望明君的出現（如孟子所說「明君制民之產」）來實現他們的理想。然而明君在我國史上並不多見，而且所謂明君也不過只是以「省稅薄歛，輕徭役」，而已。政府的功能純視統治者的賢愚而定，因此，歷代社會福利或社會救濟措施大概以無計劃者較多，例如天災人禍的救濟或減稅，民間亦以義賑為主，以發揮民胞物與的精神，故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政策以消極者居多。

細考社會政策，早期在歐、美各國亦以救濟孤苦為主，假如英國一六〇一年伊莉莎白的「窮人救濟法案」，其規定教區有救濟窮人之責，〔註五十五〕從一八九七到一九三〇年，西歐各國均在推行社會救濟和安全措施，德國更早。到一九三四年美國 Franklin Roosevelt 總統宣佈政府有一定的責任使用其職權和資源以應付社會問題，並認為一般人有經濟、政治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註五十六〕此種明白把社會福利當做國家應有的責任應是創舉，而這以國家之力來創造幸福社會的意旨與 孫中山先生及 蔣公的看法一致。由此可知過去政府被認為應該少管事，凡是管得愈少的政府愈是好的政府勢將成爲過去。由目前世界各國所做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和安全制度看來，國家要做和要管的及花費恐怕愈來愈多，責任愈來愈重，這是先進工業國國家功能看法的轉變之一。〔註五十七〕

復次，過去政府的功能似乎均在有形的或物質上的救濟，教育被認為只是陶冶品格道德，將來便於治理的工具，目前世界的社會指標已注意到積極的和精神的實質意義上，例如不僅有房子住而要住好的房子，並有良好的環境（社區）。政府也在幫助每個人或每個家庭達到他們所需選擇的東西。教育的功能在使才能不致被湮沒等等〔註五十八〕，這在孫中山先生及蔣公均已注意到，且要求以後政府的措施朝這方向努力。

然而儘管政府責任愈來愈重，未來我國社區及民間團體參與社會指標的制定也不能不注意或予放棄。事實上，社會工作應由社區直接參與，才能更有效果，此故歐、美社區地位愈來愈重要的原因。〔註五十九〕惟有經過社區這些輔助機構或其他代表的參與才能使社會指標的內容做得有效率及有責任的發揮。〔註六十〕

過去，先哲對如何因應社會建設的經費均很少提及，這要到孫中山先生才以具體的土地增值稅來做社會建設工作，惟我國在民國四十年以前政治不穩，中山先生的理想一直不能實現，直到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國民黨九屆二中全會制定「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加強社會福利措施增進人民的生活實施方針」時始規定具體的財源，當時決定以推行都市平均地權，地價重新申報後，將地價稅超收全部作為社會福利基金。〔註六十一〕民國五十五年的第一期社會福利計劃財源即根據此項決定，此後民國五十七年，五十八年，和六十五年均強調都市地漲價歸公用途〔註六十二〕，惟實行上有不少人認識社會福利的積極功能，只認為是單純的消耗，因此常將經費挪至他用。〔註六十三〕這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總之，我國的政治思想是希望政府能使人民「養生送死」，「能均富」，並能使每人能夠受教育，社會的救助應及於孤苦殘廢無助的人民。政府應使每個人都有職業，社會秩序能達夜不閉戶的境界的大同社會。因此，我們如何計劃使其能具體化實行並採取歐美先進國家實際實施的內容，研討其實行過程中所發生的障礙或難題，例如我們不可使社會福利變成養成人民的惰性，以及工作人員的浪費公帑等。〔註六十四〕做為我們實行社會指標的參考。目前我們並不缺崇高的理論，我們所

需要的只是如何採取他人的優點並改進其缺失，並發展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實行方法與理論，並加緊實行。我們一方面要加重政府責任，一方面也要強化監督政府的民意機關，使他們發揮權力，引導政府實行社會指標的方向，優先次序和經費的合法開支等等，這實在是我們釐定社會指標很重要的課題。〔註六十五〕

爲了有效實施和推行社會福利的工作，我們必須確認它是一項永久性而非浪費的工作，它是一個尊重人權，實現「民胞物與」的觀念，它是一個實行 from womb to tomb 的方針，因此，爲了能有效的推行社會福利措施，我們必須根據先哲的「富」、「均」、「教」的原則釐定細目，參考先進國家的社會指標內涵，及早制定一套健全的社會指標及其實行的重要方案〔註六十六〕，尤要者，我們要確立「社會工作人員」制度，使其能以「個案工作」方法辦理工作，以利均富社會的實行。〔註六十七〕

註 釋

- 〔註 一〕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六十六年版），頁一九四。
- 〔註 二〕同上，頁五二。
- 〔註 三〕見論語之子路篇、季氏篇，孔子家語，卷三，賢君第十三。
- 〔註 四〕見論語堯曰篇。
- 〔註 五〕見孔子家語卷三賢君第十三；秦學明「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期（民六十六年，四月一日），頁四七。
- 〔註 六〕林桂圃「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九期（民六十六年三月一日），頁一九。
- 〔註 七〕引自林桂圃「孔子的政治思想」，頁一九。
- 〔註 八〕蕭公權，頁一九四。
- 〔註 九〕同上，頁一九四。
- 〔註 十〕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一四五。
- 〔註十一〕孟子梁惠王上。
- 〔註十二〕同上。
- 〔註十三〕同上。
- 〔註十四〕孟子滕文公上及梁惠王上。
- 〔註十五〕蕭公權，頁九。

〔註十六〕孟子答鄭穆公問，蕭公權，頁九。

〔註十七〕孟子盡心篇：「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註十八〕孟子梁惠王篇：「無恒產而有恒心產，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

〔註十九〕孟子滕文公篇；馮友蘭，頁一五二——一五三。

〔註二十〕孟子梁惠王上。

〔註二一〕孟子梁惠王篇「此四者（即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可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堯獨。」

〔註二二〕管仲生年不可考。法家之荀子，亦主富民，如王制篇「王者富民」，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漠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具矣。」可見荀子之思想與孔、孟頗爲接近。見周金聲，中國經濟思想史，（台北：周金聲著作發行所，民五九年），頁九一。

〔註二三〕賀凌虛，「管子的治國方略」，中國歷代政治理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七年），頁四八。

〔註二四〕管子五輔篇「貧富無度，則失，」侈靡篇「甚富不能使，甚貧不能聽」。

〔註二五〕管子治國第八。

〔註二六〕蕭公權，頁二〇八——二〇九。

〔註二七〕管子國蓄七十三，海王第七十二。

〔註二八〕管子輕重丁第八十三；賀凌虛「管子的治國方略」，頁五六。

〔註二九〕管子五輔篇。

〔註三十〕管子治國篇。

〔註三一〕管子牧民篇。

〔註三二〕管子權修篇。

〔註三三〕管子五輔篇「奉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事禍喪，…衣凍寒；食饑渴，匡貧憤，振罷露，資乏絕…」禁藏篇「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

〔註三四〕管子山至篇。

〔註三五〕管子治國篇。此與慎子（無卒年月可考）之語亦有相通之處，慎子亦以富民爲國家第一要務。慎子有言：「民富則治易，民貧則治難。民富則重家，重家則安鄉，安鄉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輕家，輕家則危鄉，危鄉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爲國之道，在富民而已矣。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見周金聲，中國經濟思想史，頁二五八。

〔註三六〕管子權修篇。

〔註三七〕管子牧民篇「刑罰不足以畏其義，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 〔註三八〕周金聲，中國經濟思想史，頁一七三。
- 〔註三九〕孫中山先生「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六十二年）頁六一〇，六七〇——六七一，六七七——六七八；葉青，國父育樂兩篇研究（台北：中國政治書刊社，民四三年），頁四二。
- 〔註四十〕「同盟會宣言」見張其昀著，黨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六八年），冊一，頁五九——六〇；周金聲，頁八九五；國父全集冊二，頁二二〇。
- 〔註四一〕周金聲，頁八九五。
- 〔註四二〕周金聲，冊三，頁八九九——九〇〇。
- 〔註四三〕孫中山先生「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國父全集冊二，頁六四四，六七〇，六七八。
- 〔註四四〕孫中山「地方自治實行法」，國父全集冊二，頁一七。
- 〔註四五〕孫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國父全集冊二，頁六七〇——六七一。
- 〔註四六〕崔書琴，三民主義新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三年），頁三九七；孫中山先生「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國父全集，冊二，頁二九八——二九九。
- 〔註四七〕建國大綱第十一條在國父全集民六二年，冊一，頁七五二。
- 〔註四八〕建國大綱第十條，國父全集，冊一，頁七五二。
- 〔註四九〕同上，民生主義第一講，國父全集，冊一，頁一五七；林桂圖「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九期（民六六年三月一日），頁二一。
- 〔註五十〕蔣中正，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國父全集，冊一，頁二二三。
- 〔註五一〕國父全集冊一，頁二四六——二四七。
- 〔註五二〕同上，頁二六九——二七五。
- 〔註五三〕同上，頁二八一——二八二。
- 〔註五四〕Kenneth C. Land and Seymour Spilerman eds.,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pp. 21-24.
- 〔註五五〕參 "Welfare and Security Progress"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75, p. 743.
- 〔註五六〕R. C. Birch, *The Shap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Longman, 1974), p. 5.
- 〔註五七〕羅時實，三民主義與當代政治趨向，（台北：華岡出版社，民六三年），頁一一——二一四。
- 〔註五八〕Morris Janowitz, *Social Control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Elsevier, 1976), preface XII; R. C. Birch, p. 3.
- 〔註五九〕Birch, pp. 6-7.
- 〔註六十〕Janowitz, preface XII.
- 〔註六一〕談益民，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五四年），頁九。

- 〔註六二〕邱創煥，中國社會福利思想制度概要，（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六年），頁二五二六。
- 〔註六三〕白秀雄，社會福利理論與實際，（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六年），頁二——三。
- 〔註六四〕邱創煥，頁一一——一二。
- 〔註六五〕Janowitz, preface XII.
- 〔註六六〕劉脩如「建立社會安全改善國民生活的方向」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期（民六六年四月一日），頁二二。
- 〔註六七〕同上。

參考書舉要

(一)中文部分

- 十三經注疏（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之部）台北縣：藝文印書館，民六五年。
- 孟子注疏 台北：中華書局，民五七年。
- 管子 台北：中華書局，民六二年。
- 孔子家語 台北：中華書局，民五七年。
- 蕭公權 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六六年。
-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台灣影印本，不著年代。
- 國父全集 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六二年。
- 蔣中正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國父全集第一冊二二三——二八三頁。
- 葉青 國父育樂兩篇研究，台北：中國政治書刊社，民四三年。
- 張其昀 黨史概要，第一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六八年。
- 周金聲 中國經濟思想史，台北：周金聲著作發行所，民五九年。
- 崔雪琴 三民主義新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三年。
- 建國大綱 在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六二年。
- 羅時實 三民主義與當代政治趨向，台北：華岡出版社，民六三年。
- 談益民 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五四年。
- 邱創煥 中國社會福利思想制度概要，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六年。
- 白秀雄 社會福利理論與實際，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六年。
- 劉脩如 「建立社會安全改善國民生活的方向」，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期（民六六年四月一日），頁二〇——二四。
- 秦學明 「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期（民六六年四月一日），頁四五——四八。
- 賀凌虛 「管子的治國方略」在歷代政治理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七年，頁四七——七二。
- 譚振民 「均富的理念與政策」東方雜誌第十二卷第七期（民六八年一月一日），頁三二——三九。

林桂圃 「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九期（民六六年三月一日），頁一八——二二。
龍冠海 「孟子的社會思想」，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九期（民六五年三月一日），頁三二——三六。

(二)英文部分

Encyclopedia Britanica, 1975.

Kenneth C. Land and Seymour Spilerman.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R. C. Birch. *The Shap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Longman, 1974.

Morris Janowitz. *Social Control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Elsever, 1976.

李錫銀評述

賴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比社會指標更基本的問題，即社會環境（social milieu）的問題：西方社會和社會學界在近百年來所追求的服務平民（masses）的觀念，中國早在二千年來即已不斷強調；由此我們可看出，中國的政治哲學比西方優越的地方，就是對民本思想的肯定。但是由於缺乏方法學與方法，所以雖然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平民社會（mass society）的民本觀念，卻無法提供一個可資運作的理論架構。例如：貞觀之治一直為我們所欽佩，但是貞觀之治下的人民生活情形究竟如何？又如蒙古統治下中國的人民生活又如何？缺乏這種運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我們就談不上瞭解我們的社會狀況。又如我們已經反共數十年了，過去在大陸時大都著重於軍事和宣傳上的反共，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因素即產生共產黨及使共產黨壯大的社會環境。我們可以說，日本的侵略及美國的政策只是導火線而已；真正導致共黨竊據大陸的因素，恐怕是社會環境的因素。從社會學的觀點，如果徒有關心社會群眾福利的概念而缺乏運作化能力，對解決群眾的問題是幫助不大的。

東、西方思想的差異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封建制度瓦解時間的不同。文藝復興後，封建貴族為了抵抗神權，提出了平民的觀念（如洛克的學說等），用平民的觀念來打擊神權，因而建立了所謂「世俗化」的民族國家。平民逐漸做生意，變成中產階級；等到力量壯大後，又和貴族發生衝突，終於發生法國大革命的高潮。工業革命後，再度形成平民與資本家的對立。此後一、二百年，社會學家稱歐洲歷史為維多利亞時代階級鬥爭的發展史，社會學也在這種階級的鬥爭的背景中，逐漸發展壯大。至二次大戰的二、三十年間，社會學才發展到一個高峯。所以從西方社會學的發展來看，以研究群眾的福利為著眼點只是最近的事，中國二千年來即已存在，只是缺乏運作的方法而已。

如果能把西方近百年來在社會科學方面所發展的實際運作的方法及架構拿來研究自己的社會環境，就成為中、西理論的融合。從賴博士的文章中看出，雖然我們幾千年來就是一個mass society，但由於脫離運作的範疇太久了，反而顯得不太重視平民的福利。陸教授的論文中，提到外國的福利制度，好像從個人的頭髮到腳毛都顧及到了。相比之下，頗令我們慚愧。目前，我們必須努力的是把民本的概念盡快運作化，從人民的基本的福利著手，例如：收入、財富、機會的平等、權力的分配等，這也是今後社會指標努力的重點。

今後，我們如以中國固有的民本哲學為基礎，結合西方運作的方法，相信定能比西方社會學更早達到消除階級、歧見，安和樂利的大同境界。

社會指標與生活素質：回顧和批判*

蕭 新 煌**

一、社會指標運動

美國自從殖民時期以來，便一直有詳細的經濟交易記錄。爲了想知道整個國家當時的情況，以及未來的動向，各種統計數字乃被用來描述國家的經濟狀態。特別是二次大戰之後，經濟會計系統更成爲公共政策中頗具影響力的工具。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國民生產毛額增加了兩倍以上，指出國家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和富裕，平均每戶所得亦大幅度增加。國家的經濟前途顯得無限光明。但同時美國也有顯著的犯罪、毒品、示威、種族不安、都市危機、環境破壞、破碎家庭增多，民衆對政府官員的信心急遽下降，重新發現「另一個美國」的貧窮，甚至社會和政治疏離感也大幅度增加。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雖然經濟指標顯示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國家的某些方面却顯然已有了問題，單純的經濟指標並未能預知。因此人們開始懷疑「經濟成長」是否就等於「社會進步」，也逐漸體認到單是經濟指標已經不足以描述、測度及評估「社會的」變遷與進步。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社會科學家、公共政

*原稿係英文，蒙雷倩和鄭又平兩位同學協助翻譯成中文的初稿，特此致謝。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兼行爲研究組代主任，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策制訂者與政治家乃開始尋求另一種適當的工具和指標。他們的集體努力被Duncan (1969) 稱為「社會指標運動」，目的在發展新的統計序列以監督被廣泛認識到的一些社會生活範圍的變遷，譬如：教育、衛生、就業、犯罪受害、政治參與、人口成長與組成、公共安全，甚至於國民對生活的一般看法和感覺等等。由於社會指標運動背後的驅力之一，就是不滿經濟指標所描繪出來的國家景象，早期的社會指標作品幾乎都是旨在銜接這一差距，以期提出一個較真實的全國狀況。社會指標，正如其形容詞「社會」二字所顯示，是代表著對「經濟」指標的一種模倣與叛離。所謂模倣，就是社會指標雖然角度不同，但跟經濟指標一樣，也是在測度與分析國家的現況及未來方向。所謂叛離，可由早期社會指標堅持「社會」即「經濟範疇之外」的看法，表現出來。顯然隱含的同質性並不存在。不過，目前的研究重心則已經轉移到較整合的方式，只要求指標能夠描述「當前社會狀況及趨勢」藉以「描繪出社會真實狀況的全貌」(*Social Indicators*, 1976: XXiii)。

Bauer (1966) 曾追溯美國的社會指標運動，指出其起源是一九六二年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計劃中的一項研究。該研究是由美國文理科學院從事調查，以決定太空計劃是不是對美國社會已有一些所謂之「次級」影響與結果，以及它們的性質和幅度是如何。換句話說，該院的意圖超出了原定計劃的目的，無意中或間接地則延伸到探索太空計劃對美國社會的全面影響。結果使得一些參與研究計劃的人員，將注意力轉移到發展一套有系統的理論架構以及相關的研究方法，從而產生從事全盤性社會分析所必須的資料(Land 1975: 8-9)。啟發他們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他們感到要測度太空計劃帶給全國的改變(社會——經濟——政治——科技的)，不能沒有一套有效的測度系統(Bauer, 1966: 1-8)。研究的結果刊載於一九六六年出版的 *Social Indicators*，編者是研究社會指標的先鋒之一 Raymond Bauer Kenneth Land 在評論該書之際，做了以下的說明：

本書各章所討論的是：目前急需要比經濟指標更能看出社會各面的指標，最終需要一套改良的資訊系統，以及利用這些指標來改進社會政策各個範

疇中決策的結果(Land, 1975: 9)。

另一支持社會指標發展的重要計劃，是在同年(1966)由全國技術、自動化和經濟進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策動的技術與美國經濟研究計劃，並出版*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y*。社會學家 Daniel Bell 是委員會的一員，他促請美國政府建立一套「社會會計體系」，以期能對公共計劃做更綜合性的成本效益分析。Bell (1969: 78)同時也注意到我們目前還沒辦法把發生在周遭的社會變遷陳示出來。這個計劃之重要，是因為這是第一次由政府組成的單位所提出的社會指標計劃。報告中認為，社會指標應可在廓清政策選擇時，發揮一種類似「資產平衡表」的功能。這和前述研究院計劃的看法一致，可見當時社會指標已被認為與政府政策有關，雖然那時還不確定是如何相關的。

當時任參議員的孟岱爾(Mondale)更進一步提議由總統組織一個社會諮詢委員會(Council of Social Advisers)，每年向國會提出一份「社會報告」，類似每年的「經濟報告」一樣，將在政府的政策擬定執行和評估都佔重要的地位。至此，社會指標的鼓吹者都相當一致的在強調它的政策性功能(McVeigh, 1972; Campbell, 1976; Sheldon and Moore, 1968; Horn, 1975; Milbrath, 1979; Brand, 1975)。

除了較早的作品外，有關社會指標的主要學術著作(按出版順序)包括：(1) B. Gross的*The State of the Nation: Social System Accounting* (1966)：提出了一套國家層面的「社會系統會計」普遍模式。其中心概念為「系統結構」與「系統表現」(system performance)，並探討二者在構建社會會計系統時之關係。(2) Sheldon & Moore的*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1968)：界定社會變遷為重大社會結構的易動或轉型，並認為這些變遷都應加以記錄，確定、和監督，而所需要的就是一套完整而有用的資訊系統。本書更新了Ogburn對測度社會趨勢的傳統。為了回答：什麼在改變？本書重

點落在五個社會運作的主要功能特徵：人口基礎與移動；社會結構的主要單元，如生產、勞工、科技、親屬關係、宗教與政體等；分配特徵，包括消費、健康、教育、娛樂、休閒；集合特徵，包括社會階層和流動，文化同質性和多樣性等；以及福利與福利的測度。Bell 認為它是自1933年 *Recent Social Trends* 一書以來對美國社會主要層面報導分析最完整的作品（Bell, 1969: 78）。值得一提的是 *Recent Social Trends* 的原委，它是由 William Ogburn 主持，在一九三三年由胡佛總統下令組成之社會趨勢研究委員會出版。這可以說是美國最早討論當時美國生活各層面發展趨勢的統計報告。該委員會同時也在 *AJS* 上出版一份年刊，由 Ogburn 主編，主要討論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之間的社會變遷。這項嘗試後來受到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的影響而終止。雖然一九四二年 *AJS* 又出版了一期「近期社會變遷」的特刊，但二次大戰後就再沒有任何出版品了（Land, 1975: 8）。因為戰後的美國社會學耽陷於社會現象的橫斷面分析，面對歷史的探究較不感興趣，多少犯有一種「靜態的偏見」（static bias）。這點從廣泛對功能理論無法解決變遷的不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Lockwood, 1956; Guessous, 1967; Dahrendorf, 1959, 1964; Parsons, 1964; Cancian, 1968）。

另一本重要的學術著作，是一九七三年由 Angus Campbell 與 Philip Converse 合編的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本書對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1968）既有相輔之功，又有質疑之效；重點在探討身處變遷社會的美國人民；他們真正的態度、期望、慾望、價值等「主觀」社會心理層面。而 *Indicators* 一書的重點則是各種「客觀」的社會結構面的資料（Campbell and Converse, 1972: 5）。因此，本書各章也嘗試用前書曾討論過的家庭、經濟、就業、政治、刑事司法等主要客觀社會變遷的內涵做主觀層面（即人們的認知與感受）的分析。*Human Meaning* 使研究社會指標的學者體認到有必要去評估人們對變遷的主觀認知，以及他們的「生活素質」。故可說本書為社會指標運動指出了一條新方向（Land, 1975: 11; Campbell, 1976: 117-120）。

二、政府對發展社會指標的努力

一九六九年一月，HEW 出版 *Toward a Social Report*；這是政府對學術界呼籲社會報告的一個積極的官方回應。這份報告書曾定義社會指標為：

「此處所謂社會指標，意即一種使吾人得到簡明、綜合和公正判斷社會主要層面狀況的統計系統，它具有直接和規範的功能。質言之，它就是對福利的一種直接測度，當這測度朝著「正確」方向變遷時，就能告訴我們目前的景況是愈來愈好，人民的福祉也愈來愈增加。本此，醫師警員數並不是社會指標，健康狀況與犯罪率等才是（HEW, 1969: 97）。

該書並不是一份完整的社會報告，它只審視了幾個重要的社會領域。它探討了許多不同的方法，用以協助監察在一些國民生活範疇中變遷的社會情況如健康和疾病，社會流動、物質環境，所得和貧窮，公共秩序和安全，學習，科學和藝術，參與和疏離感等。本書更強調那些可用的統計數字應該一方面能夠聚集為一般的層次，經過摘要之後可以拿來處理和運用；另一方面也應該可以分離為相關的社會單位層次，而做出更詳細的分析。*Toward* 一書並且區分了社會指標與較易得的社會統計數字（如政府支出）。社會指標較關心的是社會政策和社會過程的「產出項」，而一般的統計記錄則偏重在政策或過程的「投入項」，譬如說犯罪率是社會指標，而警察人數則只是統計量而已。Horn (1975: 489) 更進一步區分兩者的不同，他指出，當前指標運動的特點就是特別著重將統計應用到社會與經濟現象，尤其是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上，統計方法本身可能並不新鮮。換言之，依照 *Toward* 一書和 Horn 的觀點來說，社會指標就可以從那些原始的資料當中按某些既定的目標而得到，只要它們能測量出我們所要測量的社會變遷與趨勢就可以，社會指標可以以時間序列、指數、或是綜合指標等不同型式表現。

既然 *Toward* 一書依定義不是社會報告。Duncan 便在他所著的 “*Toward Social Reporting: Next Steps*” (1969: 13) 裡建議用許多方法建立實際的社

會報告。爲此，Duncan 提出利用現有資料，並建立新的資料基礎(data base)，然後隨著定期彙集有用的資料，藉以衡量社會變遷，他稱此一觀念爲：基線研究的再製。

自一九六九年的努力之後，美國政府曾數度試圖實際發展出社會指標。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由預算管理局出版的 *Social Indicators, 1973* 和 *Social Indicators, 1976* 兩大冊。一九七三年版包括八個主要社會生活範疇的時間序列資料，這八個社會生活領域分別是：衛生、公共安全、教育、就業、所得、居住、休閒娛樂，和人口。指標的選擇根據下列兩個標準，第一，指標應測度個人及家庭福祉(而非制度或政府的)，第二，它們該反映的是社會過程的「結果」或「產出」，而不只是資源的投入(進入社會系統)。一九七六年版形式上大致與前一版相同，另外加進了三類社會領域：家庭、社會安全及福利，社會流動及參與，共計十一章。在這兩次全國性社會指標報告之間有幾點令人振奮的發展，茲摘要如下：

1. 一九七六年版擴大了資料的來源，除政府的統計數字外，也引用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結果，例如：密西根研究所對生活素質主觀認知的研究，NORC中有關婚姻與離婚態度的資料，James N. Morgan 對貧窮的時間縱向研究，John Robinson 有關時間運用的資料，以及Robert Hauser與 David Featherman 的職業流動趨勢研究(Robert and Seidman, 1978: 11)。

2. 一九七三年版僅包含客觀狀況與系統表現的資料。而新版除福祉的測度外，還包含了大量公衆認知(主觀測度)的資料。至於有關社會結構與體系表現方面的資料，則較有限。至此，生活素質的主觀測度乃被正式認可。這點是非常有意義的。

3. 一九七六年版中，提出了一個較廣泛、或許也較實用的社會指標定義。在前一版中，社會指標的概念聯結在社會目標的概念上，「理想上，…指標應能顯示出…某一人口或社會在某一社會目標達成上的地位…」(*Social Indicators, 1973*)。這種說法雷同於一九六九年 *Toward a Social Report* 裡對社會指標所揭櫫的看法。不過這樣一來，必然會造成詮釋社會指標時的困難。典型的例子就是離婚率

。離婚率增高究竟是使人們接近或遠離某社會目標呢？Duncan 就認為婚姻的中斷一方面有害於兒童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配偶得以終止一項無益的關係，而再度追求幸福（Duncan, 1974: 9）。社會是採取那一種看法呢？再說，現在所採持的看法未必是將來認定的社會目標。如果社會指標真如提倡者企圖相信的，具有預測功能，那又應該如何去解釋呢？*Social Indicators, 1976* 解除了直接的規範性限制，只將社會指標定義為「統計數字或統計測度……以描述某些受社會廣泛重視…關切的主題中，一般人民的狀況」（XXIV）。它並且主張報告中的統計序列的組合，並不能取代社會分析家、評論家、和批評家的洞察力與詮釋。讀者可由不同的角度，根據這分報告的資料，獨立的去評估我們社會的狀況與方向。不過，*Social Indicators, 1976* 並不是為了這種評估的目標而設計的。正因如此，本書的缺點是未能突破一般資料的特性及限制，也無法就此趨勢證據，進一步去探索若干特定的結論；它沒有解釋統計序列為什麼有如此的變動、也更無法說明統計序列之間有什麼重要的相關（Parke and Seidman, 1978: 15）。資料是不會自己說話的。顯然，我們還需要發展出能安排社會統計資料，並能用以解釋的理論模型才行。

4. *Social Indicators, 1976* 是為較大讀者群而出版的，它包含了一個部份，教讀者如何閱讀統計圖表。比起一九七三版，一九七六版對資料素質問題以及如何解釋指標，也有較多的討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社會指標報告的確可負有教育的功能，它可以為負擔出版費用的民衆提供社會資訊。也更能藉此引發民衆與政治過程（政府）對國家目標及未來方向的討論和辯識。因此，讓社會指標報告能夠使每個關心的公民與團體，特別是各級教育機構去廣泛閱讀，是極為重要的。台灣今後或許也該這麼做。

自一九六六年社會指標一辭正式使用，到 *Social Indicators, 1976* 的出版，其間不過十年光景。然而，已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只消對照 *Toward a Social Report* 中指出此事的必要，跟 *Social Indicators, 1976* 中重大的成就就可看出。不過，社會指標的發展過程，要遠比許多鼓吹新指標者所預期的更為冗長、複雜

(de Neufville, 1975: 10)。美國的情形就足以說明此點。在某種意義上，*Social Indicators, 1976* 不僅是原來所宣稱的一份對美國社會進步之報告，而更是對社會指標與社會報告本身發展的進度報告。顯然兩方面都有待改進。台灣是社會指標運動的新進者，當可引美國之經驗為殷鑑。

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於一九七〇年成立的「社會指標研究協調中心」曾舉辦一次針對 *Social Indicators, 1973* 的研討會 (Van Dusen, 1974); *The Annals* 雜誌也出版了專號來討論 *Social Indicators, 1976* (參考 *The Annals, January, 1978*)。對有志研究社會指標的人士，這兩冊評論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

此外，美國近年來也有許多較為專門就某特定社會部門的指標報告。下面效舉其犖犖大者：

1. 科學指標，1974 (*Science Indicators, 1974*)，由全國科學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Board*) 出版；
2. 住宅、鄰里素質年度報告 (*An Annual Report of Housing & Neighborhood Quality*)，由住宅和都市發展部 (*Dep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出版；
3. 健康指標，1975 (*Health United States, 1975*)，由全國健康統計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出版；
4. 教育統計年度報告 (*An Annual Report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由全國教育統計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出版；
5. *STATUS* (實驗性的每月社會報告，從 1976 年 7 月至 10 月)；但不幸因故停辦。由人口普查局和管理和預算署 (*Bureau of Census and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出版。

截至目前，至少有廿九國已發行類似社會指標的全國性報告，大多數是由政府機構編製的。其中有些國出版年度社會指標報告，如：法國、以色列、巴拿馬、西班牙、瑞典、英國、以及中華民國 (社會福利指標)。澳洲與加拿大則出版每兩年

一期的報告。不定期出版社會指標報告的國家則有：奧地利、巴西、哥倫比亞、丹麥、西德、印度、印尼、義大利、日本、馬來西亞、荷蘭、紐西蘭、挪威、菲律賓、瑞士、芬蘭、美國等（參考 *Social Indicator*, 1976: XXVII-XXIX; Horn, 1975: 487; Park and Seidman, 1978: 11）

無庸置疑的，各報告的品質必然不同，而且也很難在其中找出有系統的相同與相異點。就以美國的和歐洲的社會指標做比較時，即顯示出一項有趣的發現。Natalie Royoff Ramsay 發現這兩地區對報告中總的社會指標做分離的處理時，它們的方式有所不同。美國的指標比歐洲的較側重「集合」式的，即使是做了分離的處理也跟歐洲的方式不一樣。 *Social Indicator*, 1976 大多是以年齡、性別和種族來分離集合指標，而歐洲報告則按某些社會經濟類屬來分離，如社會階級、社會團體、或職業。顯然，歐洲的報告對社會如何運作能提供較深入的觀察，並且也較能引發讀者及論者對「如果社會的結構特徵如職業分佈、各種職業的地位、生產力或聲望差異等，有了改變時，社會情況將會如何？」這樣子的問題的臆測和探索（Ramsay, 1974: 47）。這只是一個手邊的比較例子，其他的差別則可見於個別指標資料選擇的素質、組織、背後的社會理論模式、及政策相關性等等。這種不同指標報告做跨國比較，可以讓我們注意到社會指標報告在不同國家社會結構中，可能發揮的功能。如果中國的社會科學界確實有意在台灣發展出社會指標系統，那麼上述的廣泛而深入之各國指標比較，應當是個好的開始。

簡言之，社會指標運動已不只是美國的運動，而已成爲世界性的運動；其目的在尋求更好的社會資訊與數據，以達成更佳的政策判斷。這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尤爲特別重大。 *The Annals* 曾於一九七一年一月號以整期的篇幅討論「發展中國家之社會資訊」。貫穿全冊的主題是社會資訊的稀少，特別是有關社會指標的資訊將無疑的會阻礙了國家發展。此外，也徹底檢討社會指標的某些觀念、目的、建議及技術是否會對「發展」和「發展計劃」有所貢獻？

三、社會指標之意義與功能的再檢討

由前面的討論中，大概可以得知社會指標是什麼，以及其作用。不過，由於對社會指標的意義和功用還不夠清晰和缺乏共識，故仍有許多爭論存在（Horn 1975: 3-5; Land, 1975: 12-14; McVeigh, 1972）。

比較前述三份政府社會指標報告所提出的定義，顯示出對社會指標界定有了一些明確的轉變。過去不論官方或學術界的著作，都太拘泥於規範性目的，對於這一點，Sheldon & Freeman(1970: 98)與Duncan(1969: 3-4)都認為規範性定義太過嚴格，很可能會因此排除了許多對實際了解、評估主要「社會情況與趨勢」有用處的變項和資料。

此外，早期的發展強調需要高度的「集合性」，可能也需要加以斟酌；因為當指標資料按人口性質加以分離處理之後，反而會增加對社會情況的理解。再者，早期的社會指標研究者也過分強調社會生活情況的客觀層面，而却忽略了生活素質的主觀層面。令人振奮的是，*Social Indicators, 1976* 的確顯示了逐漸走向另一端新方向的跡象。主觀社會指標（將於後文中論及）能夠反映出時代與人民的某些精神，也能夠提供一條基綫，用以說明未來國家中民心、民情的轉變和趨勢。

歸納上面這些新的社會指標方向，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下面三個有用的定義：

1. 社會指標為可用以做長期的比較的時間序列，不但能藉以掌握長期趨勢，也能看出通常較劇烈的波動率（Sheldon and Freeman, 1970: 97）。

2. 所要求的是一套有限却綜合的一貫且顯著的指標；既能施以長期監察，亦可分散至相關社會單位的層面（Andrews, 1973: 5）。

3. 社會指標是測度各部分人口的社會情況與長期變遷趨勢的統計數字。其中社會情況包括特定社會中人類生存的外在（社會與物質）與內在（主觀與認知）的環境。不管是外在社會情況的客觀測度，或是與之對應的主觀測度都是可能的社會指標（Land, 1975: 14）。

就像其他的社會運動一樣，社會指標運動引起了不少的狂熱，特別是對指標的功用方面。一般來說，社會指標能對社會趨勢提出較佳的描述報導與理解，同時也有助於分析研究社會變遷，甚至或能辯識造成某些變遷「後果」的原因，並預測社會變遷。我們頂多還可以預期將社會指標用於發掘社會問題（社會病態），推動未來對社會行為的深入調查。不過有些鼓吹社會指標的人却把它想得太過萬能。McVeigh(1972: 11)在一份有關社會指標的文獻目錄中，綜舉了社會指標的十二個大功能，範圍自上文所引，一直到若干根本就值得質疑的功能。譬如說：計算社會計劃付出的社會代價、研判國家目標及其優先順序並指出可以用來管制變遷的一些工具。

反之，Sheldon與Freeman (Sheldon and Freeman, 1970: 99)和Andrews (Andrews, 1973: 6-7)却懷疑社會指標有那麼大的功用。他們認為許多常說的社會指標功能，並不太可能發生：

1. 社會指標的研究者常過分誇張說它有替社會設定國家目標與優先順序之能力。指標能提供設定目標時有用的資料，但絕對無法使社會選擇的過程更理性化。目標與優先順序牽涉到價值、利益、利潤、相對成本，以及政治權力（政治考慮），而這些是社會指標自身所無法衡量的。

2. 或曰，社會指標的管制能評估特定公共計劃，譬如像針對種族不安、毒品藥物、貧窮、所得分配不均、犯罪、都市重建與郊區發展的計劃等。近來對此也表示懷疑。社會中有許多因素能造成變遷，唯有精密的實驗性設計才能決定是否某一計劃能達到其預定目標。光是社會指標還無法分辨出特定計劃的真正效果，也無法控制外在變項造成的間接效果。

3. 高估了社會指標可以用來做全面「社會平衡表」或「社會會計制度」的可能。這個觀念是說我們可以將人民的滿足、政治參與、經濟福祉相加，減去他們的不滿、犯罪、人口、疏離感，而得到一個指數。這種以為一套權數，就能夠適用於各種可能含義完全不同的指標的看法，顯然太過單純化。事實上，這樣一份單一的平

衡表；在理論上與方法上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公平的評估社會指標，我們可以小心的採用 Wolfgang Zapf 的五種功能。（Zapf, 1975: 489-90）。Zapf 評論了十種社會指標系統，綜合的提出五種各家學者所主張的社會指標功能。它們是：測度功能、評估功能、會計功能、解釋功能、以及創新功能

以社會指標研究的現況來判斷，測度功能是第一項毫無疑問的功能。大體來說，社會指標能藉著認定社會問題，引發深入的探討，也能有助於長期之制度創新。但由於缺乏明確的理論模型，解釋功能與會計功能目前還只能居於次要的角色。至於評估功能，只有在使用「評估研究」方法時，才能強化這項功能。

四、「客觀社會指標」對「主觀社會指標」

自從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Indicator* 出版之後，社會指標的意義一直未有定論。爲了補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之不足，Campbell 和 Converse 乃建議如果社會指標真是要來記錄和掌握人民的社會生活變遷，那麼人們對這些變遷的感覺如何更應該加以探討。他們主張：

我們極想瞭解人們對這些社會變遷的看法如何，以及這些變遷怎樣形成和決定人類生活之內涵與滿足。總之，就是要找出這些變遷的人文意義（Campbell and Converse, 1976: 6）。

對他們而言，到目前爲止，幾乎全部現有的社會指標都是由某個政府機構提出報告，以描述事件、行爲、個人特徵，都與個人對其生活的認知無關。換言之，社會指標通常是被認爲「人們生存的生活狀況之客觀指標」，雖然人們也承認對生活情況有更主觀之測度。對許多人而言，當教育水準提高時，醫療服務改進時，不夠標準的住宅數量減少時，空氣、水的淨度增加時，就可以合理的推論，生活素質亦會隨之提高（Campbell, 1976: 118）。於是很容易地就得出了下列的公式：生活客觀狀況改善（甚至超過經濟層面），主觀的生活素質就會提高。這聽起來是否很耳

熟？事實上這是過去的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類比的新型態，只不過指涉的層面由社會轉移到了個人而已。但是否就如此簡單？客觀情況與主觀認知是否真的可以相互推論及相互轉換？

Sinclair 於一七九八年在其所著的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中提出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他認為：

我認為這個名辭（統計）是對一個國家狀況的探究，其目的就是在確定人民所享快樂的多少（Quoted in Campbell, 1976; 117）。

把快樂的多少當成一個社會指標，在美國向來是被折換為貨幣計算。但是快樂不只是單純的物質數據便能加以測度或推論的。除非我們相信生活素質的高低全靠生活的客觀環境的多寡或良窳，否則我們便必須探討當事者的主觀感受。Mibrath 甚至認為，「素質」必然是主觀的，而推論「素質感」之存在，最正確的做法就是問他們的那種主觀感受。

此外，幾項研究都顯示在個人生活的福祉感與客觀情況之間，未必存有「形似性」（isomorphism）的假設。事實上，生活的客觀測度與主觀測度之間，相關性很低，甚至有時是負相關。

現有的全國調查顯示：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二年間，也就是當大多數的經濟與社會（客觀）情況都在進步時，在美國人當中，自認為「非常快樂」的人的比例却穩定的下降；而在最富裕者中，下降的最為明顯（Campbell, Converse and Rogers, 1976: 26-27）。正如上述調查的作者們所指出的，這其中的問題可能是，用快樂指標來測度主觀生活素質水平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人民的生活素質真的在下降，還是只表示人們對快樂定義有了改變。如果它確實反映了主觀生活素質的某種變化，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一改變？它是否也可能反映出一些經濟，甚或社會指標過去所忽視客觀生活狀況在退步？果如其然，那又是那些層面？

另一項有關生活素質的比較研究是使用客觀指標（可以量化者）來測度五十州的生活素質，例如經濟、社會環境、和政治的變項，這一研究也顯示了有趣的發現

(Liu, 1973: 1975)。以上述客觀指標測量，過去南方邦聯的十一州中，九個是在最低的一級，而其他兩個（Florida 與 Texas）也距此級不遠，但令人驚訝的是，當那些南方各州的居民被問到去評估自己的生活素質時，却比起其他「應有」較高生活素質地區的人民，要來得更積極、更有正面的評價。

以上兩項研究的性質上都是相當「集合性」的，還無法直接指涉個人的客觀情況與主觀認知間的關係。Campbell、Converse 與 Rodgers 進一步直接去探討這種「主客觀」之間的存疑關係。他們發展出「一般感情」的指數，和衡量對十五類生活範疇個別滿意的指數（包括婚姻、家庭生活、健康、教育、工作、休閒、住宅、城市、鄰居、國家、財務狀況、組織參與、友誼與宗教）。並希望能求證出這些主觀評價的高低是否能由個人客觀條件的特質（例如，年齡、種族、家庭所得、職業、教育、宗教、性別、都市性；和生活方式）來預測，結果顯示十個客觀變項對上述任何一個主觀生活素質測度的變異性，最多只能解釋 17%（Campbell, 1976: 121）。

顯然，只是客觀指標，尚不足以推論當人們經歷一種外在物質情況時，必然同時也經歷那種「素質」的變化。但究竟如何才能解釋所有這些不一致性的爭議呢？關鍵可能是在於客觀情況改善時（所得或住宅可能改善），人民却愈來愈不滿意。一種說法是，人們對生活的期望可能要比生活素質的實際改善增加的更快。另一種說法則是，它也可能受到外在資訊來源的影響，而改變了原來期望的水平，如親戚、鄰居、或友人，這就是 Hirschman 所謂的「隧道效果」（tunnel effect）（Hirschman, 1973: 545）。

運用客觀指標推論生活素質的主觀認知的另一個困難是，多數已知的集合性客觀指標並不包含那些對生活素質最重要事物的測度，像家庭中的愛，對美景的欣賞、裝潢住屋時的認同與滿足感等等（Milbrath, 1980: 35）。

解決這個看來矛盾的關係的公平辦法是，採取「主觀與客觀因素交互影響」的觀點，來瞭解生活素質。對生活經驗的種種主觀測度，該可以用來補助對生活狀況

客觀測度的不足。這樣子，可以強化社會指標在測度社會變遷的敏感度，以及發掘社會中潛在問題的辯識能力。Andrew 與 Phillips (1970: 211-233) 在秘魯利馬的實地研究，就曾做過這種嘗試。該研究目的有二：(1) 描述該地區及居民，(2) 找出該區居民認為自己與社區最需要的事項。研究中同時運用了客觀指標(為第一項目標)與主觀指標(為第二項目標)。研究最重要的結果是：終於得到了該地區及居民的真實狀況。因為實況與「貧窮文化」理論家所想像的：地區凋蔽、居民缺乏動機，不事生產的景觀大相逕庭。環境是不甚清潔(客觀的)，但是居民正在努力設法改善。只要有了職業和收入，他們大多會投入改善住屋。在遷到城市的移民家庭當中，戶長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能就業，並希望有更多的工作。他們也很關心子女的教育問題。這項運用主、客觀指標的研究所具有的政策涵義是：能夠「啟發」決策者對其政策所及的地區及人民有更深刻而且真實的認識。

另一項大膽的嘗試是 Lester Milbrath (1980:39) 提出的有政策相關性的生活素質的國際比較，企圖將對生活主觀認知的測度配合各國生活客觀情況的測度。

五、社會理論與社會指標

強調新資料的改變，可能會造成一個印象，以為社會指標的本質只是大量社會統計數字的產物而已。而且，許多單獨的社會指標往往會製造比它所能回答更多的問題。許多批評者認為經濟指標之所以成功(不是指它們實際上對複雜的社會現實有多少解釋力)，就是因為這類指標都是同一經濟模型中的相關組成因素，而模型中指標值的變動，大多就能告訴我們一些有關整個經濟體系運作的情形。他們認為：若沒有社會體系的理論模型來確定體系中各指標的關係，則此指標將不足以用來解釋原因、計劃政策與評估。簡言之，缺乏一個能充分說明指標間相互關係的社會理論，將是目前社會指標運動中最嚴重的缺陷。為解決此一問題，已有人開始建構能夠詮釋社會統計與指標的社會模型。其中尤以 Land (1971) 與 Wilcox & Brook (1971) 最為先鋒。他們預期由社會模型所擇訂的社會指標，將足以區分出「政

策效果」和其他非政策性的社會過程影響（如移民、都市化、工業化等）。因而便可強化社會指標的解釋與評估功能。

如果能這麼做，將來的社會指標報告就能縮小為幾個少數但却有效的重要序列（例如社會會計型態）而不需要屢屢以一大堆的數字表列出現。這種結果必然會使得創新功能得以大幅前進。

為執行此一方法，必須有「因果模型」的方法，譬如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Land & Spilerman, 1975）；另有數項嘗試，各獲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如 Stone, 1975; Anderson, 1973）。

史坦福研究所（SRI）根據HEW的*Toward a Social Report*中的社會指標，模擬出了一個社會模型。此模型附有可能的達成度、次類、及指標。該所的模式基本上是一個啟發性模型，其中目標、指標、及達成度互有關聯。整個模型是由兩大部分構成。一部分與「社會」有關，另一部份則與「個人的社會生活」有關。整個序列的測度，是由最普遍的到逐漸特定化的指標、以至實際數字都彼此相關。每一測度層次內，均明確訂有目標及各種目標達成度（最高、標準、最低）。雖照這個模型不太可能實際運用（因大部分必須的資料均從缺）；但我們從中仍能自行得出一些描述性社會報告，甚至預測性社會會計的必要條件（McVeigh, 1972:42）。

數學社會學家Kenneth Land也提出了一套頗大膽的模型。那是一套社會人口會計系統，其中以人口數代替美元（或相等於美元）做為計算的基本單位。從而，人們從事某事的比例（如結婚、離婚）以及他們移出、移入各種社會地位的速率，就可決定不同社會部門（教育、健康、家庭等）的運作過程。舉例來說，根據Land的模型，理論上可以從失業率以及擴軍率等社會經濟與政治條件的變化去預測高中生的畢業率（MOSAIC, 1975: 8; Land, 1971; Land and Felson, 1976）。顯然其間包含著因果的關係。

然而，依社會指標發展的現況指出，上述的這些嘗試都只是特例而非通則。Wolfgang Zapf在回顧十個現有的社會指標系統之後，結論是說目前還看不出有某個

理論模型的可能。他說：

相反的，嘗試由相關的社會理論當中，根據邏輯導出一套參考架構的並不多，而成功與否更還未定。這些社會指標系統幾乎都不是從一般理論中產生的，固然它們是受到一些現存理論的啟發…。也就是說，由先驗可知，我們不必期望任何社會指標系統會有完整的內容或周延的理論；可能把它當做為解決與社會政策相關各層面中的問題，諸如選擇、連接、加權、運作化等等的一套有系統的方法還比較可行些（Zapf, 1975: 490）。

Zapf 並不非常重視周延的理論模型，他所致力建構的是一套上述的模型，只企圖去模擬與社會政策相關的特定一些範疇而已。

社會學家一直在尋找一套（或多套）解釋社會現象的社會學理論範型，因此在社會模型中建立社會指標系統已經是也必仍是社會指標運動之標的。但很可能，即使為社會指標的編製找到了某個社會模型，它也沒辦法永久可以做為有效的架構。社會學的理论範型一直在改變，對社會結構與過程的詮釋也必然會改變。假如某些社會指標真能反映（至少自稱反映了）社會的某種趨勢，它們必然是經過指標選取者和作者的認知後才決定的，而這些人大多是社會學家。社會學家創造社會理論，社會理論又從而影響了指標的選取，組織，與詮釋。不只是社會學理論，一個國家當中主要的意識型態也都會對該國可能的社會模型有更直接的影響。這些又都不是那些擁護社會指標的學者們能夠有辦法掌握的。

六、結論—兼評台灣的「社會福利指標」

討論過相當多社會指標文獻後，不禁會想這對台灣目前發展社會指標有沒有什麼關聯與幫助。台灣在一九七五年始由經建會開始編纂年度性的社會福利指標，這是社會指標一項令人高興的發展。

雖然本文並不企圖對該份報告做廣泛評估，但既然任何檢討都必產生一些「應用」的考慮，下面是將觀察所得做一些初步的報告：

1. 該報告雖名為社會福利指標，但卻沒有為「社會福利」下定義，以做為整理與解釋統計資料的依據。據該報告彙集的資料顯示（計分八個福利項目：所得分配、經濟穩定、長壽、公共衛生、教育與文化、居住環境、就業，以及人口），「福利」的含義確實是極為有限，偏重於經濟和物質的客觀面。主觀和心理層面的福利則被徹底忽視。然而反觀日本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uncil）（1973），Drewnovski（1971, 1972），Allardt（1973）及Zapf（1975）等所做的研究却早已顯示，「福利」的概念絕不止於經濟而已。

2. 各項資料均是取材於相關的政府機構，由他們出版的統計組合而成，本身極可能有政策的「投入」偏差。社會指標應是對政府投入資源之後的「產出」更重視才對。此外，這些資料都是非常的具有集合性質，沒有辦法把它們分離到一些有用及相關的社會單位。

3. 報告中缺乏評論與解釋。照本文上述的回顧，社會指標應該可以發揮其社會教育的功能。如果全然不加解釋的話，關心的個人或團體就只能各自的去臆測到底發生了些什麼變遷（至少在福利的範圍內），以及這些變遷又是如何在台灣社會中發生的。毫無方向的猜測總不如先有一些討論的共同基礎要來得有意義。

4. 報告沒有「對立指標」。資料既然全來自政府，便有可能成為「袒護指標」（Biderman, 1966: 78-79; Henriot, 1972），為既存政策說辭。由所提供的資料看來，人們不禁要懷疑出版社會福利指標背後的政治動機究竟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Johnston 對 *Social Indicators, 1976* 的批評，他建議應加入對立指標，不失為一合理的作法。如此將會對社會變遷、人民福利的解釋，有較客觀的分析，以避免將官方看法視為必然，同時也可發掘出應改進的部份。我們建議在將來編列社會指標時，應邀請較多非官員的專家及社會學家參與工作。

台灣在世界性的社會指標運動中起步較晚，能有社會福利指標的出版實在令人欣慰。雖然台灣嘗試發展社會指標和美國一樣距成功的地步還很遙遠，但畢竟有了一個好的開始。我們相信，善意的批評能加速進步。每一個負擔中華民國社會福

利指標的編製和出版的納稅人和公民，都有權要求未來的指標報告要更好。筆者自不例外。

參考書目

Allardt, Erik

1973 "A Welfare Model for Selecting Indicator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Sciences*, 4: 63-74.

1973 "Individual Needs, Social Structures and Indicator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Eisenstadt and Rokkan (eds), *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 Vol. 1 (Beverly Hills: Sage).

Anderson, James

1973 "Causal Models and Social Indicator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ystems Mode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June): 285-301.

Andrews, Frank and George Philips

1970 "The Squatters of Lima: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Want",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Jan.) 211-223.

Andrews, Frank

1973 "Social Indicator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Oct.): 3-12.

Bauer, R. A.

1966 *Social Indicato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ell, Daniel

1969 "The Idea of a Social Report", *The Public Interest*, Vol. 15 (Spring): 72-84.

Biderman, Albert

1966 "Social Indicators and Goals" in Bauer, (ed) *Social Indicators*, 68-153.

Brand, J.

1975 "The Politics of Social Indicator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6:1, 78-90.

Campbell, Angus

1976 "Subjective Measures of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 2: 117-124.

Campbell, Angus and Philip Converse (eds).

1972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Campbell, Angus, Philip Converse, and Willard Rodgers

1976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Cancian, F

1964 "Functional Analysis of Change", in Etzioni (ed), *Social Change*, 112-125.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dord: Stanford U. P.).

- 1964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Conflict" in Etzioni (ed), *Social Change*, (NY: Basic Books), 98-111.
- De Neufville, J. I.
1975 *Social Indicators and Public Policy: Interactive Processes of Design and Application* (NY: Elsevier).
- Drewnowski, Jan
1971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Information", *The Annals* (Jan.), 82-91.
1972 "Social Indicators and Welfare Measurement: Remarks on Methodology" in Baster, N (ed), *Measuring Development* (London): 77-90.
- Duncan, O. D.
1969 *Toward Social Reporting: Next Step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4 "Social Indicators, 1973: Reports on a Conference", in Van Dusen (ed), *Social Indicators*, 1973.
- Economic Council of Japan
1973 *Measuring Net National Welfare of Japan*, (Tokyo: ERI).
- Economic Planning Council, ROC.
1975-8 *Social Welfare Indicators ROC*. (Taipei).
- Gerson, Elihu
1976 "On Quality of Life"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1 (Oct.) 793-806.
- Gross, Bestram
1966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London: Tavistock Pub.).
1967 "The Coming General Systems Models of Social Systems", *Human Relations*, 20 (Nov.) 357-374.
- Henriot, Peter
1972 *Political Aspects of Social Indicator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irschman, Albert
1973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Feb.): 544-566.
- Horn, R. V.
1975 "Social Indicators for Development Planning",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June).
- Johnston, Denis
1978 "Postlud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e Annals* (Jan): 286-294.
- Land, Kenneth
1971 "On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Indicator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6 (Nov.): 322-5.
- Land, Kenneth
1975 "Theories, Models,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XXVII, 1: 7-37.
- Land, Kenneth & Seymour Spilerman (eds)
1975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and, Kenneth and Marcus Felson
1976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Building Dynamic Macro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Including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Crime Rates & Police Expenditures", *AJS*, 82: 565-604.
- Liu, B. C.
1970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U.S.*, (Kansas City: Midwest Research Institute).
1970 "Quality of Life: Concepts, Measure and Res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Jan.): 1-10.
- Liu, B. C.
1976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NY: Praeger).
- Lockwood, David
1956 "Some Remarks on The Social System", *British J. of Sociology*, Vol. 7 (June), 134-46.
- McVeigh, Thomas
1972 *Social Indicators*, Council of Planning Librarians Exchange Bibliography # 215. (Monticells, Ill.).
- Milbrath, Lester
1977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Environmental Studies Center*, Paper No. 3. SUNY Buffalo.
1979 "Policy Relevant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The Annals*, (July), 32-45.
- MOSAIC
1975 "Quantifying the Unquantifiable", Sept./Oct.
- Park, Robert and David Seidman
1978 "Social Indicators and Social Reporting", in *The Annals* (Jan. 1978): 1-22.
- Parsons, Talcott
1964 "A Functional Theory & Social Change", in Etzioni (ed) *Social Change*, 83-97.
-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1966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hington, DC: USGPO).
-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1933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S.* (New York: McGraw-Hill).
- Ramsay, Natalie R.
1974 "Social Indicators in the U. S. and Europe: Comments on Five Country Reports" in Van Dusen (ed), *Social Indicators 1973: A Review Symposium*.
- Sheldon, Eleanor B. and Wilbert Moore (eds)
1969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heldon, Eleanor B. and Howard Freeman
1970 "Notes on Social Indicators: Promises and Potentials", *Policy Sciences*, Vol. 1 (April): 97-111.
- Standord Research Institute

- 1969 *Toward Master Social Indicators* (Menlo Park, Calif: SRI).
- Stone, Richard
1975 "Transition and Admission Models in Social Indicator Analysis" in Land and Spilerman (eds),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253-300.
-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7 *Social Indicators*, 1976, (Washington, D. C).
- U. S. Department of HEW
1969 *Toward a Soci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USGPO).
- U. 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1974 *Social Indicators*, 1973, (Washington, D. C.: USGPO).
- Van Dusen, Roxann (ed).
1974 *Social Indicators, 1977: A Review Symposium*, (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 Wilcox, Leslie & Ralph Brooks, et al.
1972 *Social Indicators and Societal Monitor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Zapf, Wolfgang
1975 "Systems of Social Indicators: Current Approaches and Problem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7:3, 479-498.

張曉春評述

今天，我所要討論的是蕭新煌博士的文章。這篇文章可說是西方社會學研究的回顧，它所搜集的資料非常豐富。現在這裡，將我看過此篇文章的心得與感想，提出來與大家互相研究、切磋。

(1)蕭先生在文章中，把社會指標運動的起源、發展等詳細地介紹，恰好可和賴先生、李先生的討論相應和。但是，社會指標運動發展的背景，蕭先生根據一些社會學家的看法，認為是由於社會過度重視經濟，掩蓋了某些社會問題，因此社會學者才提出社會指標運動。依我看來，可能是社會學家要逃避社會改革、改善，所提出的方法。

(2)蕭先生提到，在社會指標的搜集、製作中，國家政府所擔任的角色。其中特別提到它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換句話說，發展中國家要使經濟和社會像一隻鳥的雙翼，能順利地起飛，社會指標的搜集、製作是非常重要的。

(3)若干社會學者認為社會指標有主觀和客觀性，也有的認為二者可放在一起來處理。蕭先生亦舉了快樂、不快樂的指標為例子，來強調社會指標的主、客觀性。我個人則認為快樂、不快樂是主觀，亦是客觀。其主、客觀性，和社會經濟、個人生活品質的提高等反應，是表裡、表外的問題，絕不能分裂。

(4)社會指標依我看，只有一種功能即測量社會現象和其發展。這功能當然可引發另些的功能。所以，社會指標可以當成是社會發展的一個模型。社會指標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發展等的某些項目，因此需要與實際的統計資料相連，才能表示社會現象。故社會指標的「指標」，可當動詞，亦可當名詞。當動詞則指和社會現象結合起來，當名詞則指項目。由於社會指標有它的應用性、發展、變遷，可用來擬定政策、促進社會發展，因此它不僅具有學術性的意義，也具有實用性的價值。

(5)蕭先生有意提出此論文，引起學者及有關單位對社會指標的重視，這用心實良苦，我們也希

望它能發揮效果，有助於社會政策的擬定。目前，社會指標在臺灣省應用的情形，蕭先生提出經建會出版社會福利指標為例，他一方面稱讚這很不容易，一方面又提出四點意見。誠如陳小虹女士所述及的社會指標常被拿來作為政策上辯解的工具，因此，這本冊子可能是為某些政策做辯解的工具。如果如此，其參考價值則小。還有陸教授所列的社會福利指標七大類，我認為有一些是社會權利，而不是福利。例如：失業、空氣污染是生存權利的維護。目前許多人對權利、福利的概念混淆不清，維持合理、適當的生存空間，是我們生存的權利，而不是福利。我個人認為臺灣省的某些社會福利指標，常被用來做為政治成就的工具，如果能避免如此而把社會指標拿來做為改善政治的工具，定有很大的助益。

都市計劃的設計是鄉村發展之道

江 玉 龍 周 碧 娥

問題緣起

現代化雖然因著一地人口特性、生態環境、經濟結構、組織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已使得發展中國家在整個社會的結構上和文化系統上都產生了巨大的變遷。這變遷雖帶來了好的影響，但諸如經濟的、人口的、生態的和社會的不良後果逐漸的擴大其嚴重性，迫切的要求解決。就都市部門而言，有擁擠不堪、貧窮落後與不安等問題；就鄉村部門而言，人口的外移和經濟的委縮尤引人為憂。簡言之，快速的現代化導致了一個事實：過度膨脹的都市部門和一個逐漸衰退、沒落的鄉村社會。

事實上，無論在已開發或低度發展地區，現代化的結果必定引致部門間不平衡的發展。這不平衡的過程就是所謂的發展（Development）（而都市化僅是比現象的一個縮影。）（Horowitz, 1972）。有些社會學家也將結構之間的緊張與調適的辯證過程視為發展的本質（Darehdorf, 1959; Havens, 1971）也有人認為

工業與農業之間不均衡的發展將導致不良的後果，因此社會欲尋求更進一步的發展，不均衡雖是常態，但却是絆腳石。特別是鄉村青年的外移都市，農業生產力的低落，促使鄉村一步步的走向蕭條與沒落。如何有計劃的調適城鄉之間的發展步驟將是解決之道。

晚近，中外學者也興趣於另一個問題（Tsai, 1979; Thelin, 1976; Fuguitt, 1971）：如何透過政策抑止大都市、大城市的再度擴張，轉移到比如新市鎮的開發或已有小型都市中心的建設上。就如Fuguitt所說：『目前在此領域，大半的注意力是放在如何以政策為手段來調和人口分配的不均現象，促進新中心都市的產生（Bosts, 1968; Lausen, 1969; Darwent, 1969; Fox, 1970; Havens, 1970）。支持此種說法的假設：人口遷移與經濟機會是相關聯的。因此，維持一合理的人口量，在共生原理的運作中，一地能夠自給自足的發展經濟與工業。聯帶著鄰近地區的人口也將能因此而維持穩定（1971: 450）。』

以經濟因素來解釋人口分配問題，在鄉村或衰退地區也許可行，但並非是充分的理由。特別是以下將討論到的，在方法的運用上與問題的涵蓋面上都有很大的缺陷。發展，不單祇是人口、經濟幾個因素能解說得週全，因此政策只專注於鄉村社區的某單一面度也是不足的（Nolan and Hafferman, 1974）。資料顯示以經濟觀點強調鄉村工業化的策略，實施結果效應並不單純（Rogers, et, al, 1978）。工業化有正負兩面的效果。晚近的研究顯示回返鄉村的遷移者生活品質的要求比經濟因素來得重要（Plock, 1978）。年輕，教育程度高的都市專業人員移往鄉間即著眼於鄉村優雅清靜的生活方式。

此篇論文即以現行政策的不足為參考再加上綜合晚近研究上的新發現，擬出鄉村發展的另一出路：都市計劃的設計來規劃鄉村建設，促使全面改善鄉村社會，使得鄉村社區的建設在結構上具有都市的建設特質，公共設施普遍的在鄉村設立。但要注意的這是不同於一般的都市計劃。它祇採其都市計劃原則、構想，以及公共設施安置在鄉村社區上。這構想尚未成熟，還望較多的研究以便有助於尋求未來包羅

萬千、複雜而廣泛的鄉村建設的新途徑之發現。

本文重點在以發展理論（Development Theory），考察這構想的效應。基於此，整體社會的發展以及個別部門的發展都必須共同考慮。同時社會與個人兩層面的效應下兼論之。在尚未進入主題之前，先來澄清何謂都市化及其概念。

一、都市化

都市化在工業先進國家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都市計劃設計的構想即由此一事實而引發。都市化與社會發展的緊密關聯，可由社會層面與個人層面來加以考察。就社會面來說，歷史的、社會的發展其發源地通常是在都市。其因不外人口集中，職業分工、分化，都市結構越趨複雜，功能越專化。屬於地緣性的團體消失，人情交往趨於淡泊。如此的交互影響，在都市之中產成了新的社會關係、規範價值、行為模式。至今，一地都市程度的高低且常被引用判別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都市的改變經由擴散的方式，鄉村亦蒙其影響。都市、鄉村的差別不但表現在人口、生態、經濟和社會的結構面上，並且價值、規範、信仰等文化系統上的殊異性日見其大。就個人層次而言，居住在都市或鄉村且代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而就外表儀態上而論亦有極大的差別。

這高低的現象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因著人口不斷的集中、結構的越趨專化、分化，在在要求更多的投資。因此待遇高的、地位高的職位的出現；良好的教育與完善的設備；更多社會及文化上的建設匯成了都市的組織與制度，提供了居民更多參與決策的機會和高度的生活享受。鄉村與都市的差距於焉而拉大。

總之，都市化是包括人口的、生態的、經濟的、社會結構上的複雜過程。其正面的作用在於提昇社會的發展速度。尤其我們比較了尚未出現都市化現象的地區後，對都市化的作用將更能體會到。都市計劃設計的構想即基於此項認識而來。其目的即在以此設計作為刺激鄉村社區的社會經濟地位、改進不利的發展因素、緩和都市與鄉村不平衡的發展為宗旨。此構想的緣起就解說到此為止。以下我們再討論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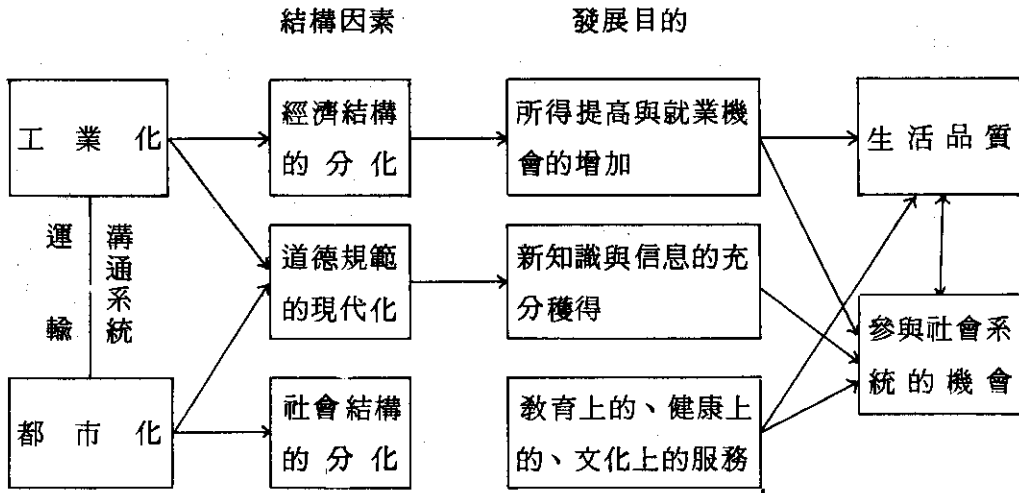
何適切的運用都市化的原則與設計，以便有助於鄉村社會的發展。由於我們是以整個社會為討論架構，是以對發展這個概念作進一步的說明是必要的。

二、發展的意義

發展，不但被廣泛的使用著，而且字意也越來越模糊不清（ Blumer, 1966; Stavley, 1967; Baranson, 1967 ）。特別是發展已成為世界性的需要。混淆不清也許就是廣泛使用的結果。在此我們不準備對發展做深入的探討，僅想大要的提出與我們主題有關的部分加以討論。現代的社會人們已逐漸傾向於運用手段干預結構的變遷共同追求全社會的福祉。動態的社會於焉出現。是以發展就含有著不斷改變，尋求提昇的意味了。不斷的改變與提昇需要講求干預的手段與目的。也就是一方面，透過社會經濟和道德規約的轉變以尋求全社會集體性目標的達成。另一方面借著結構性的轉變，提昇人們生活的福祉。前者是手段的考慮而後者是目的的講求。如此不斷的干預與提昇的過程就是發展。

成長就是發展（ Eberts and young, 1971 ）〔註一〕。發展就是改善物質生活的品質（ ODC, 1977 ），滿足人類基本的生活需求。諸如營養衛生的講求、居住環境的提供、教育水準的提高、經濟機會的平等、交通與溝通系統的改善等等。從另一方面說成長就是一地區創造能力的高度發揮。發展通常是以人口為指標。但就個人層次而言，生存機會與參與公眾事務的機會也是主要的參考面項。比如壽命的延長、保障個人的社會經濟性制度的建立、知識的交流與信息的擁有等等。而就結構面而言，發展的旨趣則是工業化、都市化、結構制度的分化與整合、現代化。而工業化和都市化其實代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以及價值規範邁向現代化的兩個主要推動力。其間主宰的關鍵就是表現在生產方式的效率化上。就社會面而言，工業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有二個結果：高度的生產效率與經濟結構的分化。就發展的目標而言，這兩結果就是所得的提高與經濟機會的增加。若就都市化而言，人口的集中帶來複雜的分工和制度（或結構）的專化。其目的無非在於滿足都市現實環境的要求

，而其結果則是社會的分化。另外工業化與都市化也帶來價值規範的現代化。也就是更具彈性與寬容度的統治系統；更具專業化特性的決策過程；更富於求新求變的價值觀念。這些新價值觀使得個體能適應新時代的潮流，強化新制度的適應能力。而都市化又與工業化、運輸溝通網絡三者互為因果。這種複雜的過程與關聯可以下圖表示之：



圖一 發展關聯概圖

此圖僅能表達其複雜關係於萬一。詳細說明也非本文的目的。但見微知著，都市化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以下我們試將視野縮到鄉村來談什麼叫做鄉村發展。

三、都市化與鄉村發展的關聯

求鄉村發展，其目的也是著眼於社區公眾意願與居民生活需求的滿足。因此同於整個社會的發展，鄉村發展也有兩個目的：經濟、社會、規範等結構上的轉化與社區居民生活福祉的追求。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其意義也同於社會發展目的與手段上的考慮。但意義雖同，考慮的變項却不一樣。鄉村社區是大社會中的次級系統，次級系統應有其獨特性。也就是探究鄉村發展，巨視與微視（macro, micro）

兩方面都要兼顧（Hobbs, 1980）。一方面發展鄉村社區不失其自主性而又能整合於都市系統，成就全社會的發展目的。如此才能相得益彰，不致顧此失彼。但城鄉間日益增強的相互依賴性問題以及如何維持城鄉間穩定而協和的成長關係，也是引人深思的重要課題。是以鄉村發展的意義就是將所得低的、教育缺乏者、公衆福利短少者、文化設施不足的鄉村人民，藉著種種的干預措施，溶入大社會的發展洪流中共享發展的甘苦。

鄉村社會的發展同樣需要結構上的轉化。同樣需要依賴工業化、都市化、運輸與溝通系統的共同促成。由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知都市化的重要性。但都市化亦給鄉村社區帶來了很大的衝擊。就如 Cohn, (1958) 和 Anderson (1962) 所指出的都市化不僅意謂著人口的集中而已，是新價值觀、生活型態、結構制度推廣到鄉村地區的發源地。因此鄉村的都市化，其意義也有助於社會的現代化。況且鄉村地區目前已有了某些利於推展都市化的條件，比如農業機械化、運輸和溝通系統的改進等等（Poplin, 1972: 216）。這些工作可說是工業化的先驅工作，而工業化與都市化本是相關聯的。是以祇要稍加計劃性的督促，鄉村都市化並非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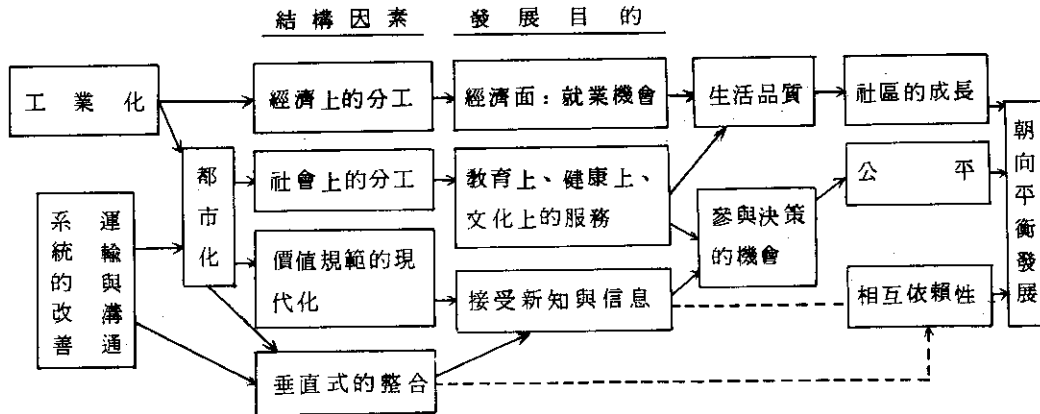
晚近都市化的結果已提供鄉村整合於大系統——社會的可能性（Warren, 1971）。但此種垂直式的整合說明了獨立而自給自足的鄉村制度已不復能存在。Friedman (1963) 認為這可提供個體參與村外活動與接受新知、新觀念的機會。但是 Warren (1956) 認是利是弊還在未定之天。鄉村將失却其自主性而受外界的控制將是可確信的。無論如何，居間作用著唯賴於運輸與溝通系統的功勞。

四、鄉村都市化的可行性探討

結構上的轉化與發展的目的也是鄉村發展必要考慮的二個問題。以下將以圖來表示其間的關係並點出都市化的重要意義。

在圖二中都市化扮演的是結構轉化的催生者。因此，都市化可說是鄉村發展的目的與手段。至於經濟上及社會上的分工則較屬於都市化的手段問題。規範的現代

化以及整合上的要求則是其目的上的考慮。在此我們瞭解了都市化與鄉村發展的關聯性以及求發展當中目的與手段的區分後，我們再來看看都市計劃的設計對鄉村有何效應。



圖二 鄉村發展的分析架構

此構想是融合了社會學上的都市化概念以及都市計劃原理而成的。主要目的是基於鄉村社區的需要，構想一套嚴密的設計。諸如工業區的設立、運輸系統的規劃、健康、教育和文化上各種設施的興建等等。其效用比如工業區設立，將促進經濟結構的分化，直接的結果就是就業機會的提供，有助於鄉村所得的提高。而教育、文化上的公共設施將大大的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無論在物質面或精神面都有莫大的助益。至於運輸與溝通系統的完成將有助於不同地區的交往，不同觀念的交換等。使鄉村成爲一個動態的社會。

至於維持穩定而和諧的城鄉發展關係，我們並沒做太深入的探討。但分析到此我們似可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也就是假如鄉村的發展永遠處於都市之後，任何干預的手段都不運用，那麼鄉村永遠祇有衰落一途，何談平衡？何有和諧之可能？政策是干預的手段，成敗的關鍵。政策的擬定必要透過鄉村居民的參與，提供他們的意願與需要、困難與問題。如此，政策實行的結果才能符合鄉民的真確需要。都市部門與鄉村部門在競爭上是不平等的，如此的考慮才有可能做到公正與公平。這

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更多的研究與思考將有助於本問題的思考。無論前途是如何的迷濛、未來是否有希望。本論文謹提供管見以就教各方，敬請不吝指正。

註 釋

〔註 一〕社區的成長可能包含人口成長以及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成長。我們完全瞭解人口成長並不一定帶給社區正的效果。但鄉村地區面臨了人口減少的現象，這個概念就非常有意義了。

廖正宏評述

目前社會科學界對工業所造成劇烈的社會變遷，相當重視。不論是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都曾經歷過或正面臨著，快速變遷所帶來深淺程度不同的社會問題。所以，也設法努力降低或預防這些問題所形成的不良後果。江玉龍教授和周碧娥教授的大文，正反映著對這類問題的關心和努力。

這篇報告首先指出，經由計劃的手段來解決都市與鄉村不平衡發展的重要性，其次說明都市化在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接著討論發展的涵意，最後分析都市化與鄉村發展的關係，並提出以有計劃的都市化來促使鄉村發展的構想。文字簡潔扼要，尤其文中所強調以 Planned urbanization 做為 Rural Development 之方法，正是目前國內鄉村發展工作所必須加強的。

因為本文是屬概念上的討論，並非實證研究，因此，在這裡僅就個人讀後的一些意見與問題，就教於江教授、周教授及各位學者、專家。

(1) 鄉村發展具有地方性，必須以當地的需要為擬訂計劃的依據。由於各地方基礎不同，發展速度互異，有些鄉村在發展初期較重視農業發展，有些地方可能較重視工業發展，有些地方在發展的後期較強調社會發展，因此，發展的順序和內容，應依照各地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輕重緩急之分。urbanization 是否較適合發展末期，較不適合發展初期呢？

(2) 文中曾提到，有不少年輕人，高教育程度之專業人員為了享受鄉村生活的情趣，搬到鄉下住。我想這種 reversal migration 的現象，在台灣並不普遍，即使有，原因也一定不一樣。文中最好能補充說明台灣的情形，不然容易引起誤會。

(3) 文中又提到，都市化是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中介變項，但是，就鄉村發展而言，是否一定要「都市化」才會有更好的發展？

(4) 文中又提到，改變鄉村社區的各種社會、經濟、文化結構是達成各種鄉村發展的必須條件，但是這些改變並不一定都要由都市化來促成，也許別的方法如教育的手段、政府的政策等說不定會更有效。假如真是如此，那麼 Planned urbanization 之 approach 是否應做某種程度的修正？

綜合評述

葉啓政：

首先，我要感謝大會，承蒙厚愛，賜給我這麼一個機會，擔當今天上午四篇論文的總評述。我是在1970年代中，在美國拿到學位的，基本上可以說是1970年代美國式社會學傳統下培養出來的，按理對「社會指標」此一時髦的東西應當略知一二，但很遺憾的，我却是一無所知，充其量只具一般常識性的瞭解。以如此淺薄來擔任評論這四篇下過功夫的論文的工作，頗感不勝負荷，而且也相當惶恐。

不論古今中外，人類總共享些共同的理想與期望。正如賴澤涵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所提到的，中國的古今思想家都有共同的政治理想——追求均與富，和大同的理想。事實上，這些理想也是西方思想家們所共同嚮往的。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在西方，自從文藝復興以來，他們的理想中，有了一些中國傳統理想中所無的成份了。民主、自由及對個人尊嚴的肯定乃其中三個最為明顯的。發展至今，此三者可說代表現代西方人，甚至也是全人類所共同追求的核心理念。

西方人追求此理想的實踐，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到了二十世紀，尤其六十年代以後，他們已開始對他們以往的努力與作為，產生重新評估的要求了。關於這個問題，前面四位學者似乎是忽略了，現個人僅就這個問題提供一點意見。

不僅其理想的內涵為何，毫無疑問的，社會指標乃用來表示理想與現實間之經驗關係的一種人為設計。正如蕭新煌教授在文中所提到，Zapf 認為社會指標有五種功能：即測量、評估、會計、解釋、和創新。這五種功能的存在是毫無可置疑的，也的確在社會中運作，因此，可以說是重要而且也具意義的。但是，除了上述五個功能以外，社會指標又具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問題乃本次研討會，至少是此四篇文章中所遺漏的，而我個人認為是重要的。

反觀一向使用之社會指標所具的性質（尤指顯現的歷史性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是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傳統。第二是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首先，先就方法論的角度來看。

社會指標在社會科學家眼中，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尤其政策決定執行者與大眾媒介），乃具濃厚的涂爾幹（Durkheim）式的「社會事實」性格。這也就是說，人們肯定社會指標乃反映一些

客觀、有代表性、有意義的社會現象。更重要的，這種社會事實的肯定具有涂爾幹所說「社會事實」的特質；即具外在控制與制約的作用。說得明白些，社會科學家建立了社會指標，這些社會指標先在學術界獲得認可，繼而推展到學術界外的日常世界裏，如其經由政權擁有者與大眾媒介的推展，終於在社會裏獲得合法地位，不但成為社會中的事實，而且成為社會期望，政策與行動的目標。因此，社會指標不單純是客觀的事實，更重要的是主觀的理想與行動的指導。

就方法論來看第二特質是，社會指標乃是建立在運作主義的認定上。在經驗科學中，把概念運作成為可理解、甚至測量的形式，原是必要的步驟。社會指標即具這種特性，而且它不是“單一”的運作定義形式，它基本上是“多元多相面”的定義形式，亦即：使用多個具多相面意義的項目來表示一個核心概念。緊接的第三個特性是：社會指標乃實證定義下的研究產品，一向實證主義乃以感官之經驗知覺為認知準度的基礎，也當成研究現象的分析單元，因此，著重所謂的外在客體為研究的依據。這種認知方式，若用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 Don Levin 的一句話來說，很容易走上工具物質主義（instrumental materialism）路子上去。就「社會指標」而言，探討的方向很容易流於測量方法技術上一些枝節問題的爭執，而忽略了指標背後所具更為重要而且根本的意義問題了。

其次，就社會、經濟、及文化背景來看，社會指標會在六〇年代流行，而且以美國為最，個人認為有些可能的因素是值得加以注意的。第一、在 William James 之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傳統下，尤其接受了歐陸之經驗實證方法論的影響後，美國社會科學界相當強調實際問題，以實際運作方式來處理社會現象。第二、它是效率主義的產品。在前面已提過了，社會指標不但是客存的東西，而且也是用來評估現實的工具，因此基本上具有「效率」之功利意義，乃用來評估一個社會朝向某種理想的效果問題。引用韋伯（Max Weber）的話來說，效率主義是建立在實證與客觀主義之方法論上的一種工具性運作型式。又如德國社會思想家 Habermas 所說的，這種效率主義乃二十世紀工具理性表現在學術上的重要公式，它常常使人們忘掉了背後所涵孕的意義，更罔談批判與反省。第三、基於政策之評估與顯現的必要，社會指標之建構無疑的提供政府一些可運作的指標，用來反映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如此可作為未來施政措施的指導原則。關於這一特性，在蕭教授與陸教授的文章中已提到了。第四、社會指標的大幅度運用乃發生在所謂的先進國家，尤以美國為最明顯。其所以能如此，不能不歸於美國有雄厚之經濟財力與充沛之專業人力，可從事廣泛的調查工作，收集大量的資料，以來建構指標。這工作往往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可做到的。

當然，人類對自己應當時時要有反省，對自己的社會要有批判，對政策措施也要有評估，因此建立一些標準，提供一些指標來做為反省、批判、與評估的依據，原是不可厚非的，而且事實上也具有實際的需要，更有認知上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此，我們要問的問題並不在於應不應有社會指標的問題，而是指標應當擺在那兒，如何地建構的問題。今天上午四篇論文對後者這個問題都只稍微點到，並未進一步探究。總而言之，指標建構的問題並非只是測量信、效度等量化技術上的問題，而是深一層的有關指標背後所指的意義究竟為何？

不管是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所建構的，一向美國式的社會指標具相當濃厚的「安於現狀」(status quo) 的性格，也就是說，指標的理念基礎與價值指向均傾向於肯定既有的流行觀念或價值，所以，我個人不贊成蕭教授所說的，社會指標是由反功能論衍生而來的，它本質上還是在功能的脈

絡中滋長的。

個人認為，社會指標的這種「安於現狀」性格乃長期受實證方法論影響的結果。尤其是兩次大戰以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社會發展的實然性內容無形中就成為應然性的方向。因此，在建構社會指標時，不免受到種族中心主義的巢臼，而以它既有的當成是必要、應有的，來做為建構的基礎，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實然現象過度膨脹成為應然的偏差情形。遺憾的是，許多亞非國家在開始謀求推動社會發展時，即不自覺地以歐美資本社會的發展模型為典範，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採亦步亦趨的方式，這種模倣使得歐美工業社會所發展的模式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而產生具普及性格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亞非國家的社會科學家與政府官員也很自然地以歐美（尤其美國）式的社會指標來評估自己的社會。譬如，不少學者常以如「每千個活動人口中的汽車數」、「每千人中的軍人數」、「每千人中擁有電視數量」、「每千人中之電力生產數」等等類似指標來當成生活品質的社會指標。這些指標很明顯地即充滿著美國式的生活色彩與理想模式。

在此，我個人並不反對蕭先生在其文中第 4 頁中所引 Sheldon 與 Moore 提出的五個建構指標標準，也不反對陸先生文中所提到各國建構的基本內容。個人更相信這些指標都可能多少反映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和理想。但是，問題在於如何具體運作，或說明白些，以什麼測量變項來運作；運作時，其基本基設或理念是什麼，這些問題事實上在蕭先生文中提到之 Duncan 已有此意思了（p. 8）。

似乎毫無例外的，社會指標是由一些少數人來建構，最早是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晚近，社會心理學也積極地參予。不管是由什麼學家來建構，社會指標的內容也的確是抽離自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它却往往並不是存在於一般老百姓的日常認知世界中的，或更嚴格地說，學者們所建構的社會指標未必與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實在世界或共同期望充分一致。

在此，我必須聲明，我不是一個天真的普羅主義者，我明白而且也肯定精英份子社會中所可能扮演而且應當扮演的角色，但是，不管如何，社會指標乃來自少數人的詮釋，也只是少數人對於社會現實的有限定型鑄模縮影，總之，根據已有的指標內含來看，它乃反映建構階層的意識形態、認知習慣、期望、與行為規範，蕭先生於其文中第 23 頁已指出這個特徵了。大體而言，這個階層可以說是中產階層。

總結來說，建立在美國式之發展基線的中產階層意理上的指標，似乎內含有下列之假設：(1)資源乃無限，可創造，或至少可取代的，因此常以每千人花費多少能源來做為指標。(2)重效率，這點在上面以提到了，不再重述。(3)重控制，即以一個人所擁有之物品多寡，生存空間大小等具成就意義的概念來當成指標，這顯然與個人主義、現實主義之流行，也與科技發達、物質富裕有關。(4)重慈善，如所謂社會福利指標即一明例，此可說是基督教精神的顯現。

這些基設並不是完全不可同意的，如「慈善」的實踐程度，只是有一可能的現象必須指出來。由於指標的建構不是在真空中產生，而是在特定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下孕育成的。因此，若缺乏批判反省的精神，則指標一旦建構之後，很容易形成「自主化」的情形，變成為一般龐大的力量在社會中猖獗。尤其，社會指標由一個本只具相對參考意義的坐標，經由政治權力體之採納合法化，大眾媒介之大力宣揚，學者們的理論化，很多易變成一個具最終絕對意義的指導原則。一旦情形是如此，它的影響力由學術而至政治，由政治而至生活之全部，同時，它也可能因文化間之優劣勢差，由一個社會擴散至另一個社會，成為世界性的指導原則。事實上，今天大家談「社會指標」時，這種

性格的擴散已是相當明顯了。

這一百多年來，在我國發展過程中，西化之影響相當地深。長期以來，社會已逐漸喪失批判之意願、能力、與機會。三十多年來，雖然在政府領導之下，台灣的經濟起飛，儼然我們已成為開發國家而沾沾自喜。這種經濟掛帥的發展模式是否妥當，實頗值懷疑。因此，在今天推動建構「社會指標」的運動聲中，我們實不願看到更深陷入美國式的陷阱之中，而自以為我們的生活品質已由世界第五十位提升到三十三位而自喜。在對西方發展模式產生亦步亦趨的情形下，我們社會中，小國自卑感的心理叢結相當普遍，信心因此喪失，洋人之指標也就成為我們的指標，對有長久歷史背景的中國人來說，實不應因為一百多年來文化、政治、經濟、與軍事之劣勢而喪失信心。今天，建構社會指標應該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個人以為，對現階段而言，批判重於建構本身。洋人所提供的不是絕對可行可信的，我們應當摒除學術上的盲從，讓我們從今天的社會指標研討會開始做起吧！

自由發言

江玉龍：

謝謝廖正宏教授對本篇文章的評述，他曾提到台灣不應有長期性人口由都市回鄉的現象，對於這一點指正，我們願意接納。

使用都市規劃的原理原則以促進鄉村地區的發展，在台灣由來已久。只是過去缺乏理論的架構罷了。例如因台中港的興建，港口周圍的鄉村地區，政府為謀求發展，將沙鹿、梧棲、龍井、以及清水等四鄉鎮一起規劃為台中港特定區，這就是利用都市規劃的方式來促進鄉村發展的一項實例。過去談到鄉村發展常是以提高農民所得或以鄉村工業化為目的，但是這種以單一面度的方式來促進鄉村發展，效果是有限的，我們可以從很多實證的資料得到驗證。計劃性的都市化以促進鄉村發展，我們在這裡提出了理論架構，我們認為這是以多面度來促進鄉村發展的模式，不僅注意了農民所得的提高，鄉村工業化程度的增加，同時也添增了公共措施的品質與數量。我們認為以計劃性的都市化來促進鄉村發展是我國未來可朝向的一種模式。雖然我們鄉村已有這方面的嘗試，但其真正的功效猶尚待未來更進一步的驗證。

蕭新煌：

剛才張教授對我文章的批評，我差不多都能接受，只有幾點想加以說明：

1.他談到主觀生活素質的評斷，必須建立在客觀的條件上。的確是如此，但是客觀的條件和主觀的評斷是二件事，不能以其中一個推論另一個。就像是我在文章第18頁中提到論點。就以台灣三十年來為例，明明大家的生活水準都提高了，收入也都增加了，却有許多人愈來愈不能滿足。還有劉本傑先生所做的研究顯示，美國南部的各州客觀生活條件皆比北部差，但是人民主觀生活的評斷却比北部滿意。亦有學者曾做過研究，用十個客觀的指標，例如：年齡、性別、種族、收入……等，來測量、推論主觀的滿意程度，結果發現最多只能解釋到17%，剩下的83%根本無法解釋。台灣目前也有一些生活品質方面的研究，却是從客觀條件的量度就來推斷主觀的感覺，可能是很成

問題的推論。

2. 剛才張教授提到我很悲觀。事實上，我是想在悲觀中找出一條生路。開始時若抱著悲觀的態度，也許愈做會發現愈有希望，這樣總是比開始時樂觀，到後來却悲觀的情形好。

3. 剛才張教授問我，社會福利指標已經訂立了三年，政府到底採用了那些指標來擬定政策？我不知道。這也許可請教在座的陸教授或孫教授。

4. 其次，李錫鏡教授提到：社會學家要求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我想不是所有的社會學家都如此要求，應該說是社會主義者才對。社會學以前曾在歐洲、在中國大陸就被這樣誤解過，我們希望不要再被誤會。

5. 葉教授不同意我所說的「社會指標的形成是反功能理論的」。也許我說的太強了，應該說它是在功能學派的力量下找出一條路比較重視歷史的因素。它本身並不是「反功能學派」。

6. 社會指標有政治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功能。因為社會指標一提出來，政府和民衆就可以公開來辯論，然後決定那個指標是好，那個指標是壞。這樣可以一方面提高大家的政治意識，一方面提高大家社會批判的能力，我對今後國內社會指標報告的編製及出版，所抱的期望也是如此。

楊孝濬：

我想提出和強調的問題是：社會指標發展的意義何在？發展後的意義由誰來享受？我想應該是人民，所以社會指標發展的目標中應放入人民的意願。若太強調由政府運用，則會有所偏失，若太強調數字，則可能忽視了人民的意願。因此，我有幾點建議：(1) 社會指標發展上，應加入文化、社區、人民的主觀感覺為設計的方向。(2) 基礎性研究工作的建立，應加速進行之，不能坐等學術水準趕上歐美才來從事，應先從提高研究人口的量著手。(3) 中國文化的特質，對於人的理想已談得太多了，現在應付諸行動。

陳昭郎：

最近，我和台大農推系的一些同仁，剛完成了行政院研考會所邀請從事的“生活素質指標制度的研究”，現正印刷中，原想帶幾份來供各位參考，却趕不及。因此，想提出幾點實際研究後的困難，就教於各位：

1. 指標項目太多會太複雜，太簡單則缺乏實用性，這中間的取捨，究竟應該如何決定是很困難的。

2. 指標的解釋，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則有很大的差別，其正、負質的決定很困難，應加強討論。

3. 指標會隨著地區範圍、社會狀況而不同，例如：公園綠地多寡的指標，在鄉村、都市則有不同的意義。

4. 指標的權數很難確定。

5. 指標制度的建立，常受到重要資料的來源、制定的過程影響。

6. 其次，剛許多學者提出的問題“指標做出來，有沒有用？”，本研究的發現是，小部分的確有用，大部份則無。因為指標的解釋不明確，常令人不知如何使用。

孫震：

我認為社會指標是採用一些客觀的事實，加以有系統的組織，來衡量社會發展的程度。但是，若欲拿此來衡量主觀的感覺是很難的。如果我們能拿客觀的標準或事實來衡量主觀的滿足的話，那就是說有錢的人一定比沒有錢的人快樂，學問大的一定比學問小的快樂，事實上大家都知道不是如此。所以我很同意楊教授剛才所說的：若想以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主觀的滿足和快樂，不管資料搜集得如何完備，組織如何有系統，均無法達成。講到這裡，我會覺得人生有時是非常地無奈，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豐富與自由，但這二個概念有時是很難劃分的。因為越豐富越會有較多的自由。但是人生充滿了各種限界，沒有辦法超越，大家都努力去調整自己，使安於其所得到的——不管是多麼少。得到少的，因為會苦中作樂，得到多的，仍還有求之不得的苦惱。所以我想每個人都是非常公平的，不管你是怎樣的富裕，怎樣的有學問，或怎樣的有權勢，你和其它人的快樂也許都是一樣的，這是我的一點感觸。

還有，今天主要的都是偏重於理論上的探討，我個人是受益非淺。特別要感謝許多社會學家對我們經建會的社會福利指標所提供的意見，我們一定參考諸位先生、女士的意見來加以修正。不過有一點我想藉著這個機會說明一下，就是各位對於我們的社會福利指標，想得太複雜了。實際上，我們編社會福利指標的目的，和各位一樣，乃鑑於經濟發展帶動整個社會產生這麼巨大的改變，只以經濟上的指標來衡量經濟的一些成就，也許不是相當適當的方法，因此，加入社會方面的指標，從經濟面推廣到社會面，甚至於把社會面擴展到文化面，這其間當然受了許多實際資料的限制，並不是我們有意要選擇政府的資料，掩飾政府的一些缺乏，或是想表現政府的貢獻。實際從事編制工作的都是一些年輕的同事，我想他們基本的態度與學術界的研究是一樣的，想要求公正、求客觀，這一點我可以很大膽地在這裡保證。文教授以前也跟我提到，民族所有許多關於 quality of life 及社會指標的資料，歡迎我們去參考使用，一些老同學等也很願意幫我們的忙，高希均教授也曾跟我商量，要做一些關於台灣的社會指標及生活品質方面的研究，我想今天我們討論社會指標的目的，是想把經濟指標推廣到更廣的範圍，這起步我們歡迎在座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多多給予幫助與指教，也希望各位能多多少少給我們一點鼓勵，使得一些工作者，雖然知道事情做得並不完好，但仍有勇氣繼續努力。

從剛剛幾位的意見中，有時候會感到很有挫折感，知識分子、學者、政府官員，甚至任何一個人，在這樣多元的社會裡，都會感到社會愈來愈龐大、複雜，個人的渺小與無力感愈來愈大。個人不管如何有權勢，並不是想做甚麼就能做到，這一點，政府的決策者和一個社會學家根本上是一樣的。但是，我常常感覺到台灣的知識份子較美國的知識份子，更受到社會大眾和政府的重視，因而也更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對社會有所貢獻。

陳秉璋：

我想主觀、客觀的快樂、不快樂問題，牽涉到應然、實然；譬如說：客觀物質條件的變遷，汽車增加或是房子蓋大，理論上是應然——社會指標、物質指標提高，人應該快樂，這是應然的問題

，但是社會學家反問的問題，像葉教授所提到的 what it is 實然問題，牽涉到二個層次，舉個例子，很多人說教育普及、知識水準提高，照理說，應該民主政治的參與率會愈來愈多，這是 ought to be，但若從實然來看，受教育的人士愈多，對政治的熱情却愈來愈冷，這是 what it is。社會學家探討社會指標有二個很大的問題，如果物質客觀條件的變遷，不能牽帶著社會心理或精神條件的改變，就不能使 ought to be 和 what it is 相符合。我們以美國生活的物質條件，來推理我們的人民感受，例如：你沒有汽車，錢又那麼少，你應該不快樂，結果他的回答是我很快樂，這是我們傳統的文化心理帶給他的，沒有這些東西還是很快樂。所以，我認為社會學家在編製社會指標時，應該要考慮二個層次，一是物質層次，即 ought to be 的方向，一是社會心理及人民精神條件的配合，若不能配合，還是無法得知 what it is。但是，在重視主觀的感覺之外，也應該注重 social order 的問題。例如：台灣鄉下流行的主觀快樂是打麻將、打牌，大概這個社會層次都有這種快樂感，但是站在 social order 的立場來看，則大有問題，因此應該注意這類的問題。

第二次討論會

主席文崇一致詞

今天下午輪到我來替諸位女士、諸位先生服務。下午的論文共有三篇，第一篇是 Dr. Mark Thelin 的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aichung Harbor Area*，由謝高橋教授來評論，第二篇是瞿海源博士的 *On Some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請高承恕教授來評論，第三篇文章是王湘雲教授、陳寬政博士及蔡吉源先生三位合作的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nsumption*，請麥朝成博士評論；最後請吳聰賢教授擔任綜合評述。

一些選擇的社會指標： 台中港區發展的初步比較分析*

練馬可著 陳宇嘉譯
Mark Thelin

一、緒 論

本人能在此次會議上提出報告深感榮幸，不過同時本人覺得在現階段就提出本人的研究來當做社會指標的主題，仍有些不大適切，其明顯的理由略述如下：

1. 本研究所根據的經驗性資料，是在短短相隔三年中（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於台中港區訪問調查裡所獲得大量資料中選擇部份資料而來的。資料的選擇是基於個人的主觀判斷，但是仍然希望能夠適合今天的討論；由於本人不是社會指標分析

*本研究的兩次調查是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所進行研究計劃的一部份。本研究的完成感謝國科會及美國基督教亞洲高峯教育聯合董事會經費上的資助。

筆者並感謝環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江玉龍博士全力支持本計劃的進行並適時地提供了專業上寶貴的意見；三位研究助理陳淵先生（一九七五年的研究）、陳湖小姐（一九七八年的研究）在非常辛苦之下負責訪問調查的督導及編制表格的工作。羅貫中先生（一九七八年的研究）也參與編制表格的工作；三十八位訪問員各地奔波，戮力完成資料的搜集及郭惠瓊小姐為本報告打字。

最後，筆者對一九七五年六九九位受訪者及一九七八年八五一一位受訪者表示由衷的感謝，他們提供了本研究的資料，希望他們能夠在未來調查時如前兩次般的繼續提供合作。

的專家，在提這份報告時，本人仍覺得惶恐不安。期盼各位不吝指教。

2 正如第一點所說，兩次調查的時間只有相隔短短的三年，因此，在台中港區所做的研究結果並沒有顯示出港區的發展有什麼大的改變。所以目前只能算是前瞻性的（*prospective*）研究，而不是回溯性的（*retrospective*）研究。

3 原始資料的處理，到目前為止只運用了最基本的統計方法，尚未使用比較複雜的數量性分析（*quantitative*）。今夏本人將進行進一步的分析，盼望各位不吝指教，深感謝意。

儘管由於以上的不足，當江玉龍博士邀請本人提一篇論文時，本人大胆抓住機會，請教各位專家，各位今日專業上的回饋，對本人下一階段研究計劃將有莫大的助益。

現在本文目的包含兩層面，第一是提出資料，第二是刺激討論。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希望我的演講加上各位的協助，而得以打開社會學研究的討論，如此將不只是一件有趣的事，並且也是非常有價值及令人愉快的。

本論文報告計劃如下：

一、緒論

二、定義的問題：簡明討論社會指標是什麼？它有什麼用處？

三、兩次的訪問調查：原始資料是在一九七五及一九七八年由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所進行收集的。

四、發現：由原始資料中，僅選取有關台中港區發展的項目，加以分析。

五、兩個態度量表：包括兩個評估工具，用以評估在社會變遷中難以捉摸的態度轉變及其現象。

六、結論及建議。

二、定義的問題：什麼是一個社會指標？

在訪問表諸多的項目中，我只選取有關未來二十年內（自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五

年) 假設可能有用於變遷分析的項目來當做社會指標，那麼，我們就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什麼是社會指標？」。

目前在文獻上關於社會指標的看法衆說紛云，學者們對它發生興趣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三三年〔註一〕。然而，真正把它當做主題來討論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當時，依佛利門(Freeman)和薛爾頓(Sheldon)的意見，稱它已成為「一個社會運動」了〔註二〕。從歷史發展來看，當今對社會指標的定義仍然非常廣泛的，想要得到一致被認同的精確定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社會工作百科全書(一九七七年版)中，佛利門和薛爾頓評論說：「唯有可以反覆運用的量度(measure)，才能被認為是指標」〔註三〕，更進一步說「社會指標是時間序列(time series)，能在一連串的時間中加以比較，掌握出長期趨勢(trend)或比率變動的情況。」〔註四〕。

另外一個標準，是以實質同意的觀點來看的，「社會指標就是統計數(statistics)，可以用來測量出一些相關的情況或一些人的歸屬(attribute)。」〔註五〕

因此，雖然「指標」的定義很難達到一致同意的程度，本研究將以兩方面來加以考慮：第一、指標必須是可以測量出生活的品質並且顯示出測量的方向(quality of life and indication of directionality)，例如，量表可做判斷好或壞的程度〔註六〕。基於上述，本文中的許多資料項均可反應出生活的品質。不過，本研究中我們將比較強調在第二方面。第二、指標可以反應出樣本在兩個態度量表的觀點(views)。這兩量表是①傳統的對現代的量表，②居民預見台中港區未來發展的態度量表。

如果，社會指標被認為定義於時間序列當中，那麼，無疑的在某些方面訪問表中被選的各項目都可以當做重要的指標。理論上來說，所有的項目必須基於前次的訪問，並且應包含了一般常識的基本變數資料，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等。然後以二十年的時期為架構，做多次重覆的訪問調查，特別是在人口變遷方面，詳為記錄，當做重要的資料。如此不斷地累積資料，將可得到一個變動的或穩定的發展趨向，得以解釋並評估出居民對都市計劃的接受程度有多少？對政

府的計劃接受程度有多少？以及目前的居民對現有發展情況的反應是如何（feedback mechanism）？

一般而言，大多數的社會指標主要都以經濟為基準的，特別是在現階段的中華民國也是如此。所以，往往對於官方出版的指標，我們在學術研究上得加以澄清。例如，一九七九年中華民國的社會福利指標（由行政院經濟計劃發展委員會出版）一書中，其中一般教育與健康統計部份，如表 I - 4 關於生活環境的分析中，每人消費卡路里數是以兩方面來計算的，①為每人用布量②為每人消費食物量。又如表 II - 4，也是關於生活環境的分析，其中娛樂指標分成二項①是每千家庭電視機數②是每十萬人電台數。

我的觀點並不是否認經濟上顯著的成就，況且我認為在一個高速現代化的國家社會中，經濟面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的論點是要進一步地提出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往往大部分的人把社會指標簡化地用純粹經濟的或經濟有關的名詞來表示。當然，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充分的理由，支持這種以經濟面當做社會指標的論點，基本上我們也同意經濟面的資料可以公平的被借用來，特別是在數量的測量及分析上，可是我懷疑「量化與否」就能掌握（catch）重要的社會生活層面（dimension）？例如，在生活的藝術品質上，就無法用量化的方法來表示。不可否認地，其實電視機、電台的多寡仍是一個最簡略而清楚的休閒指標，儘管它們仍舊是不完美的。所以在研究中，我試圖做一些深入心靈層次態度的研究，因此發展出兩個態度量表。

在我討論本文內容之前，先做一點補充，當進行調查時，訪問員對每位受訪者都儘量給許多的問題，讓他們毫無線索可尋地到底應該回答那個態度述句。經過訪問員深入了解和受訪者討論之後，才圈選最適合他們意見的答案。因此，在資料收集過程及統計分析的運作上，我們儘力達成對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的描繪。所有資料都是如此形成的，特別是在處理兩個態度量表時，更為慎重。

讓我們記住鮑爾的話（Raymond A. Bauer）「有許多重要的主題，往往不經

過批判就被逕加判斷了，或者有些政策在已被執行之後，並沒有一個特定的標竿（yardstick）來判斷事情是否變好了或變得更壞」〔註七〕。本論文的資料，就是要提出「判準問題」的答案，可是目前為止，我們的答案，因為資料太少，時間太短，尚無法完整地提出答案。畢竟我們已經開始做了，希望這是監視台中港區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隨著時光流轉，得以不斷地累積經驗並尋求改進。

簡而言之，我們的資料目前只能被認為是「未成熟的」（incipient）社會指標。在我報告時，誠心希望每一位與會的學者自由地表示任何寶貴的意見，使我所選的指標得以改進，俾助益於下一次的訪問調查計劃（將於一九八三年）。

三、兩次的訪問調查

一九七四年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中心，特地選擇台中港區為長期研究對象，對未來二十年港區的變遷，做一個完整且全盤的研究。

目前，政府已經設計好台中港及其區域的整體規劃，希望藉著台中港的建造，可以大大地刺激台灣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註八〕。本研究的訪問調查開始於一九七五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聘用訪問員實地訪問，採取集叢選樣方式，最後訪問所得共有六九九個受訪單位。一九七八年夏天開始了第二次的調查訪問工作，對以往三年半的變遷做一個比較研究，特別著重在人口變遷及居民態度量表變遷方面，一共獲得八五一有效樣本。

本研究的目的是提出一些顯著的發現；以幫助政府官員、都市計劃人員、及市民了解目前實況如何？以便政府的政策及計劃，能及時實行。

首先，簡單的來看樣本的選取過程，一九七五年六九九個受訪者是採隨機集叢選樣的方式，先由四鄉鎮中（沙鹿、清水、梧棲、龍井）選出鄰或村，全部予以訪問，資料來源是由地方的戶政事務所，由於戶政資料的建立過程仍有不完美之處，如村里幹事及鄰里長實施校正不徹底，因此不可避免地，資料難免無法隨時補充，因此有許多戶籍在而人不存在的「空戶」（Empty houses）現象。另外，資料由地

方官員取得時，不只包含家庭，尚有包括工廠、商號、不管註冊與否。在處理擴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時，我們採用傳統的習俗，同炊共食者當做一受訪單位（**Rule of thumb**）。

一九七八年仍依一九七五年方法來抽樣，仍企圖選同樣的鄰里，希望能更類似「追蹤研究」（**panel study**）。可是，不幸地，並沒有完全成功，因為只有三分之一強的受訪人是一九七五年已訪過的（請看第四部分的分析），雖然仍有二分之一的家庭和商戶是相同的受訪單位。在兩次的訪問調查之後，由於商戶的數目仍太少，無法有效地使用統計方法來單獨研究，因此所有已註冊的大工商業都加以訪問（假設工廠員工如果在一百人以上，將比較具有現代化態度及價值的代表性），雖然如此，仍只有佔七%樣本而已。

四、發現：一些有關社會指標的項目

首先來看樣本的本質，在一九七五年的受訪人中只有 34.1% 是一九七八年再被訪的，同受訪單位則有 50.4%。所以同受訪單位不同受訪人有 16.3%，這種現象指出此樣本很難成爲一個「追蹤研究」（**panel study**）集叢選樣的樣本架構。

整體來說，兩次調查的樣本依各鄉鎮別的分配大致相同，只是梧棲鎮與龍井鄉稍有不同。（請看表一）

表二中，顯示出大多數的受訪單位是「純住宅」，另外純商業和純工廠的總數也超過混合家庭（家庭與商業混合或家庭與工廠混合）。一九七五年樣本中純商業和純工廠共有 48 個樣本，混合家庭爲 46 個。一九七八年則是 65 個純商業和純工廠比 59 個混合家庭。因此，基本上樣本來源是由純家庭。在比較兩次調查的各類樣本分配比率，沒有多大的差異。

從表三中，家庭大小與就業情況分配，只有一些的變動，在 60 歲組以上的人口比率由 0.4% 升至 1.4%。如果以每戶平均人口比照全台灣地區，則至一九七八年時是 6.3% 比 5.5%。

表一 依鄉鎮別的樣本分配

鄉 鎮	受 訪 者				總 人 口			
	數 目		百 分 比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清 水	264	272	37.8	32.9	71,756	74,776	39.6	39.0
沙 鹿	133	144	19.0	17.4	45,635	51,387	25.2	26.4
梧 樓	204	288	29.2	34.9	29,263	31,252	16.1	16.1
龍 井	98	122	14.0	14.8	34,700	36,952	19.1	18.5
總 計	699	826	100.0	100.0	181,354	194,367	100.0	100.0

* 1975年的數字是據1975年台閩地區人口統計68~70頁，由內政部出版。1978年資料是由各鄉鎮戶政機關提供。

表二 受訪單位種類

類 別	1975		1978	
	數 目	百 分 比	數 目	百 分 比
純 家 庭	604	86.5	705	85.0
純 商 業	3	0.4	10	1.2
純 工 廠	45	6.5	49	5.9
家庭和商業混合	26	3.7	39	4.7
家庭和工廠混合	15	2.1	21	2.5
其 他 混 合	5	0.7	5	0.6
總 計	698	99.9	829	99.9

表三 依年齡別的家庭平均人數和就業人數

	平均人口數		總 樣 本	
	1975	1978	1975	1978
總 人 口	6.7	6.3	651	768
14 歲 以 下	2.3	2.8	531	558
15~60 歲	4.0	3.9	643	752
60 歲 以 上	0.4	1.4	211	226
就 業 人 口	2.0	2.2	637	743

至於表四，可以看出平均每月每戶的收入，是依著經濟發展上「螺旋膨脹」(Inflationary spiral) 似的上升。一九七五年，收入低於新台幣伍仟元的有

表四 每戶每月平均收入

新台幣 (元)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1,000 以下	17	18	2.6	2.3
1,001 ~ 3,000	209	58	32.6	7.6
3,001 ~ 5,000	235	128	36.6	16.7
5,001 ~ 7,000	93	170	14.5	22.1
7,001 ~ 10,000	60	175	9.3	22.8
10,001 ~ 20,000	18	139	2.8	18.1
20,001 以上	9	40	1.4	5.2
總 計	641	768	100.0	100.0

71.8%，一九七八年則只剩26.6%，相反地，則有68.2%的家庭每月收入超過伍千元。另外一方面，台中港的興建，無疑地已產生了職業變動上「過濾效果」(filtering-down effect)，一九七八年樣本中有35.9%的農人(farm owner and/or operator)組，他們許多人兼有港區興建的副業或者他們住於參與港區興建的親戚家中。

表五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的受訪人是戶長(一九七五有79.2%，一九七八年有77.5%)，如果以主要家計支持者(major supportor or bread winner)比率來看，也有79.2%(一九七五年)、79.0%(一九七八年)。

表五 受訪者與戶者關係

	受 訪 者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自 己	516	594	79.2	77.5
夫 妻	59	97	9.0	12.6
父 親	0	1	0.0	0.1
母 親	8	8	1.2	1.0
兒 子	46	45	7.0	5.9
女 兒	9	13	1.3	1.7
兄 弟	8	2	1.2	0.3
姊 妹	2	1	0.3	0.1
其 他	3	6	0.4	0.8
總 計	651	767	100.0	100.0

(每項歸類包括姻親，如父親項內包含岳父、母親項內包含岳母等等)

從表六，樣本的年齡分配上來說，我們發現51歲以上的樣本比率約略增加。令人驚奇的是21~30歲的樣本增加約原來的1/3倍，即由一九七五的9.8%升至一九七八的13.4%。

表六 受訪者年齡

歲 數	受 訪 者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20 以下	9	10	1.3	1.3
21 ~ 30	64	103	9.8	13.4
31 ~ 40	161	160	24.7	20.9
41 ~ 50	216	229	33.1	29.9
51 ~ 60	118	142	18.1	18.5
61 ~ 70	65	90	9.9	11.7
71 ~ 80	18	32	2.7	4.2
80 以上	0	1	0.0	0.1
總 計	651	767	100.0	100.0

表七指出了我們預先期待的結果，高中教育以上的樣本均普遍增加，不過我們

表七 受訪者教育程度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不 識 字	186	239	28.5	31.3
小 學 肄 業	109	62	16.7	8.1
小 學 畢 業	265	343	40.7	44.9
初 中 畢 業	48	43	7.3	5.6
高 中 畢 業	21	31	3.2	4.1
高 職 畢 業	19	29	2.9	3.8
大 學 以 上	3	17	0.4	2.2
總 計	651	764	100.0	100.0

發現一個奇怪現象，就是文盲的樣本增加了，由一九七五的 28.5 % 增至一九七八的 31.3 %，目前尚不知如何去解釋，只有記錄下來。

表八中，受訪者的職業有比較大的變遷有下列幾種：①專業人員、②職員、③技工、④半技工、⑤無技術工人、⑥農人。其中，除了技工人員減少 48 % 外，其餘均呈增加。如果進一步地加以分析，無技術工人顯著的增加（30 %），可能的原因是樣本的變異再加上由於港區建造，需要大批勞工，工人行情大漲。另外一些技術性工人（如理髮師）在台中港區發展過程中，並沒有特別增加生意，而轉行幹熱門的非技術行業，儘管非技工地位低，但收入高。當然這是一個推論，尚未肯定。

表八 受訪者職業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專 門 職 業	9	16	1.6	2.7
軍 公	40	46	7.5	7.9
生意業主、經理人	72	73	13.5	12.5
職員、推銷員、會計	11	22	2.0	3.8
技 工	92	52	17.2	8.9
半 技 工	21	30	3.9	5.2
非 技 工、農 雜 工	95	114	14.0	19.6
* 農 人	212	209	39.7	35.9
其 他	1	20	0.1	3.4
總 計	533	582	100.0	100.0

* 農人包含，農人自己擁有土地或租來土地，生產農產品的農人。

表九中，因著經濟的發展，除了黑白電視機之外，所有的現代化物品擁有比率均呈大幅增加；在短短三年之中，許多家戶仍保有黑白電視機之外，又多購買彩色

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摩托車增加很多，甚至連自用汽車也增加兩倍半，電話三倍半。

表九 家庭中擁有現代化物品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訂 閱 報 紙	150	361	23.1	46.9
黑 白 電 視 機	475	451	73.1	58.6
彩 色 電 視 機	66	306	10.2	39.7
電 冰 箱	315	625	48.5	81.2
洗 衣 機	83	246	12.8	31.9
電 話	58	264	8.9	34.3
摩 托 車	240	418	36.9	54.3
自 用 汽 車	22	60	3.4	7.8
平均每家擁有	2.2	3.6		
家 庭 總 數	650	770		

表十中，顯示出居民不太有遷移行為，移動一次有稍為增加，移動四次以上的稍為減少。

表十一的樣本是就上表中不曾移動樣本加以分析，針對遷移理由只選擇最重要的答案。可惜的是一九七八年樣本在歸類時，其他項資料過多，因此兩表有點配不上。綜括而言，「財產」和「習慣性」是不遷移兩個最大的原因。

至於遷移的樣本，表十二顯示出「工作」、「婚姻」、「環境」、「家庭」等因素最為重要。有趣的是「比較好的工作」吸引力却略為減少，而「婚姻」原因却有顯著的增加。

表十三中指出回到原來社區的理由，在兩次調查中，差異相當大，減少最多的是「家庭原因」，「沒有親戚朋友在外地」，「在外地技術市場不合」。另外「退

表十 社區間移動次數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沒 移 動	497	542	76.4	70.5
移 動 一 次	45	117	6.9	15.3
移 動 二 次	54	65	8.3	8.5
移 動 三 次	18	25	2.7	3.3
移 動 四 次	13	9	2.0	1.2
移 動 五 次	7	5	1.0	0.7
六 次 以 上	16	3	2.4	0.4
總 計	650	765	99.7	99.9

表十一 留在原社區的理由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工作不可能調動	46	41	9.2	7.4
外面沒有較好的工作	32	17	6.4	3.3
家庭朋友都在此	74	45	14.8	8.1
財產在此	184	133	37.0	24.1
環境因素	33	36	6.6	6.5
住慣此地	128	165	25.7	29.8
其他		115		20.8
總 計	497	552	100.0	100.0

表十二 移到目前社區的理由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工 作 遷 調	47	55	40.5	36.4
這裏有較好的工作	18	13	15.5	8.6
教 育 因 素	1	0	0.8	0
環 境 因 素	10	22	8.6	14.6
結 婚	11	33	9.4	21.9
軍 事 調 動	17	11	14.6	7.3
家 庭 原 因 (結婚之外)	12	17	10.3	11.3
總 計	116	151	100.0	100.1

表十三 回到原來社區的理由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退 休	1	2	2.5	4.8
家 庭 原 因	9	7	23.0	16.7
外地沒有親朋	3	1	7.6	2.4
財 產 在 此	7	10	17.9	23.8
工 作 調 動	9	11	23.0	26.2
我的技術無法在 外地找到工作	5	2	12.8	4.8
外地無法找到 更好的工作	3	5	7.6	11.9
外地住不慣	2	4	5.1	9.5
總 計	39	42	100.0	100.1

休」、「財產在此」、「工作調動」、「適應」問題等均顯著增加了，由於此項樣本非常的少，我們無法更深入的討論。

另外一種的移動是主要家計維持者的職業變動，從表十四樣本中，我們發現仍具有「不變動」的趨勢，在一九七五年只有5.5%有兩次或兩次以上的變動，在一九七八年則降為4%。如果對照表十五的話，就不難知道「不變動」是可以預測的。在表十五中，最顯著的改變是「不」變動和「未決定」這兩項，專業人員高居「不確定」的第一位，職員居次，除了農夫之外，其他手工業在「不變動」中均呈增加，如果用以上的分析來推論反映勞力市場的話，仍必須注意由於樣本數太少，變異性相當大。

表十六指出，如果你「因為都市計劃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必定要遷移時，你願意選擇那裏？」調查的結果，令人驚奇的是「不知道」這一項樣本特別多，在一九七五年時有30.2%，一九七八年更高達61.6%，足足增加一倍。相對地，前三項（即同鄰里，同鄉鎮，新城市的其他鄉鎮）減少了。要詳加解釋表十六是非常地複雜。一般而言，表上的比率分配並非如我們所期待的因著距離之遠近而由高至低。

「不知道」一項的比率特別高，我們承認也許所假設的問題並不常發生在受訪者身上，所以他們不知道如何去回答，因此產生了過多的「剩餘」答案，那麼為什

表十四 家計主要維持者職業變動次數

變 動 次 數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0 次	425	546	67.0	71.8
1 次	173	182	27.2	23.9
2 次	31	25	4.8	3.3
3 次 以 上	5	7	0.6	0.9
總 計	634	760	100.0	100.0

表十五 計劃遷移——依職業別

	是 / 百分比		不是 / 百分比		未決定 / 百分比		數 目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專 門 職 業	11.1	6.7	88.9	53.3	0.0	40.0	9	15
軍 公	10.0	19.6	67.5	63.0	22.5	17.4	40	46
商 業 主	20.8	18.6	61.1	68.6	18.1	12.9	72	70
職員、推銷員、會計員	27.3	18.2	63.6	54.5	19.1	27.3	11	22
技 工	19.1	19.6	55.1	72.5	25.8	7.8	89	51
半 技 工	14.3	10.0	52.1	83.3	33.3	6.7	21	30
非 技 術 工 人	17.6	13.3	56.8	76.1	25.7	10.6	74	113
農 人	6.2	6.8	79.4	81.1	14.4	12.1	209	206

表十六 如果必需遷移，你喜歡住那裏？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同 鄰 里	162	82	25.5	13.2
同 鄉 鎮	177	77	27.8	12.4
新都市計劃區內他鄉鎮	44	18	6.9	2.9
台 中 市、 彰 化 市	22	21	3.4	3.4
台 灣 中 部 其 他 地 區	24	15	3.7	2.4
台 灣 北 部	4	13	0.6	2.1
台 灣 南 部	8	9	1.2	1.4
其 他	2	4	0.3	0.6
不 知 道	192	383	30.2	61.6
總 計	635	622	100.0	100.0

麼一九七八年的剩餘答案會比一九七五年更多出一倍呢？也許許多人不輕易地對陌生人表達意見，在這種意義之下，說不定是由於都市化（三年來）的結果，居民對陌生人的「開放性」（openness）程度已大不如昔了。這種說法只是一個大膽的假設，在下次調查時，將仔細推敲，是否如此。

另外，表十七中一些相關的問題是探討受訪者對新城市計劃的了解程度。收集這些資料的目的是為了評估他們對發展的反應和他們個人未來的計劃是如何？訪問的過程是先問受訪者「台中港區計劃中包括那些鄉鎮？」，然後再追問幾個特定公共設施將位於新城市的那裏？結果發現，只有第一個問題有比較多人答對（台中港區包括那些鄉鎮。）

兩次調查中比較之下，各項目的分配並沒有顯示出了解都市計劃的比例增加。大約有一半的受訪者，知道新城市包含那四鄉鎮，然而却有約1/3的人連一個鄉鎮也答不上來，可見不少人對都市計劃的無知。

表十七 那些社區將包含在新城市計劃中

答 對 數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1 次	26	40	3.7	4.8
2 次	12	37	1.7	4.4
3 次	93	88	13.5	10.6
4 次	330	361	48.1	43.3
完全不知道	224	306	32.7	36.7
總 計	685	832	100.0	100.0

表十八關於公共設施的了解，也再度證實了上述的說法，「主要火車站」，「輕工業區」兩項有比較顯著性的增加。以全體來說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五年了解程度略有增加。（政府決定移重工業港至鹿港是在本研究之後）。

表十八 公共設施，將位於新城市的那些地方？

	答 對 率		數 目	
	1975	1978	1975	1978
城 市 中 心	8.1	11.5	699	841
主 要 火 車 站	12.1	21.3	699	841
重 工 業 區	11.0	14.6	699	841
輕 工 業 區	11.4	20.9	699	841
文 化 中 心	1.2	4.8	699	841

表十九指出新城市計劃消息來源，主要消息來源不管是一九七五或一九七八均是多來自親友，因此傳說或是道聽途說（hearsay）是他們對都市計劃知識最大宗的來源。次要消息來源，以報紙為最多，到一九七八年時，來自政府出版品，報紙、收音機、電視的消息均略有增加。

表十九 對新城市計劃的消息來源

	主 要 消 息				次 要 消 息			
	數 目		百 分 比		數 目		百 分 比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政 府 公 告 資 料	121	151	17.7	25.7	24	30	6.1	12.0
與 官 員 交 談	9	13	1.3	2.2	11	11	2.8	4.4
公 共 會 議	14	4	2.0	0.7	10	4	2.5	1.6
報 紙	149	166	21.8	28.2	77	72	19.8	26.8
收 音 機、電 視	28	24	4.1	4.1	61	61	15.7	24.4
與 親 友 交 談	212	224	31.0	38.1	90	69	23.1	27.6
不 知 道	149	6	21.8	1.1	115	3	29.6	1.2
總 計	682	588	100.0	100.0	388	250	100.0	100.0

另外，有一個明顯的改變是「不知道」項已大大的減少了，這一個改變可以反應出一九七八年這群訪問員比一九七五年的訪問員們在資料收集技術方面更為優秀，換句話說，更能有效地探查（probing）問題，減少「剩餘回答」（Residual answers）。

五、兩個態度量表

現在，我們進入本報告的中心，我參用兩套工具來研究受訪者的態度。第一套是傳統的對現代的指數（叫做指數1）第二套是居民對台中港區未來預期發展的態度指數（叫指數2）。

要創造形成這兩個指數，需要許多相當的可被處理的資料，以解釋居民對台中港區發展中的態度。換句話說，我們考慮一些問句，例如：居民看到週遭環境變遷多少？這些變遷對他們有什麼影響？他們抱著什麼態度去面對？是接受呢？理解呢？還是聽天由命呢？

這兩種指數的項目，是由最初許多的述句中加以選出來的。指數1中（傳統對現代）共有十七個述句，希望能藉這些述句釐清並解釋傳統或現代的態度，運用四分量表來表示差異程度，請看表二十。

關於「傳統的」及「現代的」述句分類如下：

傳統的述句：

<u>題號</u>	<u>述</u> <u>句</u>
2.	風水關係到我們的命運。
9.	都市發展後，人與人的關係會變得生疏
10.	不要計劃，讓本地區自然發展比較好。
11.	都市計劃只對少數人有利。
12.	做政府機關的事比做生意好。
13.	本錢不夠，根本就沒有辦法賺錢。

14. 在團體裡，不要發表跟大眾不同的意見。
15. 選舉時，去不去選都一樣。
16. 投票時，大家選誰我就選誰。
17. 一個人想要生幾個孩子就讓他生幾個孩子。

現代的述句：

題號 述 句

1. 什麼事都要靠自己。
3. 社區裡的事每一個都可以參與。
4. 社區要發展，民間的支持最重要。
5. 這裡變成都市後，人的知識會提高。
6. 這裡變成都市後，土地會更值錢。
7. 這裡變成都市後，工作的機會增加。
8. 這裡變成都市後，每個人便能生活得好一點。

計分的方法是依回答方向而定，例如：「什麼事都要靠自己」是「現代性」的述句。所以極同意給四分，依此類推，極不同意則給1分。又如：「風水關係到我們的命運」是「傳統性」的述句，則給分相反，極不同意給四分，極同意給1分。換句話說，在做統計列表前，我們都加以規格化（Normalized）。所以「最傳統的」受訪者得到最低分，「最現代的」受訪者得到最高分。

從表二十中，我們發現在約三年多中，受訪者的態度並沒有顯著的變遷。如十二項及十四項，兩次的平均數均相同，其他項目也只有0.2左右的變動而已，假如我們所用的測量工具是可以精確量出受訪者的態度的話，那麼，正如前述「相當穩定」是台中港區居民態度的型態。

表二十一是指數2的資料，指出居民對台中港區預期發展的態度，計分的方法和指數1一樣，「一定會」給一分，「一定不會」給四分。

分析的初步結果，兩次比較之下，和指數1一樣，平均數沒多大改變，指出具

表二十 「傳統的」對「現代的」態度（指數I）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總數		平均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 什麼事都要靠自己	67.3	59.0	21.8	34.1	9.9	6.2	1.0	0.7	697	812	3.6	3.5
2. 風水關係到我們的命運	16.1	10.3	43.1	34.9	29.8	40.4	13.0	14.3	682	747	2.4	2.6
3. 社區（庄）裡的事，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24.0	32.5	36.0	54.7	33.8	12.2	6.3	0.5	684	802	2.8	3.2
4. 社區（庄）要發展，民間的支持最重要	50.8	45.1	37.4	49.0	10.0	5.5	1.8	0.4	677	796	3.4	3.4
5. 這裏變成都市後，人的知識會提高	68.7	48.1	28.2	48.5	3.0	3.4	0.1	0	677	794	3.7	3.5
6. 這裏變成都市後，土地會更值錢	67.8	48.3	24.8	42.2	6.8	9.0	0.6	0.4	661	753	3.6	3.4
7. 這裏變成都市後，工作的機會增加	70.2	49.1	25.8	44.7	3.9	6.1	0.1	0.1	675	790	3.7	3.4
8. 這裏變成都市後，每個人便能生活好一點	55.1	43.6	34.5	46.0	10.1	9.9	0.3	0.5	663	778	3.4	3.3
9. 都市發展後，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生疏	21.0	14.1	35.7	42.3	29.7	35.0	13.7	8.6	681	780	2.4	2.6
10. 不要計劃，讓本地區自然發展比較好	5.5	3.3	13.5	17.8	41.6	50.2	39.5	28.7	669	753	3.1	3.0
11. 都市計劃只對少數人有利	3.4	3.8	9.6	16.0	39.6	54.1	47.5	26.1	670	756	3.3	3.0
12. 做政府機關的事比做生意好	21.9	19.0	37.9	36.8	31.1	37.2	9.2	7.0	644	699	2.3	2.3
13. 本錢不夠，根本沒有辦法賺錢	33.9	25.2	31.1	36.5	23.4	29.9	11.6	8.4	688	795	2.1	2.2
14. 在團體裏不要發表跟大家不同的意見	10.1	8.1	35.7	42.7	36.2	34.4	18.0	14.8	683	764	2.6	2.6
15. 選舉時，去不去選都一樣	2.5	2.1	8.9	8.5	37.2	46.1	51.4	43.3	693	813	3.4	3.3
16. 投票時，大家選誰，我就選誰	2.0	3.2	9.8	15.6	27.6	37.1	60.6	44.1	693	814	3.5	3.2
17. 一個人想要生幾個孩子就讓他生幾個孩子	3.4	3.5	15.0	16.3	38.3	48.2	43.2	32.1	681	780	3.2	3.1

表二十一 居民對新城市未來可能變遷的意見 (指數 2)

您認為中港區將會：	一定會 %		可能會 %		可能不會 %		一定不會 %		總數		平均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 本鄰內許多人移入	49.4	64.3	29.0	4.7	10.3	1.6	11.3	29.5	631	747	1.8
2. 本鄰將有許多移入	11.3	25.0	17.2	4.6	40.3	3.2	31.3	67.2	611	747	2.9	3.1
3. 本鄰將有許多建設	51.4	73.8	30.1	3.9	10.6	1.1	7.9	21.1	634	726	1.7	1.7
4. 親朋將搬走	5.3	12.5	12.2	3.1	33.5	5.7	49.0	78.8	588	706	3.3	3.5
5. 親朋搬入	49.4	53.5	29.3	5.1	11.6	2.2	9.8	39.2	646	765	1.8	2.3
6. 太擁擠	36.2	53.3	19.2	2.8	18.4	2.4	26.2	41.5	646	779	2.3	2.3
7. 太吵	11.1	18.6	12.5	2.9	29.8	3.3	46.6	75.4	650	783	3.1	3.4
8. 交通	38.3	50.4	20.8	4.0	18.0	1.6	27.9	44.0	655	800	2.4	2.4
9. 改善學校	73.9	93.7	24.1	2.6	1.2	0.5	0.7	3.2	671	793	1.3	1.1
10. 改善文化、娛樂	73.5	93.7	23.9	2.8	1.8	0.4	0.8	3.1	665	783	1.3	1.1
11. 必須改變您的工作	73.9	92.0	20.3	1.8	4.0	0	1.8	6.3	675	796	1.3	1.2
12. 樂意改變您的工作	29.8	30.3	28.7	7.2	20.8	1.5	20.8	61.0	554	669	2.3	2.9
13. 找到更好的工作	51.7	38.2	18.9	0.9	13.5	4.5	15.9	56.4	565	660	1.9	2.8
14. 得到更高的收入	36.3	33.3	33.6	10.3	16.0	2.6	14.1	53.8	512	643	2.1	2.8
15. 得到更高的收入	37.5	42.3	37.3	9.1	15.0	3.2	10.2	45.4	499	624	2.0	2.5

有廣泛的穩定性，不過在項目內的分配有一些特性及改變如下述：

1. 有七個項目顯示出在分配上有很強的兩極化（bi-polarization）變遷傾向，如項目1（更多人移入你的鄰里），項目2（更多人移出）項目3（本鄰內將有更多的新建設），項目5（親朋移入），項目15（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在以上各項目中，都有兩極增加的趨勢，雖然仍呈一端大於另一端的連續似的現象。項目6及項目8（太擁擠，太吵了）一九七五年就有兩極化傾向，一九七八年更加大。

2. 有一些資料在分配趨向上（一端極端化）沒有很大的改變，但是却更多的極端化。如項目4（親朋會移出），項目7（會空氣污染）在負向上都約增加30%以上。項目9（改善交通）指出在「一定會」方向上增加20%，項目10、11（改善學校、教育文化措施）也是如此。

3. 有三個項目一九七八年與一九七五年的意見正相左，則是項目12（需要工作變遷）在「一定不會」欄中，增加約40%，項目13（樂意改變工作）也有40%在負面上增加。項目14（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則和項目12一樣。項目12、14在「一定會」項中，並沒有特別的變動，可是項目13則有大量的減少，這種情況表示，位於中間的樣本已有責任及能力重新做選擇了。因此，推論出，在三年來，這些的樣本，對未來工作「遠景」及偏好，已經有一個「實際重估」（realistic reassessment）現象。

因此表二十與二十一內部分配上的變動有所不同，表二十指出，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五年更具集中趨向，而表二十一則兩極化的傾向，這種異乎常情的現象，本人預計在今夏更深入研究。在目前我們能提出來的初步看法是職業可能是主因。例如農夫，特別是龍井鄉（位於城市計劃的外圍），他們覺得只有市中心在改變而已，其他均無甚大改變。我們預測「農人」與「絕對不會」具有高度相關。所以，職業可能是兩極化傾向的原因。

至於兩個表（二十及二十一），一個是集中趨向，一種是兩極化。因此，使我們想起，一般態度（指數1）比特殊態度（指數2）在變動速率上比較慢。從這一

個合理的線索，三年多來態度的變遷可以當做一個人經驗每日生活變遷的函數。因此在第一次研究時（一九七五），發現居民對未來的發展充滿遠景，可是三年多來，經驗修正了原來的夢想。換句話說，如果受訪者有能力去認知真正生活環境的話，如：更擁擠、更髒、更吵……等等。他們的認知結果自然可以由指數 2 表達出來。

至於指數 1，由於許多項目比指數 2 更為抽象，與個人的經驗比較無關，如：項目 7「這裡變都市之後，工作機會增加」，比指數 2 的項目 14「你會找到比目前更好的工作」更為抽象。因此項目 7 比項目 14 不具有個人心境變遷的回答，這一點是非常有趣的。在一九八三年調查時，我們將進一步檢視會如何。

除了平均數的比較之外，我們將更指出分析內部分配的重要。如在表二十一中，項目 5（增加新建築物），在一九七五及一九七八年平均數均為 1.7，然而在回答的分配上是十分不同的。一九七五年是連續性的由很高的「一定會」51.4%，依次遞減至「一定不會」很低的 7.9%，可是一九七八年分配趨於兩極化，而且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定會」這一端更加重至 73.8%。表二十一的項目 6 和項目 8 也發生同樣的情況（在表二十中變遷不顯著，看項目 2、項目 4 等等）。

最後一個表，是把許多達 0.05 以上顯著相關的發現綜合在一個簡潔的方法之中。表二十二，4 個受訪者基本特質與一些具有顯著的主要因變數的相關。表中的值是校正後的列聯相關（corrected contingency coefficient）(C/Cmax) 表示出初步的相關強度。（更高的係數表示更高的相關，由 0 至 1），以上這些值，均是在 χ^2 值中已經達到 0.05 或 0.01 以上的顯著水準。

比較特別的發現是在八個因變項中，除了第 3（想改變工作）及第 4（想要在港區工作）之外，其他均和自變數中的年齡無顯著相關。另外，指數 2（期待變遷的情緒）和職業也無顯著相關。

無消說，更多的詳細分析是必需的。可是，由於時間及篇幅上的限制，在下次研究報告中，將更詳盡的分析，也計劃用更複雜的統計方法，以解釋更精確的變數關係。

基於上述，我希望再提出兩個問題來討論，是關於態度指標方面的。

第一，是關於表二十、二十一樣本差異性的問題。一九七五年總共有六九九樣本，可是指數 1 中的各項目回答由最高的項目 1（什麼事都得靠自己）有六九七人回答，至最低的是項目 12（做政府機關的事比做生意好）有 644 樣本。在指數 2 中也是如此，甚至更大的差異，最高是項目 11（改進文化娛樂）有 675 人，最低是項目 15（可以得到更多收入）只有 499 人。

一九七八年的樣本也沒有什麼改善，在 851 個受訪者當中，指數 1，由最高的項目 16（選舉時，大家選誰我就選誰）有 814 人至最低的項目 12（做政府機關的事

表二十二 幾個主要變數和受訪者特質的顯著相關
(校正後列聯相關 C / Cmax)

因 變 數	受 訪 者 特 質							
	年 齡		性 別		教 育		職 業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975	1978
1. 計 劃 遷 移			.155	.045	.260	.259 ⁺	.313	.309 ⁺
2. 遷 移 地 方					.386	.439	.429	.441 ⁺
* 3. 想 改 變 工 作	.321	.227 ⁺					.280	.225
* 4. 想 打 港 區 工 作	.350	.270 ⁺					.276	.350
5. 對 新 城 市 了 解			.369	.307	.436	.404	.373	.378
6. 對 公 共 設 施 計 劃 了 解			.242	.349	.372	.358	.263	.440
7. 資 料 來 源			.343	.313 ⁺	.476	.421	.383	.435
8. 期 待 變 遷 態 度 (指 數 2)			.188	.205	.233	.319		
9. 贊 成 都 市 計 劃					.246	.260 ⁺		
10. 計 劃 會 完 成			.207	.366	.371	.345		
11. 傳 統 對 現 代 態 度 (指 數 1)			.214	.276	.451	.237	.384	.289 ⁺

*指主要家計維持者

+ 指達 0.01 顯著水準，其餘是 0.05 顯著水準

比做生意好)有699人。指數2中,最高的是項目8(太吵了)有800位,最低是項目15(有更高的收入)只有624人。

解釋這種原因,比較簡單,因為訪問員被叮囑不要強迫受訪者回答他們難以回答的問題,以免造成曲解。我們了解到約有30%的受訪者是文盲,並且大多數的受訪者只有小學程度(一九七五年是57.4%,一九七八年是53%),很可能他們以往從未想過這種類型的問題,所以無從答起。現在問題是:是否有什麼好的方法,能超越這個困難,歡迎各位專家多指教。

第二個問題,也許更難回答,就是態度量表在不同時間上的效度問題。我們已經假定這兩個指數能精確地量出所要量的東西。假定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是整個效度清楚的指數,而我們相信這兩個指數是有效的;那麼,我們的問題是,指數1及指數2所量的差異是否能代表實質的變遷呢?也就是說,如果指數1的平均數增加了,是否可以說母全體的態度確實比以前更具現代化了?同理,如果指數2下降了,是否可以說母全體更具有預期未來的態度,台中港區的變遷是無可避免的?

雖然這問題可以用「兩分法」(split-halves)在每次訪問時同時實施,用兩份問卷代替一份,我們却不願採取這種方式,因為我們用了三種語言(北京話、閩南語及英文),所以重新設計一套計劃,並且要符合維持標準的翻譯,並不容易。

「重試」(test-retest)技術,也不可能運用在此,因為兩次試驗時間已達三年,況且我們假設由於時間流轉,會有變遷。(如果毫無變遷,也許那時我們可以充分證明此工具是具有信度的)。因此,假使我們的受訪者代表一群真正的追蹤研究(panel study,如:受訪者均相同)那麼我們就更幸運了。然而如上述,一九七八年中只有34%的人在一九七五年是已受訪的人。並且由於消耗率(the law of attrition)如:死亡、重病、遷移,將促使重訪時的比率更低;我們如何克服這個問題呢?

我們也許可以放棄集叢選樣方法,而集中在已受訪者的再訪,加強以時間為緯的比較能力。從行政上來說,這種方法包含追蹤外移的問題(移動但仍留在港區內)

，值得爭論的是，由於移到港區之外的，已不能代表港區了，因此樣本將愈來愈少。至一九九五年也許樣本就不多了。

此外，還有一種選擇的方法，維持目前架構，以鄰為基本集叢單位，忽視鄰內的人口變遷。這種方法，使我們有更「輕便的」設計，減少補充的煩惱，不過信度比追蹤研究（panel study）更為不適當。如果我們以鄰為集叢單位，我們可以得到對台中港區發展態度更具敏感性的資料。當然，我們先假定我們的研究工具具有「內在的」信度。

最後，簡單的說，我的主要問題是思索未來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的樣本，如何去選擇。

六、結論和建議

目前研究結果指出，台中港區的發展情況自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間絕少變遷，然而，只有一點例外，就是在「收入」和「現代化物品擁有」有顯著性的差異。此外，「移出或回到原社區的理由」及「喜歡移到那些地方」也有顯著性的差異，這些都充分澄清了受訪者極端的「穩定性」，好像一九七八年（相隔三年多）這麼快就來臨了。

我們未來的研究就是以一九七五年為基準，每五年複製一次，來比較並分析變遷的情況。同時，問卷的項目將不斷地修正，當然，不希望有太多的改變，以確保可比較的基率。因此，這些「未成熟的」社會指標（incipient social indicators）將變成「成熟的」比較基礎（seasoned bases）。可是，我們仍採取「彈性」做法（flexible stance），在未成熟的指數還未被證實有用之前，不斷的修正或以新的指標來取代仍是必須的。

再一次，表達我們的感謝，能在此機會中提出論文，希望下面的討論能彼此激勵並有所收穫。

註 釋

- 〔註 一〕 看Howard E. Freeman和 Eleanor Bernert Sheldon 所著「社會指標」刊於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第十七版，第二卷，一三五—一頁。一九三三年美國總統的社會趨向委員會(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出了一本報告叫「最近社會趨向」(Recent Social Trends)。
- 〔註 二〕 同註一。
- 〔註 三〕 同註一。
- 〔註 四〕 同註一。時間序列可被當為社會指標，其範圍很廣。在Raymond A. Bauer的「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s) 中第七十七至七十九頁 Seymour M. Lipset 提出下列例子：如犯罪率，犯法，離婚，失業，公共負債增加，公共付款膨脹，收入分配，移動機會，增加藝術、文學及音樂需求，疾病的征服，自用車註冊數，自用車可用里程數，第一次婚姻年齡或生最後一個嬰孩時母親年齡。
- 〔註 五〕 同註一。
- 〔註 六〕 同註一。進一步討論請看 Angus Campbell and Philip E. Convers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更一般性討論可看E. B. Sheldon and Robert Parke, "Social Indicators," *Science* 188 (May 16, 1975) pp. 639-699. 關於進一步有關量化方面，請看 Otis D. Duncan, *Toward Social Reporting: Next Steps*, Philip M. Hauser, *Social Statistics and Their Uses*, and K. C. Land and S. Spilerman, eds.,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 〔註 七〕 Raymond A. Bauer, ed., *Social Indicators*, p. 20. 如同我的論點，我們時常把「標竿」用經濟名詞來定義，有時候並不是故意的。底下來看另外一面，是Richard N. Goodwin 在華盛頓哥倫比亞區軍械廠對來訪的外國學生演講上說：「一個偉大的社會並不是指它的數量有「多少」，而是它有「多好」，也就是說不是指物品的數目，應該是生活的品質有多好。另外，如果我們檢視美國總統的主要政策文件，特別是「經濟報告」或「預算」消息……等，最主要的指標並不是指「多好」而是指出有「多少」；也就是說不講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而只講貨物或金錢的數量。這種「經濟的實利主義」(Economic Philistinism) 只強調成本效益分析，運作上把所有政策計劃都以「金錢」來表示。請看 Bertram M. Gross在Bauer的 *Social Indicators* 一書中的序言，第7至8頁。
- 〔註 八〕 請看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出版的高雄台南區域計劃，台中區域計劃，六十年5月出版。
- 〔註 九〕 台閩地區人口統計，第九八七頁，表八十九，第六列。

參考文獻

- Bauer, P. T., *Dissent on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Debat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Bauer, Raymond A. ed., *Social Indicato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 I. T. Press, 1966.)
- Biderman, Albert D., "Social Indicators and Goals," Chapter 2. in Raymond A. Bauer, ed., *Social Indicators*, pp. 68-153.
- Campbell, Angus, and Converse Philip 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9.)
- Duncan, Otis D., *Toward Social Reporting: Next Step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9.)
- Etzioni-Halevy, Eva, and Etzioni, Amital, eds., *Social Change: Sources,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Freeman, Howard E., and Sheldon, Eleanor Bernert, "Social Indicator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17th issue, Vol. 2., pp. 1350-1354. (Washington, D. C.: NASW, 1977.)
- Gross, Bertram M.,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Chapter 3. in Raymond A. Bauer, ed., *Social Indicators*, pp. 154-271.
- Hauser, Philip M., *Social Statistics and Their Us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6.)
- Land, K. C., and Spilerman, S., eds.,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 Pannell, Clifton, *Taichung Cit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Kaohsiung and Taichung Regions*. (Taipei: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1.)
- Sheldon, Eleanor Bernert, and Moore, Wilbert E.,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8.)
- _____, and Parke, Robert, "Social Indicators," *Science*, 188 (May 16, 1975), pp. 639-699.
- Social Welfare Indicators, Republic of China, 1979*. (Taipei: Overall Planning Department,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September, 1979.)

Thelin, Mark 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lanned Urbanization, and Receptivity to Change in the Taichung Harbor Area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Central Taiwan*. (Taichung: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Tunghai University, March, 1976.)

———, *The Taichung New Harbor Area: Views from Shop and Factory*. (Taichung: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Tunghai University, September, 1976, Publication # 22.)

Winckler, Edw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gional, Urban,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1971.)

1978 *Taiwan-Fukien Demographic Fact Book,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Ministry of Interior, 1979.)

謝高橋評述

(評 Prof. Mark Thelin: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aichung Harbor Area)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小姐，今天感謝大會給予我這個機會跟各位談談 Thelin 教授的這篇文章，個人感到非常榮幸。這篇文章主要是以台中港建設為因素來觀察台中港地區的變化，在架構上很有意義。港區的建設不僅會擴展這個地區與外界的關係，也會引進相關的企業到這個港區，因而會在該地區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變遷扮演重要角色。這個發生的過程中，人們對它的反應，將會形成一個變遷過程。台中港區提供一種測量變遷的比較基礎。所以根據這個環境來做研究設計，自有它的意義。我個人願意就這篇論文提出幾個看法，供在座的討論者作為參考。

(1) Thelin 教授的研究就是建立於這一種環境，而要在二十年內實施一系列的調查研究，來探討這一變遷的過程，這是一項有趣而具有重大意義的研究，這篇論文僅是整個研究計劃的開端，唯這項研究依據的資料包含的時間太短它可能無法顯出變遷的效果，三年半的間距（1975-1978 年時間內）可能無法產生有效證據，以鑑別台中港發展的影響，因為發展的影響可能尚未發生。又態度與價值的真正改變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有穩定的趨勢。如有態度上的不同，可能會是一種波動的結果，而非真正的改變。Thelin 教授比較兩次調查所得結論是，社會條件與態度沒有顯著改變。這可能與調查的時間間距有密切關係。在這段期間，台中港的業務未有顯著的發展，似乎不可能有顯著的影響。相反地，若把沒有改變歸求生活與文化的穩定性，可能不是正確的解釋，因為時間太短不足求鑑別穩定與否。

(2) 依我看來，這篇論文似乎並不是指標的研究，而是一種變項的分析；因為所謂「指標」，一定要有它所代表的或關聯的事物或概念，而這篇文章裡，對於所代表的內容却没有明確地交待。像王湘雲教授口頭報告中就提到了社會指標的內容，指明消費代表生活品質；但 Thelin 教授並沒有指出代表物，所以如果要把這篇文章視為指標的研究，可能並不怎麼合適，反倒不如說是一個變項的分析研究來得貼切。

社會指標是用於測定社會條件或社會生活，常就社會生活或條件的要素，選取代表的指標。我個人以為這篇文章若想做為指標的研究，就一定要選擇指標，至於如何去選擇指標，根據我從這篇文章的推定，應該可以有三個社會生活的層面，可作為形成指標的領域，或許 Thelin 教授的問卷已包含了這些項目，但我還是在此提出來做為參考。見：

①人口的指標：如一個人口的組成特徵。在論文中已有人口特徵的調查，但這篇文章不是做指標的研究，所以也就沒有在這兒多下功夫；而是以人口組成的變數分析作為二個研究樣本的比較，以鑑別二個研究的相似性，並沒有討論指標，真實人口的組成可以是個很好的生活指標。

②社會關係指標：論文中的 education change，就可以作為這個方向的指針。社會關係可以包括團體和團體間的關係、社會階層、社會流動、社會凝聚、穩定、變遷等等，凡此皆可形成社會關係指標。

③福利指標：所謂福利的指標，是測定人類需要的滿足程度，如食、衣、住及行。

(3)我把這篇文章看做是變數的分析，在這分析過程中，我願意從其所包含的資料提出幾點有意義的事實來解釋，以瞭解我們社會的狀況：

①在問到居民對港區都市計劃的反應資料裡，有很高比例的港區人們表示對於港區計劃是無知的。這似乎暗示台灣目前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問題：社會參與及政治溝通。在社會參與的問題，我認為溝通與參與的前提，是讓人民曉得情況，唯有如此，參與才是可能達到的目標，否則參與便成了奢談。

②資料裡又有一個問題是「這個消息你是從那裡獲知的？你怎麼知道那裡可提供這個消息？」這個問項的主要答案是「根據謠傳或是道聽途說而得知的。」從公共場所得到的消息的比例幾乎太小，可見得政府在執行一個決策或是決定一個行動的計畫時，沒有有計畫地去讓老百姓知道內容。

假定這個研究方法與事實都是對的，我就可窺出台灣目前社會參與的情形；也由於這是一種事實的表明，所以我說這是一個變數的問題。從論文中可以感覺出來，目前政府對於政策的實施，只是作了一個官僚式的公布便算了事，沒能積極地、有計畫性地去讓人民真正知道，因此要要求人民的參與是非常困難的。

(4)至於態度測量的資料裡，只分別做了項目的平均分數，以瞭解某個面的態度，而沒有一個複合指數，以測定一般的態度。因為這種測量屬於 Likert 的加法量表，本人係把各項目的平均分數相加，再取平均數，所得的結果，1975年態度的平均分數是3.09，1978年則是3.04。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但是却有一個有趣的事實反應，就是台灣的港區居民態度已趨向現代了。因為 Thelin 教授的分數分配中，1~2代表傳統，3~4代表現代，根據分數分配，在1975年港區居民的態度已趨向現代，他們在三年半內若還要有所改變，則必定是走向現代的極端。但根據中國人的中庸之道看來，似乎是不可能出現這個趨勢，不管如何測量，也不會有顯著的變遷出現。所以我建議，如果要變遷研究，一定要在 scale 上多研究，應該採取更細分法而不是四分法。

至於 Thelin 教授在文中提到二個要解決的問題，我認為是方法上的問題，僅此提出一點淺見供參考：

(1)問項反應的差異（即是有些問項未被回答），可能涉及幾個因素：①受訪者可能不瞭解或不知道，如測量表有“不知道”的反應類目，就可予以鑑別，②因為未被回答的問項多在問卷表後面，這可能是問項太多引起受訪者的厭倦，不願作答，③這是一種問卷不完整的現象，它可能表示訪

問員缺乏探測反應的技巧。

(2)在 Danel Study 要維持相同樣本是極為困難，尤其是長期間的比較，有兩種方法似乎可參考：①建立固定樣本，而於每次調查時，以個別比對方式，將相似的樣本代替喪失的樣本，但這方式在長期研究可能無法維持，②經由第一次調查取得之樣本的所有相關特徵，創造一個配額矩陣 (quota matrix) 的樣本架構，作為後一次調查設立樣本的依據，而建立一種與前相類似的樣本。

論幾個與社會變遷有關的心理指標

瞿 海 源

Here I want to see those men of hard voice.
Those that break horses and dominate rivers;
those men of sonorous skeleton who sing
with a mouth full of sun and flint.

—*Federico Garcia Lorca*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er cannot hold;....
The blood-dimmed tide is loosed, and everywhere
The ceremony of innocence is drowned;
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

—*Yeats*

引 論

許久以來，不少社會科學家就認為人在心理上的轉變是社會變遷的重要特徵之一〔Weber 1958, Burckhardt 1945, Fromm 1941, Riesman et al. 1953, McClelland 1961, Hagen 1962〕。在六〇年代，有些社會學家更認為有所謂的“現代人”存在。其中有些學者就試圖客觀地測量或勾勒出這種“現代人”的正面

形象；在另一方面，有不少具有人道主義傾向的社會科學家和藝術家却指出了不少現代人之負面特徵。於是對前者而言，現代人是富有創意的、民主的、開明的、現在或未來取向的、有計劃的、有效率的、會精打細算的、自我尊重的，甚至於是公正的〔 Inkeles 1966, McClelland 1961, Lerner 1958 〕。但對後者而言，“現代人”是疏離性很強的，有無家可歸之感的、迷惘的、冷漠的、人性遭到污蔑的、乃至於有着無權力感的〔 Laing 1966, Slater 1971, Berger et al. 1974, Braverman 1974, Fromm 1941, Nisbet 1976 〕。

個人現代性的研究者又聲稱“現代化”程度愈深的人，心理疾病的傾向也就愈弱〔 Inkeles & Smith, 1972, 楊國樞與瞿海源 1975, Armer 1970 〕。例如，這些研究者指出，個人現代性和疏離感以及心理疾病傾向成負的相關。於是他們企圖辯稱，現代化的過程對心理衛生並無妨害。但另有許多精神醫學家、藝術家、小說家、及少部份社會科學家却認為，現代文明裡快速的社會變遷增加了人類心理的緊張程度，因此而導致了心理疾病與不良適應的增加。這種說法，很顯然和個人現代性研究者的論點恰恰相反。這主要乃是由於不同層次的不同指標所造成的混淆。

在本文中，我們試圖對兩類既存之資料做進一步之重新分析，以澄清因層次不同而造成的混淆。首先，我們利用不同心理疾病的罹患率來探究社會變遷對心理衛生的負面影響。其次，我們再度謹慎地檢視態度現代性與個人心理健康間的關係。根據上兩個層次的分析，我們將討論依據群體及個人層次之相關，錯誤地導致在另一層次上的不正確結論的情形。這樣錯誤的導引也就造成了前述相互矛盾的結論。

社會變遷的心理指標—社會層面

國立台灣大學附屬醫院的林宗義醫師等人在1946到48年間曾做了一次太規模的心理疾病的普查工作。在新埔、安平、木柵三個地區，他們一共調查了19,931位居民。十五年以後，該醫院在同一個地區又做了一次類似之研究。研究的方式也沒有變更。第二次接受調查的人數是29,184位。這兩次大規模調查所得的資料是

非常有價值的。在本研究中，我們選取部份二手資料來加以分析。希望藉此能釐清一些論點。表一是林宗義等人提出的基本資料之一，本研究對其中的統計分析做了一番檢驗與修改。林宗義等人在比較兩次調查的結果時，首先指出，不論在年齡結構、職業結構和教育程度上，在十五年之間均有明顯的變遷，這些變遷和歷史的因素以及經濟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伴隨着這些變遷而來的是心理疾病罹患率的顯著改變。就所有心理疾病的罹患率而言，整個趨勢是增加的。在 1946—48 罹患率是千分之 9.5；但在 1946—63，此項罹患率就增至千分之 17.2。這樣的增加是相當顯著的（ $Z = 7.10$ ， $p < .001$ ）。進一步檢視，我們可以發現，這種顯著的變遷主要來自於神經官能症（psychoneurosis）而不是精神病（psychosis）。資料顯示，當精神病罹患率自千分之 3.9 降至千分之 3.1 時（ $Z = -1.49$ ， $P > .05$ ），而神經官能症的罹患率却顯著地由千分之 1.2 增加到千分之 7.8（ $Z = 10.05$ ， $p < .001$ ）。

林宗義等人認為這種結果大致上支持了精神病較少受環境變遷影響的說法。“在精神病的罹患上，某些內在的遺傳和機能的因素具有較為重要的影響”（1969: 90）。在三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中，神經官能症都有顯著增加的趨勢。這似乎顯示出快速變遷對人們心理健康的不良影響。

在整個趨勢來看，還有幾項調查結果相當特別。第一個是智能缺陷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Z = 2.49$ ， $p < .01$ ）而且是在低階層才有這樣顯著增加的跡象，在中、上階層却不如此。林宗義等人認為這是由於“智能缺陷者多半具有較低的社會流動性”的原故，不過他們也並不排除智能缺陷者有下降流動的情形發生。以目前的證據，我們似乎還沒有辦法來澄清這種特殊現象的究竟。第二個較特出的結果是，精神分裂病罹患率之降低（ $Z = 2.10$ ， $p < .05$ ）。這種降低的情形也是在低階層中最明顯。高階層雖也有相當的差異，但並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對於這一點，林宗義等人並沒有提出任何進一步的解釋。如果我們同時來考慮這兩項結果的意義，很可能精神醫學診斷本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換言之，很可能，在 1961—63 的

調查中，精神醫師較傾向於診斷病人為智能不足。於是智能不足之患者所佔比例增加了，而精神分裂者的比例却往下降。依林憲的說法，還有一種可能的原因可以拿來解釋智能缺陷患者增加的原因。那就是，在低層社會裏腦部受傷頻率之增高造成了嚴重的智能缺陷。這種解釋有相當的說服力，但似尚須進一步的研究來釐清。

在分析了社會因素對心理疾病的影響狀況後，林宗義和朱桓明指出“遷移”是最重要的具影響力的因素。不論就貫時性的或是同時性的資料來看，遷移都具十分顯著的影響力。林宗義等人還特意指出：

不論在任何階層裏，中等年齡之組群中（即 31-40，41-50，51-60），具小學或無正式教育者在神經官能症上的罹患率最高。尤其是在我們的第一次研究後移進我們所研究的社區裏的人口裏更為明顯。

以上大致根據台大醫院精神科的調查資料，指出了社會變遷和心理疾病間的可能關係。大致說來，不同心理疾病之罹患率的差異似和社會變遷有顯著不同的關係存在。若能進一步研討，心理疾病，尤其是神經官能罹患率當可做為社會變遷的一項有意義之指標。林宗義等人的研究相當特出，也在國際上頗享盛譽。但他們的研究仍然有下面三個缺點：第一，由於只有兩組間隔十五年的調查資料。兩組資料的差異所顯示的意義並不是十分清楚的。在十五年的間隔中，心理疾病罹患率的變遷很可能並不是直線型的。也就是說十五年間的變遷可能有很明顯的起伏。例如，神經官能症的罹患率有可能先減後增。而起點與終點間的差異是否足以表示出社會變遷的影響，就很難以斷言了。第二，林宗義等人的論文多側重問卷資料的陳列，在解釋部份著力不多。更沒有發展出較完整的理論架構。這或許是受當時既有統計分析方法的限制而無法將資料做高層次的分析的緣故。若有研究者仔細在釐清社會變項與心理疾病間的因果關係，再採用較進步的因路或迴歸分析來重新處理原來的資料，或可補救此項缺點。第三，這兩次的調查是在三個大社區所做的普查，規模很大，資料搜集也很齊全。也因此，幾乎找不到另一項能相匹配的研究。於是，該研究所得結果之含意就難以用跨文化的證據來予以支持。

爲了解決前提第一項的缺點，我們另行搜集了台北市的有關資料來驗證林宗義等人所提出的論點。這項資料是根據台北市1968到1976的各年統計要覽整理分析而來。原始的資料是記載台北市市立醫療機構各種疾病的門診人數。所記錄的疾病共爲一百三十二種。經進一步計算後，我們發現有七種疾病的罹患率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這七種疾病中有兩種和心理健康狀況有關。一種是神經官能症，另一種是消化性潰瘍。爲了更明確的瞭解心理衛生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我們又選取了另外兩種疾病之罹患率來做比較研究用。相對於神經官能症，我們以精神病之罹患率做爲比較的依據。另以機能性胃腸潰瘍做爲與消化性潰瘍的比較對象。選取這兩對疾病罹患率來做比較分析的主要原因是，精神病，如林宗義等人的發現，和社會變遷的關係非常小，而神經官能症却不然；機能性潰瘍和社會變遷所引起的社會心理壓力也多無關係，相反的，消化性潰瘍許久以來即被認爲與心理壓力有關。

林宗義等人（1969）與林憲（1976）認爲神經官能症罹患率之增加可以反映出快速的社會變遷所造成的情緒緊張和適應問題。在另一方面，精神病患率之極少改變可能顯示了其與環境變遷極少關聯的情形。根據台北市的資料我們就針對這兩種情況加以分析討論。由於只有七年完整的資料，同時該項資料的信度與效度，因係官方公佈之唯一統計資料，也無法予以檢定。因此，我們只能根據這有限的資料做探索性的時間序列分析。若把男女分開，那麼兩種疾病之罹患率和時間之間的關係可以變成四個方程式。在這裡，我們粗略地以時間來表現整個社會變遷的狀況。如果罹患率與時俱增，就表示社會變遷與之間有直線相關。反之則無。此外，我們也嚐試發展不同的方程式來切合資料所顯示的型態。

正如本文先前的預測一樣，結果顯示精神病罹患率在1970到1976年間並無顯著變遷的情形。就男性而言， r 是 .19 ($p > .05$)，對女性而言， r 值雖高出許多 (.69) 但並不顯著。因爲在檢視根據實際資料所繪之圖表後，我們也試圖發展其他類型的方程式，但是我們並未能獲取更優於直線方程式的式子。因此，大致上我們可以指出，精神病罹患率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甚少關聯。但是，在另一方面

表一 1946~1948及1961~1963台灣三社區每千人各類心理疾病罹患率
(林宗義等人之調查資料)

心理疾病類別	社 會 階 層						
	上 1946-48	1961-63	中 1946-48	1961-63	下 1946-48	1961-63	合 計 1946-48 1961-63
精神分裂症	3.5	0.8	1.2	1.1	4.5	2.1*	2.2 1.4*
躁 鬱 狂	1.1	—	0.6	0.7	0.6	0.3	0.7 0.5
老年精神症	—	—	0.1	0.4	0.9	0.4	0.3 0.4
其他精神症	0.6	2.5	0.5	0.9	1.3	0.4	0.7 0.8
精神病總計	5.2	3.3	2.4	3.1	7.3	3.2***	3.9 3.1
智能缺陷	1.1	0.8	2.6	3.0	6.6	9.4*	3.4 4.9**
人格異常	1.1	—	0.7	0.7	1.9	2.9	1.0 1.4
神經官能症	2.9	13.1***	0.9	7.0***	1.5	8.7***	1.2 7.8***
全部心理疾病合計	10.3	17.2	6.6	13.8***	17.3	24.2**	9.5 17.2***
調 查 人 數	1,727	1,218	13,501	18,998	4,703	8,928	19,931 29,184

資料來源：Lin et al 1969: 82

註：1 本表特將各類精神病合計以資比較。

2 林宗義等人原來報告中錯誤部份在本表中已訂正。

3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表二 台北市各類心理疾病罹患率（根據台北市立醫療機構門診病人計算）

年 份	精 神 病		神 經 官 能 症		消 化 性 潰 瘍		胃 炎 及 十 二 指 腸 炎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68	—	—	—	—	29	20	78	61
1969	—	—	—	—	60	45	85	75
1970	17*	13	8	8	65	43	71	66
1971	16	14	13	12	37	22	122	100
1972	20	19	21	16	53	40	208	161
1973	13	18	27	20	76	50	134	92
1974	(17)	(17)	43	38	78	41	30	32
1975	16	16	27	22	106	63	35	33
1976	20	20	33	31	104	60	38	37
r	.19	.69	.81	.81	.82	.74	-.30	-.33
F	.18	4.58	9.72	9.72	14.59	8.47	.69	.86
P	.05	.05	.05	.05	.01	.05	.05	.05
b	4.46	3.96	7.18	3.97
a	6.73	5.16	33.66	22.82

*每十萬人

，神經官能症與其他非精神病之心理疾病之罹患率却有着顯著不同的結果。從1970年開始，不論在男性人口中，或是在女性人口中，這一類病症都呈顯著的直線增加的情形。分析結果請見下列方程式：

$$Y_M = 6.73 + 4.46t \quad (r = .81, p < .05)$$

$$Y_F = 5.16 + 3.96t \quad (r = .81, p < .05)$$

式中， Y_M 表預測之男性神經官能症罹患率， Y_F 表女性者， t 的單位是年。

以上時間序列的證據相當程度地支持了林宗義等人的發現，即社會變遷導致了更多的神經官能症的病患，而對精神病之罹患仍無明顯影響。我們在這裡所運用的資料雖然是時間序列式的，但是由於資料僅限於1970到1976，而林宗義等人的資料又是1948-49，和1961-3，並無法相互連貫起來。另外，兩類資料的罹患率顯然很不相同。林宗義等人的係三個社區的普查資料，而台北市的資料僅止於市立醫療機構的門診人數。不過，無論如何，兩類資料都顯示了極相類似的結果，我們似可下結論稱：社會變遷會造成較多的神經官能症患者。換言之，快速的社會變遷對人類的心理健康是有害的。

第二對我們要研究的疾病都是消化系統方面的疾病。理論上來說，消化性潰瘍和心理壓力有密切關聯。在另一方面胃炎和十二指腸炎則多半與心理壓力無關。因此我們可以預測消化性潰瘍會與時俱增，而腸胃炎則否。這是由於快速的社會變遷會增加人們心理上的緊張與壓力。

結果顯示，台北市市立醫療機構門診的病人中，消化性潰瘍的罹患率有顯著增加的趨勢。我們建構了下列兩個方程式來檢視時間與消化性潰瘍罹患率之間的直線關係：

$$Y_M = 33.66 + 7.18t \quad (r = .82, p < .01)$$

$$Y_F = 22.82 + 3.97t \quad (r = .74, p < .05)$$

消化性潰瘍一般是指在胃部或十二指腸由於酸性消化液分泌過多而造成的潰爛，有時會大量出血。以往許多心理學的研究都一直指出情緒是造成酸性消化液分泌

過多的重要因素之一〔Ullmann and Krasner 1972: 347-348〕。在現代社會裡，變遷速度很快，人們很可能在適應過程中遭遇到許多情緒困擾和心理壓力。於是，如前述結果所顯示的情形，消化性潰瘍的罹患率在1968至1976年之間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但是，就腸胃炎的情形而論，我們發現其罹患率與社會變遷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直線關係。因為腸胃炎多半與飲食衛生有關，而和心理壓力或情緒困擾並無關聯。在檢驗線性相關的方程後，我們發現代表男女兩組的直線方程式解釋力均甚小。進一步，我們試圖以正弦函數來表示罹患率和時間的關係，結果如下：

$$Y_M = 14.23 + 118.89 \sin t\pi/9 \quad (r = .70, p < .05)$$

$$Y_F = -84.66 + 250.69 \sin t\pi/9 \quad (r = .72, p < .05)$$

雖然，我們發展了兩個可以切合資料的正弦函數方程式，但是腸胃炎罹患率與社會變遷間的關係實在仍舊十分含混。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還無法解釋，為什麼此項罹患率自1968年穩穩地上升，而在1971年後就快速下降。快速的社會變遷造成心理壓力的說法顯然與此無關。我們在此，約略可以下結論稱，消化性潰瘍罹患率可以反映出社會變遷所形成的漸增之心理壓力，而腸胃炎則否。消化性潰瘍罹患率的變遷似可相當程度表現出快速社會變遷對心理健康的不良影響。

最後，在這一節裏我們要討論一下自殺率的問題。根據林憲的研究，自殺仍被認為是心理因素所引起的。不過，若從涂爾幹的傳統來看，則自殺應與社會經濟狀況的改變有關，而不能以心理的因素來解釋。在論及反常的自殺(anomic suicide)時，涂爾幹說：“如衆所週知，經濟的危機會使自殺的趨勢劇烈惡化〔Durkheim 1951: 241〕”。最近，Vigderhaus及其助手根據涂爾幹的理論研討美國1920-1969年間失業率和自殺率的關係。在控制了人口結構的變遷以及性別和種族後，他們發現失業率是預測長期及短期自殺率變遷的最重要的穩定性因素〔Vigderhaus 1978: 40〕。根據台灣地區1953-1971年間的自殺率與失業率，我們計算出了這兩項指標的簡單相關。結果發現此項相關為.53 ($p < .05$)。

這個結果顯示，失業率極可能足以反映出經濟危機的效果而影響到了自殺率的變遷。雖然我們需要搜集更多其他有關的資料來做進一步的剖析，但是目前這項結果似已略略指出自殺率是反映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個社會指標，而不是一個心理的指標。

歸結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在過去十年中，神經官能症和消化性潰瘍的罹患率有顯著增高的趨勢。在另一方面，精神病和腸胃炎的罹患率並未呈明顯的增高型態。於是，大致上我們可以指出，神經官能症和消化性潰瘍兩種疾病的罹患率應可做為有效地反映出社會變遷有害於人類心理健康的指標。這主要是因為這兩種疾病與社會變遷所形成的適應問題有關。另外，自殺率和失業率之間的顯著相關支持了涂爾幹強調經濟危機對自殺影響的說法。換言之，自殺率應是社會經濟性的，但非心理性的指標。

因受現有資料的限制，以上的結論亟需我們進一步的研析。大致說來，現有資料有下列三項限制。第一，資料範圍的侷限性，如林宗義等人的資料僅限於三個社區，而台北市的資料又僅止於市立醫療機構的門診人數。其次，在時間方面也略短了些，不太容易得到更有力的結論。第二，資料不易相互印證。即門診人數所算出的罹患率和普查所得之罹患率在意義上有很大的出入。在這麼大的出入下，我們仍得到相同的結果，似乎我們的結論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更精確的結論須奠基於出入較小的統計資料。第三，由於均為次級資料，許多地方雖急需做進一步的分析，却不可得。例如若進一步分析林宗義等人的原始資料將可獲得更有意義的結論，但我們目前只能依據次級資料來研究。

社會變遷的心理指標——個人層面

心理現代性的測度

個人現代性之研究者強調在現代化的過程裡，現代性的價值觀是十分重要的〔Inkeles 1966, Inkeles and Smith 1974〕。一般而言，所謂的現代性包括了下列的心理特徵：積極參與、理性、世俗化、成就取向、不受家庭束縛、以及易於接

受變遷。這些特徵促成了個人的“現代”行爲，因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期，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根據這個論點編製了不少個人現代性的量表。雖然這些量表及相關的個人現代性之研究在最近遭受到了猛烈的攻擊，但是，如果我們不去爭論，個人現代性是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因或是果，而僅將個人現代性當做是反映社會變遷的一個社會心理指標，則問題就單純多了。在國內，瞿海源與楊國樞在1970年編製了第一個個人現代性的量表，測量對象是大學生。隨後，瞿海源編製了適合於各類居民的個人現代性量表〔瞿海源 1974, 1975, 1976〕。

在本文中，我們將就上述第二個量表來研討這個社會變遷的社會心理指標。資料來源是十個在台灣北部及東部的社區。其中包括鄉村區、市鎮區、和都會區；也包括了閩南人、客家人、布農族、泰雅族、阿美族、以及大陸省籍的居民。這個量表的信度與效度就傳統的測量理論而言尚稱滿意。如把各社區的資料合起來看，Cronbach alpha爲.89。在效度方面，該量表與七類有關變項的相關與以往個人現代性研究的發現相一致。這七類變項中，有五類是屬個人的特徵，兩類係社區的特質。個人的特徵包括了年齡、性別、教育、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宗教信仰；社區的特質包括了種族及都市化程度。

表三係有關個人現代性量表迴歸分析的結果。在理論上，一般均假定教育程度和現代傾向的態度成正的相關。個人現代性的研究者也多半主張，現代的正規教育是培植現代價值觀念的重要力量。根據分析，教育程度確實對個人現代性有顯著的純淨影響（ $\beta = .32, p < .001$ ）。其次，我們要驗證的是年齡的效果。個人年齡的不同所面臨的社會化情境也十分相異。尤其在近百年來，科技及經濟的快速變遷使得社會化情境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現代制度”（modern institutions），如學校教育及大眾傳播，是快速變遷的特徵中重要的一環，對個人的社會化也有著極特出的影響。於是我們預期年齡對個人現代性有顯著的影響。分析的結果證實了這項預測（ $\beta = -.25, p < .001$ ）。這項負向的純淨影響

顯示了年齡愈大，其個人現代化程度就愈低。與預測的方向相一致。

在以往的有關研究中，性別與個人現代性有着相當含混的關係。有些研究指出男性的個人現代性較強，而另一些則發現女性的較強。另有一些研究却找出不性別與個人現代性有任何顯著相關的證據。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性別對個人現代性有着顯著但又相當弱的影響（ $\beta = .07$ ， $p < .001$ ）。雖然男性比女性在態度上現代化程度較高，但此一微小的影響量似乎並不是十分有意義的。

與個人現代性有關的第三類變項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若當作社會經濟的重要指標之一，父母的教育程度常被認為“對現代價值觀念的發展是極為關鍵性的，因為它們不只左右了接觸現代化的早期經驗，同時也影響到個人是否可因而獲取某一社會地位而來強化及擴展及早期現代化的經驗〔Portes 1973: 29〕”。不過，由於子女的教育程度和父母的教育程度常呈很高的相關，此項效果很可能是一項透過個人本身的教育程度而發生作用的不直接的效果。換言之，父母之教育程度本身對個人現代性並無直接影響〔Portes 1973, Grasmick 1973, Inkeles and Smith 1974, Klineberg 1974〕。在我們所研究的十個社區裡，這種預測也獲得了肯定。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個人的現代性呈顯著的零序相關（與父親教育程度之零序相關為.56，與母親的教育程度之相關則為.36，兩者均具.001之顯著水準）。但是 β 係數却均甚小而不顯著（.03及-.04， $p < .05$ ）。因此，我們大致可確定，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個人之現代性並無有意義的影響。

雖然個人現代性的研究者常強調韋伯有關基督新教倫理的說法，但是在實際研究上宗教對個人現代化的影響情形多被疏忽。在極少數的有關研究裡，却又發現宗教信仰的類別與個人現代性並無關聯〔Inkeles 1976〕。不論，在本研究中，我們循韋伯之理論，假設信仰基督新教者較為現代化些。在實際分析中，我們用了五個虛擬變項來測度六種宗教信仰者在個人現代性上的差異。很不幸的是，所得結果恰好與韋伯的理論相反。我們僅發現基督新教有顯著的 β 係數（ $\beta = -.09$ ， $p < .05$ ），而且是負值的。其餘各類宗教均無顯著的相關。或許基督新教傳入之

歷史甚短，到目前尚未能發展出任何類似韋伯所強調的新教倫理。當然，也可能是韋伯的說法有問題。若要澄清這幾個問題，勢必得做進一步之研究。

總論之，所有的研究發現都與以往個人現代性研究所得結果是很一致的。個人現代性與個人的教育程度、年齡有純淨相關；與父母教育程度無關；而與信仰基督教與否及性別呈低度的相關。大致上，我們似可將個人現代性當作是反映社會變遷的一項社會心理指標。

至於在社區層面之變項對個人現代性的影響，結果並不十分明顯。都市化的程度對個人現代化程度的影響僅及 .05 之顯著水準 ($\beta = .06$)。這意指個人所居住的地方都市化程度愈高，其個人現代性也有偏高的趨勢。但此項影響在幅度上很小。另就種族及籍貫而言，泰雅、阿美、布農、及閩南籍的居民都傾向於具較低之個人現代性。這種結果很可能反映了社會階層上的差異。因為一般而言，在我們所研究的十個社區裡，大陸省籍居民屬中上階層的較多，而泰雅、阿美、布農、及閩南籍的居民屬中下階層的較多。本研究缺少有效的社會階層的指標來加以澄清，似有待未來進一步之研討。

從以上的討論，大致上我們可以看出個人現代性有可能成爲反映社會變遷的一項心理指標。理想上，我們似可在不同的時間連續測度此項指標，以探索反映出社會變遷的心理上轉變之狀況。不過，由於個人現代性的測量目前在方法及方法論上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Chiu 1979〕，進一步的研究須加以慎重的處理。例如，個人現代性的概念相當含糊，且受濃厚的西方中產階級價值觀念的影響。若能將測量的範圍縮小，而減低其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色彩，則此類指標將較爲完善。最後，必須再特別指出，在本文中我們只把“個人現代性”當做是一項反映社會變遷的心理指標，並不認爲，個人現代性是促成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因素。因爲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含糊而複雜。約略地說，我們比較傾向於肯定個人現代性受社會現代化影響較大。主要原因是，個人現代性直接受現代制度，如學校教育影響。

心理現代性與心理健康

如上文所論述，就社會層面而論，當代快速的社會變遷對心理健康有着不良的影響。神經官能症以及消化性潰瘍的罹患率愈來愈高，而這些疾病與心理調適之不良有密切的關聯。但是，個人受現代化影響的大小在理論上不一定和個人是否傾向罹患心理疾病有關。這是因為，在個人層面的相關與社會層面的相關是很不相同的。後者被稱之為區位性相關 (ecological correlator.) (Robinson 1950, Langbein and Lichtnan 1977)；前者似可暫稱為個體性相關 (Individual correlation)。兩者不僅不同，且不可相互轉用。

根據楊國樞與瞿海源的研究，個人現代性似與某些反映心理健康的人格特質有某種程度的相關。個人現代性愈高，心理健康狀況也愈好〔楊國樞等 1974〕。在他們的研究中，五個不同的人格測驗被用來測度個人的人格特質。這五項測驗是毛茲里人格問卷、卡特爾十六項人格因素問卷、加州人格測驗、G-Z 氣質量表、以及顯性焦慮量表。研究的對象是大學生。個人現代性的資料與人格測驗施測時同時收集。其大致發現如下：

在男大學生中，神經質 (neuroticism) 和個人現代性成負的顯著之零序相關 ($r = -.32, p < .001$)。但在女大學生中，此項係數為 .00。這項結果意指男大學生個人現代化的程度似與心理焦慮之減低有幫助。在一個類似的研究裡，Dawson 在香港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只是性別上的差異並未被明確指出。Dawson 發現在香港華人學生中，若具較現代的態度，那麼神經質傾向、態度上的嚴重衝突、以及皮膚電反應所顯示的焦慮程度都顯著地比較低一些。

卡特爾 (1956) 認為焦慮是人格特質中的次級因素 (second-order factor)。這個次級因素包括了：穩定性、憂慮性、自律性、緊張性、與妄想性。這些人格因素和個人現代性的相關並不十分明確。其間，與個人現代性呈正相關的僅有穩定性一項 (在男大學生中 r 為 .177, $p < .05$ ；在女學生中 r 為 .122, $p < .05$)。

與個人現代性呈負相關的亦僅有憂慮性一項（在男學生中為 -0.283 ， $p < .001$ ；在女學生中為 -0.158 ， $p < .05$ ）。至於自律性，僅在男大學生中與個人現代性呈正相關（ $r = 0.152$ ， $p < .05$ ）。此外，妄想性與緊張性和個人現代性之間均無顯著相關。於是，個人現代化和心理健康呈正相關的假設只獲得了部份支持。

加州人格測驗施測所得結果對上項假設也只提供了相當弱的支持。幸福感一項僅與個人現代性呈顯著但又低度的正相關（在男性學生中， $r = 0.076$ ， $p < .05$ ；在女性學生中 $r = 0.244$ ， $p < .05$ ）。至於GZTS和MAS測度的有關焦慮的特質也多半與個人現代性缺乏有意義的相關性。

總而言之，個人現代性與心理健康間有着相當弱的相關。在個人現代化的過程中，態度愈現代化的人多半較少有焦慮和神經質傾向。但這種關係不是很明顯的，同時也只是一小部份的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說法。此項結果與Inkeles等人的發現十分相近。在六個不同的國家裡，個人現代性和心因性症狀間僅在阿根廷、孟加拉國、印度和奈及利亞呈顯著但又低度的相關（阿根廷為 0.07 ，孟加拉為 0.09 ，印度與奈及利亞均為 0.15 ）。在智利（ $r = 0.03$ ）和以色列（ $r = 0.00$ ），此項相關幾趨近於零。Inkeles和Smith居然根據這些微弱的證據下結論稱：“我們發現個人接觸現代化經驗愈多的人，或在態度、價值、和行為上較為現代化的人並不比那些現代化程度較淺的人在適應上有較多的困難（1976：230）。”進而否定現代化對心理健康的威脅。

由於證據的薄弱，楊國樞等人以及Inkeles等人的結論都是有問題的。同時就個人層面所得的資料，從事論析時，他們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試圖以微弱的相關來證實個人現代性與心理健康間正面的關係。據此而從個人層面跳至社會層面，來肯定現代化的價值。這種在分析層面上的跳躍與變動是錯誤的，我們將留待在下一節討論中多加論述。在這裡，我們要指出個人現代性與心理健康間關係薄弱的可能原因。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兩者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直線關係，而是曲線型的。也就是說，很可能現代化程度很高的與很低的，心理上的衝突較少，焦慮較低。但

表三 台灣十個社區個人現代性之迴歸分析

	beta	p		beta	p
性 別	.07	.000	基督教徒	-.09	.023
年 齡	-.25	.000	回 教 徒	.06	.056
教 育	.32	.000	其他教徒	.04	.137
父 親 教 育	.03	.239	閩 南 人	-.23	.000
母 親 教 育	-.04	.073	客 家 人	-.05	.044
都 市 化	.06	.015	阿 美 族	-.25	.000
民間信仰者	-.08	.076	泰 雅 族	-.20	.000
天主教徒	-.02	.633	布 農 族	-.20	.000

$R = .70$, $R^2 = .49$, $p < .001$

表四 社經地位、傳統價值與生理心理疾病反應 *

	傳 統 價 值 (X)									
	高			中			低			
	社經地位 (Z)			社經地位 (Z)			社經地位 (Z)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生理心理疾病反應 (Y)	是	12	22	22	35	28	21	40	11	14
	否	28	18	26	69	28	37	61	10	3
合 計	40	40	48	104	56	58	101	21	17	

*資料來自林憲 1970

表五 表四資料之 Log-linear 模式分析結果

模 式	代 表 方 程 式	χ^2	d_f	p
[YXZ]	$u + u_i^Y + u_j^X + u_k^Z + u_{ij}^{YX} + u_{ik}^{YZ} + u_{jk}^{XZ} + u_{ijk}^{YXZ}$	0	0	
[YX][YZ][XZ]	$u + u_i^Y + u_j^X + u_k^Z + u_{ij}^{YX} + u_{ik}^{YZ} + u_{jk}^{XZ}$	8.18	4	.085
[YX][XZ]	$u + u_i^Y + u_j^X + u_k^Z + u_{ij}^{YX} + u_{jk}^{XZ}$	21.39	6	.002
[YX][YZ]	$u + u_i^Y + u_j^X + u_k^Z + u_{ij}^{YX} + u_{ik}^{YZ}$	57.94	8	.000
[YZ][XZ]	$u + u_i^Y + u_j^X + u_k^Z + u_{ik}^{YZ} + u_{jk}^{XZ}$	13.22	6	.039
[YX][Z]	$u + u_i^Y + u_j^X + u_k^Z + u_{ij}^{YX}$	68.74	10	.000
[YZ][X]	$u + u_i^Y + u_j^X + u_k^Z + u_{ik}^{YZ}$	60.57	10	.000
[XZ][Y]	$u + u_i^Y + u_j^X + u_k^Z + u_{jk}^{XZ}$	24.02	8	.002
[Y][X][Z]	$u + u_i^Y + u_j^X + u_k^Z$	71.34	12	.000
[Y][X]	$u + u_i^Y + u_j^X$	132.39	14	.000
[Y][Z]	$u + u_i^Y + u_k^Z$	100.38	14	.000
[X][Z]	$u + u_j^X + u_k^Z$	82.35	13	.000
[Y]	$u + u_i^Y$	161.40	16	.000
[X]	$u + u_j^X$	143.26	15	.000
[Z]	$u + u_k^Z$	111.25	15	.000

是對現代化程度中等的人而言，心理上的衝突較大，不易適應。此項假設有待進一步的剖析。我們在這裡，利用林憲（1970）的資料重做分析以澄清此項關係的部份特性。

在林憲的研究中，計有生理心理疾病反應、傳統價值與接觸現代生活的程度等三個主要變項。生理心理疾病反應是依變項，由Cornell Medical Index測得。林憲的主要結論有兩點：1 與現代生活的接觸有益於心理衛生，2 與現代生活接觸少而較少肯定傳統價值者易有較高的心理生理疾病反應。第一個結論與 Inkeles 等人及楊國樞等人的發現是很相似的。簡言之，即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個人，心理健康狀況較好。不過，林憲的第二個結論却似乎很特別，也與個人現代性研究的發現相互矛盾。依林氏的說法，傳統價值的保有配合與現代生活的高度接觸應有益於個人的心理健康。不過，若仔細檢討傳統價值與現代生活接觸程度兩個主要指標，我們發現前述的結論很成問題。所謂的現代生活接觸程度實際上似乎是在測度社會經濟地位。在十一個項目中，有八個項目是在測量個人的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家庭設備。而這些項目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都是用來測度社會經濟地位的。林氏的意思是說擁有某些現代的家庭設備，即真與現代生活有所接觸。例如以抽水馬桶之有無來區分現代生活接觸的程度。由於“現代”一辭價值色彩很濃，同時這八個項目是否真正可以代表“現代生活”的接觸也很有問題。換言之，經濟狀況的改善可以讓人們擁有較好的家庭設備、受較好的教育，但並不一定就能使人在生活上現代化。既使有“現代化”的傾向，也只是表面的。社會地位的高低也不一定是現代生活的一個指標，因為傳統社會裡過着“傳統”生活的人也有地位高的。因此，我們似可將這項指標改稱為社會經濟地位。其次，林氏的傳統價值指標定義也十分狹窄，大致上測度的是對中醫的看法、宗教信仰、語言、及家庭結構。而其中以第一類佔多數。於是，在解釋林氏的結論時就必須十分謹慎。

在原先的研究中，林憲的結論主要依據的是敘述性統計的證據，這多少受當時所能運用方法的限制。也因此，他的結論值得再加以推敲，例如兩個自變項的效果

可能並不純淨，而兩者的互動效應之有無也未予以統計檢定。我們現在可以利用 log-linear 分析法，對這個問題重新檢討。在表四中，我們列出林憲的原始資料。表五則是利用 log-linear 模式所得之結果。

首先，我們檢定傳統價值的影響。當我們比較下列三對模式時（〔XZ〕〔Y〕與〔YX〕〔XZ〕；〔YZ〕〔X〕與〔YX〕〔YZ〕；〔Y〕〔X〕〔Z〕與〔YX〕〔Z〕），發現卡方差為2.63，自由度為2，統計上顯示並無意義。也就是說這種傳統價值對心理健康之好壞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其次，就社會經濟地位的效果而論，在比較〔YX〕〔Z〕與〔YX〕〔YZ〕，〔XZ〕〔Y〕與〔YZ〕〔XZ〕，〔Y〕〔X〕〔Z〕與〔YZ〕〔X〕三對模式後，發現卡方差為10.80，自由度為2。此項卡方差極具統計顯著性（ $p < .001$ ）。於是，我們可以下結論說：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的心理健康有顯著的影響。具體而言，社會經濟地位高者生理心理疾病反應較少，僅佔36%，而社經地位中等與低等者反應較多，其比例分別為52%與49%。

最後，就兩個自變項的互動效應而論，統計檢定的結果否定了林憲原先的第二個結論。換言之，所謂「與現代生活接觸少而傳統價值弱者」心理健康較差的說法並未獲得支持。既使有此傾向，但不顯著。這項互動效應的檢定似比較〔YXZ〕與〔YX〕〔YZ〕〔XZ〕所得。兩模式的卡方差為8.18，自由度為4， p 值大於.05。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影響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是社經地位，與現代化與傳統價值的堅持與否並無明確的關係。這也就和前述批評個人現代性研究的說法相互一致。也使得我們對所謂個人現代化會促成良好的心理適應的說法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到此為止，我們發現在個人的層面上，社會變遷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並不是很顯著的。若跳到社會層面，說社會的現代化有助於心理健康那就更沒有根據了。

討論與結論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討論一些有關社會變遷中心理指標的理論及方法問題。原則

上，我們認為社會指標大約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稱之為社會進步指標（social vindicator），另一類是社會警惕指標（social indictor）。一般而論，以往研究社會指標的學者多傾向於一面倒，有的全部研究可以代表社會進步的有關指標的，有的則側重不良社會現象的測度。其中又以強調社會“進步”者居多。使得社會指標的研究較少有警惕的意味。正如 Biderman（19）所說：

目前我們所能得到的統計指標很多（也很含混）。這種多而含混的統計資料使得双方的學者可以為自己的論點找到看似足夠的證據。双方學者所研究的指標可以稱之為“社會進步指標”與“社會警惕指標（p. 78）”。

所謂的社會進步指標是指專門顯示社會正面性質的指標，如教育成長、國民所得、機會均等、衛生改善等。在另一方面，所謂的社會警惕指標則主要在顯示社會負面的現象，例如犯罪率、失業率、離婚率、心理疾病等。在本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序論裡所揭示的問題——社會變遷對個人的心理衛生是好是壞——實際上也是研究人員所採用不同的指標所造成的。根據心理疾病罹患率所得的社會層面的指標乃是一種“社會警惕指標”，它顯示了快速的社會變遷可能對人們的心理造成不良的影響。在另一方面，個人現代性量表乃是一種“社會進步指標”，指出在現代化過程裡人們傾向於愈來愈擁有現代社會所欲求的特質。於是個人現代性的學者就強調，心理衛生不只因現代化而受到傷害，相反的，反而因現代化而得以改進。這種有問題的說法又牽涉到本文所探索的另一主題，也就是分析層面的不當移轉導致錯誤的結論。也就是說，既使是在個人的層面，個人在態度上的現代化程度與心理健康成正相關，也並不足以支持社會現代化對個人心理適應有助益的說法。

由於心理疾病罹患率是社會層面的指標，那麼當我們聲稱，社會的快速變遷會造成社會上心理疾病罹患率升高時，並沒有在分析層次上作任何的變更，其結論自然就沒有所謂的“區位性誤失”（ecological fallacy）〔Robinson 1950, Langbein and Lichtnan 1978〕。換言之，我們在下結論時並未從區位性，即社會層面的，資料來推斷個人層面的狀況。相反的，從個人現代性與心理健康有正相

關而推論出社會現代化對個人有助益的說法却犯了與“區位性誤失”相對的“個人性誤失”(individual fallacy)了。簡單地說，從社會層面的分析推論個人層面固然有誤失，而從個人層面的狀況推斷社會層面的情形也是不對的。

以本研究的一些證據而言，一方面，在個人層面上所發現的一些結果並不支持現代化有益心理健康的說法；另一方面，個人現代性研究者企圖由此而強調現代化的正面效益更是犯了“個人性誤失”的錯誤。日益增高的心理疾病罹患率說明了，在快速變遷的社會裡，愈來愈多的“現代人”會有心理方面的困擾。這裡所謂的“現代人”是指全體生活在目前這個社會裡的人。從個人層面所得的資料，我們充其量只能說那些心理有困擾的人在態度上比較不那麼現代化，然而隨着“現代化”的進行，這一類人的數目却愈來愈多。換言之，從整個社會而言，“現代化”帶來了更多的心理病患，個人在態度價值上的現代化可能有助於減少得病的可能性。然而，這種個人層面的證據却又相當薄弱。所以，就現有的證據，我們只能說社會變遷會對人們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本研究所依據資料的一些缺點。首先，官方統計資料的信度可能有問題，因為各項報告並未說明資料收集及處理方式，同時也有些數據不全。其中台北市市立醫療機構的心理疾病罹患人數應作進一步的檢討。其次，罹患率的增加也可能受病院設備及其他社會服務改善的影響。在澄清罹患率升高之因素時，似應將這些可能變數加入分析才較為合理，但目前尚未能收集到這方面的材料。最後，由於許多資料均是二手的，在分析及討論過程中受到了相當的限制，許多地方都是牽就這有限限制性的資料而做有限度的推論，這方面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加以充實。

參考書目

林 憲

1976: 精神醫學與社會。台北：現代醫學出版社。

楊國樞、瞿海源

1975: 「中國“人”的現代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7: 1~38。

台北市政府

1977: 台北市統計要覽。

瞿海源

1976: 「岩村居民的社會態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42: 97~118。

瞿海源、文崇一

1975: 「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變遷」, 思與言 12(5): 1~14。

瞿海源、楊國樞

1972: 「中國大學生個人現代性與心理需要」, 李亦園、楊國樞編, 中國人的性格。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Armer, M. J.

1970: "Form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alaise in an African societ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3(2): 143-58.

Bauer, R. A. (ed.)

1966: *Social Indicators*. Cambridge: MIT Press.

Berger, P., B. Berger and H. Kellner

1974: *The Homeless Mi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Biderman, A. D.

1966: "Social indicators and goals." in R. A. Bauer (ed.) *Social Indicators*. Cambridge: MIT Press

Braverman, 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Burckhardt, J.

1945: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Oxford: Phaidon Press.

Cattell, R.

1956: "Second-order personality factors in the questionnaire realm." reprint in Cattell, R. B. e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San Diego: Robert R. Knapp.

Chu, H. M.

1972: "Migration and mental disorders in Taiwan. In Lebra, W. P. (ed.) *Transcultural Research in Mental Health*.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Dawson, J. L. M., H. Law, Al Leung, and R. W. Whitney

1971: "Scaling Chinese traditional-modern attitude and the G. S. R. measurement of 'important' versus 'unimportant' Chinese concep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1): 1-28.

Durkheim, E.

1951: *Suicide* New York: Free Press

Fromm, E.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Grasmick, H. G.

1973: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sm in the American Sout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16(6): 913-33

Hagen, E. E.

1962: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mewood, Ill.: Dorsey

- Inkeles, A.
1966: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 in Weiner, M. (ed.)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Individual modernity in different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data from a six-nation stud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285:539-64
- Inkeles, A. and D. H. Smith
1974: *Becoming Moder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ersonal adjustment and modernization." in C. A. DeVos ed. *Responses to Change*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 Klineberg, S. L.
1974: "Parents, schools and modernity." in A. Inkeles and D. B. Holsinger (éds.)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Modern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eiden: E. J. Brill
- Laing, R. D.
1966: *The Divided Self*.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 Langbein, L. I. and A. J. Lichtman
1978: *Ecological Inference*. Beverly Hills: Sage
-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Lin, T., H. Rin, E. K. Yeh, C. C. Hsu, and H. M. Chu
1969: "Mental disorders in Taiwan, fifteen years later." in W. Caudill and T. Lin (eds.)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 McClelland, D. C.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 Nisbet, R.
1976: *Sociology as an Art 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
- Portes, A.
1973: "The factorial structure of modernity: empirical replication and a critique." *AJS* 79(1): 15-44
- Riesman, D. with N. Glazer and R. Denney
1953: *The Lonely Crowd*. New York: Doubleday
- Rin, H.
1970: "On the epidemiological study in mental diseases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J. F. M. A.* 69(3): 1-19
- Slater, P.
1971: *The Pursuit of Loniness*. Boston: Beacon
- Ullmann, L. P. and L. Krasner
1972: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Abnormal Behavior*.
- Vigderhous, G.
1978: "Forecasting sociological phenomenena: application of Box-Jenkins methodology to suicide rat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78: 20-51

高承恕評述

(評瞿海源博士：On Some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簡要提出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至於論文中好的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關於個人和社會這兩個不同的分析層次；另外，瞿博士把辯護性與批判性這兩類區分出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可作為我們今天社會指標討論的參考，因為時間的限制，今天也就不多說。

接著我想提出三個問題：

(1) 瞿先生談到社會變遷和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的時候，用社會變遷這個概念來解釋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質，在研究上可能會因而產生困難，因為所謂「社會變遷」的概念是相當籠統，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內容，而在不同的階段與情況下，所謂變遷只能說是從某一個狀態變到另外一個狀態，在這種情形下來談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與變遷，似乎並不很合適。從 theory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的觀點來看，有很多時候並不是變遷本身造成這些後果，而是這個社會的人，在那些特殊情況下對變遷所作的看法，這些變遷可能帶來了某些改變，同時也改變了他們的某些期望，形成期望與實際間代溝增加，導致挫折感與心理狀況的改變，而造成了心理疾病；換句話說，變遷本身不見得會真的產生影響，還要經過社會裡的人，看他們本身是如何來看這個變遷；這是我覺得須要加以界定清楚的地方，比籠統地使用「變遷」有意義得多。

(2) 瞿博士文章裡也提到社會指標勢必牽涉到社會變遷以及變遷的方向，所以也就關聯到一般所謂現代化的問題。我覺得文中有待澄清的是關於 modernity 和 modern man 的所謂個人現代性問題，瞿博士似乎有把 Inkeles 西方學者的界定視為理所當然；譬如文中第十二頁提到 modernity concept，包括了 citizenship rationality, secularism,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independence from family, and receptivity to change，這幾個概念皆是引用了 Inkeles 他們所做出來的結果；假如我們仔細地想想這些內容，或則大家回頭讀一下西方中古以來的幾百年歷史，我不否認這些個理念在今日的世界中具有某種的普遍性。但是我們要警惕這些概念的根基是由西方的歷史文化所引申出來，而社會科學（包括 Inkeles，在內）常有一個毛病，就是在談這些問題時，沒有擺回西方的脈絡來講，反而傾向於把這些西方的標準、普遍化；像我們在這兒講到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在西方世界中還是相當被爭論的觀點，所以西方的現代化是否如同所謂的世俗化過程，恐怕還是很值得斟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若是如此界定「現代化」，然後去量度，去做為指標的建構，可能在基本的概念上就有某種程度的偏差，特別是在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社會上，去做這樣的量度或是計算相關時，在第一步的概念上就可能有相當大的困難。因為這些個理念可以說是深植於西方現代中、小生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雖然有可能在其他的社會裡存有普遍性，但是這種的普遍性，不能視之為當然，這是我所要特別強調的。至於陳昭南先生早上提到的實證主義，我個人有些不同的看法，像我提到的 modernity 和 modern man 等等概念上的問題，是不能也無法用運作的定律來解決的，這不是實證方法論所能達到的，我想這個問題，沒有時間多談，不遍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這幾年在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這些領域的發展，K. Hempel 的理論不但不是沒有問題，甚至是有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理所當然地接受下來，基礎本身也就不穩固。

(3)我想對於社會指標問題的探討，不能只偏限在量度、運作上等技術性的發展。假如我們憑著學術良知來面對社會指標建構，希望能對這個社會有所貢獻的話，我想應不只是單純的社會學問題，或是技術上、計劃上的問題，而應涉及理論、歷史和哲學各方面的知識，否則我們可能只能在信度上有所把握，對於效度就無法掌握了。

社會經濟地位與消費型態*

王湘雲 陳寬政 蔡吉源

一、前 言

社會指標 (Social Indicator) 的定義有很多種，但經常使用的一種定義則主張社會指標是一個社會或團體的福利或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 的量度。這個量度可以用來比較不同時期的生活品質，以判定社會變遷的方向，也可以用來測量不同社會的發展程度。雖然社會指標是生活品質的量度，但選擇何種變數做為社會指標以測量生活品質則一向是個困難的問題。即使平均國民所得只是一個經濟指標，但由於經濟學家的提倡，許多人認為平均國民所得 (Per Capita Income) 仍不妨作為社會指標的一種。然而最近 Pyatt (1979: 31) 指出，福利經濟理論通常假定效用 (Utility) 導自消費，而非導自所得。也就是說，儘管消費與所得之間有函數關係，用前者來測度生活品質是比後者更為直接妥當。本文以消費支出為社會指標的一種，檢討消費型態因社會經濟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不

*本文承麥朝成教授提供修改意見，行政院主計處概允使用 1976 年家計調查完整資料，陳美珠小姐協助程式設計及資料處理，姚麗香小姐悉心整理及抄寫文稿，中央研究院資訊所電算中心提供設備及專業服務，特此一併致謝。

同而變異的性質，進而指出社會經濟地位分析對社會指標研究的重要性。

Ramsey (1974) 認為，美國學者提出的社會指標（如 Social Indicators 1976）大都以年齡、性別及種族為區別團體生活型態的依據，而歐洲資料則傾向於社會經濟地位類別（如社會階級、社會團體、或職業等）的考慮。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指標的配合運用可以較深入地描述社會發展的過程，如 Ramsey (1974: 47) 所說，「如果職業分配，各種職業類別的相對位置、生產力、或聲望差異等結構發生變化」，則社會指標應能指出變化的方向與結果。Pyatt (1979: 30-34) 不但認為國民會計制度應以消費為測度生活品質的指數，而且進一步主張以社會經濟地位為分解消費指數的依據。

本文以社會經濟地位與消費型態的關係為分析的主題，先介紹各種有關消費型態的經濟學理論，然後討論所使用的資料及樣本，接著根據資料戶長於調查時的教育程度、所得、就業與否、職業及行業來定義其社會經濟地位。最後，我們使用迴歸分析方法估計並比較社會經濟地位的分組消費函數，期能有助於對消費型態的瞭解，使我們能進一步發展一個有意義的社會指標。

二、理論的討論

1. 消費函數

以經濟學的觀點而言，消費（Consumption）的定義是一戶（Household）對非耐久性財貨及勞務（Non-Durables）的支出，加上耐久財（Durables）當年所提供的服務價值。也就是說，對耐久財（如汽車）的支出不能算是當年的消費支出，但此類耐久財於當年內所提供的服務則屬消費的一種。消費上的支出與其他經濟變數，如所得（Income），財富（Wealth），及生活水準（Standard of Living）等有關，所謂的消費函數（Consumption Function）就是把這些關係用一個等式來表示。在經濟學的理論中，至少有四個有關消費函數的假設，其中之一是 Keynes (1936) 的絕對所得假說（Absolute-Income Hypothesis），包括

以下三項命題：(1)真實消費 (Real Consumption) 是真實所得的一個穩定函數，(2)邊際消費傾向 (MPC) 大於0但小於1，(3)平均消費傾向 (APC) 大於邊際消費傾向，而且因所得增加而降低。如用數學方式來說明，則個人的消費函數關係可以下列等式表示：

$$1. \quad C_t = C_0 + C_1 y_t,$$

C_t 是個別消費者在當年(t)的消費支出額， y_t 是當年的所得額， C_0 是截距 (Intercept)。當 $y_t = 0$ 時， $C_t = C_0$ ，

$$2. \quad C_1 = \frac{\partial C_t}{\partial Y_t} = \text{MPC},$$

$$3. \quad \frac{C_t}{y_t} = \frac{C_0}{y_t} + C_1 = \frac{C_0}{y_t} + \text{MPC} = \text{APC},$$

等式 3 指出，有錢人的平均消費傾向低於窮人的平均消費傾向。換句話說，無論其教育及職業為何，富人都比窮人有較高的平均儲蓄傾向。同時，Keynes 的假設著重短期的靜態分析，而忽視了長期的動態分析。

第二種消費函數係由Duesenberry(1949)提出，稱為相對所得假說 (Relative-Income Hypothesis)。這個假說主張消費者的消費或儲蓄決定於其相對所得的觀念，而非絕對所得。一個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佔所得之比率是當年所得對其過去的最高所得之比率的函數，則相對所得的消費函數為：

$$4. \quad \frac{C_t}{y_t} = b_0 + b_1 \frac{y_t}{y_t^*},$$

C_t 是當年 (t) 的消費額， y_t 是所得額， y_t^* 為當年以前的所有所得中最高的所得額， b_0 及 b_1 則為此函數關係中的二個係數。由於個人所得 y_t 在個人有生之年 ($t = 0, 1, 2, \dots, T$) 會因商業週期而上下變動，式 4 所表示的平均消費傾向 APC (即 C_t/y_t) 亦因時而不同，而且與個人過去的社會地位有關。如果定義 y_t^* 為一種地位指數，式 4 顯然表示個人消費額與其社會地位間的關係。從Duesenberry的

研究，我們可以取得兩項結論：(1)此種動態分析比絕對所得假說能對消費行為提供較週全的說明，(2)相對所得假說可以充分說明 Kuznets (1946) 的長期資料與 Duesenberry 的短期資料間的差別，但不能說明戰前及戰後消費型態的轉變。

第三種消費函數是 Friedman (1957) 所提出的恒常所得假說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以恒常消費來定義一個消費單位的消費，則消費為恒常所得的函數，其函數關係如下：

$$5 \quad C_p = k(i, w, A) y_p = k(i, w, A) i v,$$

C_p 代表恒常消費， y_p 為恒常所得， i 為利率， w 為財富對恒常所得的比例， v 為財富及才能的總值。 A 表示能影響無異曲綫 (Indifference Curve) 的其他因素，如消費嗜好與習慣、年齡及家庭組成等等。 k 表示恒常所得 y_p 中用做消費的比例，其值因 i ， w ，及 A 值而不同。 w 越高表示消費者愈富有，越不須要保存財產以應不時之需，可以預期富有的消費者有較高的消費額。個人在任一時期的所得 y 及消費 C 可以定義為：

$$6 \quad y = y_p + y_r, \quad C = C_p + C_r,$$

y_r 及 C_r 分別為暫時性的 (Transitory) 所得及消費。恒常所得假說包括下面四項假定：(1) y_p 及 y_r 互不相關，(2) C_p 及 C_r 互不相關，(3) y_r 及 C_r 互不相關，及 (4) y_p 及 C_p 的理論平均值均為零。這些假定中，以第三項最具爭論性。楊雅惠 (1980) 以台灣的資料做實證指出，意外收入常使節省的人們消費增加，所以 y_r 及 C_r 是互相關聯的。

第四種消費函數稱為生命週期假說 (Life-Cycle Hypothesis)，由 Ando 和 Modigliani (1963) 所提出。此一假說主張年齡是決定消費函數的一個重要變數，則消費函數應該具備一個年齡結構。一般而言，個人進入勞力市場最初數年的所得較少，以後則所得與社會地位均因教育、訓練與工作經驗之累積而逐年上升。到年邁退休之際，所得又復次第減少。既然所得因年齡而有變化，可預期個人將其消費量針對目前及未來的所得與財富而做一妥善的安排。例如，個人可能在青壯年時

期多儲蓄，以備老年退休後的醫藥及娛樂所需。一個理性的消費者的平均消費傾向在年齡上呈穩定上升的趨勢，不理性的消費者則傾向於較不規則的變動。由於消費支出可以形成相當穩定的年齡函數，個人的消費函數可以表示為：

$$8 \quad C_t = \alpha v_t, \text{ 而}$$

$$9 \quad v_t = y_t^L + \sum_{i=1}^T \frac{y_t^L}{(1+r)^i} + A_0,$$

α 是一個常數， v_t 是當年 (t) 所計算的一生所可能有的財力與能力總值。 y_t^L 表示當年的勞動所得， y_t^L 則表示於當年勞動所得所預期的未來所得， T 是個人的預期壽命所餘年數， r 是所得折扣率， A_0 為當年的財產淨值。所以，個人的消費函數是：

$$10 \quad C_t = \alpha \left[y_t^L + \sum_{i=1}^T \frac{y_t^L}{(1+r)^i} + A_0 \right]。$$

換句話說，個人在任一年 (t) 的消費額與其(1)當年所得 y_t^L ，(2)當年年初財富 A_0 ，及(3)未來預期所得 $\sum_{i=1}^T \frac{y_t^L}{(1+r)^i}$ 形成綫性函數。

生命週期假說之主要缺點在於它假設當年勞動所得變動會引起預期的未來勞動所得做同一方向的變動。一旦當年勞動所得變動是暫時性的，則此一函數將無法派上用場。

綜觀上述四種消費行為之假說，吾人發現教育年數 (Years of Schooling) 及職業等在消費函數中被忽略了。然而，在所有的消費理論裡，除了絕對所得假說外，都意含社會經濟地位對消費支出的重要性。相對所得假說主張個人消費支出受他過去所曾有的最高所得的影響；而最高所得又與其所曾有的最高社會經濟地位有密切關係。恒常所得假說顯示在決定消費行為時，個人過去累積之人力財富 (Human Wealth) (筆者按，指知識技術等) 與非人力財富 (Nonhuman Wealth)

具有相當影響力。恒常所得與個人一生的地位有關；同時，恒常所得假說主張消費與個人的嗜好、年齡及家庭組織相關。社會學的研究也顯示所有這些變數與社會經濟地位十分吻合。生命週期假說主張消費支出受消費者、財產價值、當年勞動所得及未來預期總勞動所得的影響，這些因素也涉及他的社會經濟地位。事實上，生命週期假說之缺陷是可以修正的，吾人可以假設預期之未來勞動所得取決於消費者當前之社會經濟地位而非當前勞動所得。因為當前社會經濟地位比當前勞動所得在預期未來勞動所得時更穩定，也更可靠，因此增加生命週期假說之價值。然而這些消費理論在建構消費函數時雖曾意含社會經濟地位之重要性，却無一真正將社會經濟地位列為一個變數。此外，這些理論假定同一消費函數可以應用到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組群，吾人認為這種假定是很有問題的。

2. 社會經濟地位與消費型態

許多社會學研究曾表示個人之態度、希望及行為常受其同輩或相關組群的人所影響（Sewell and Hauser, 1975）。其中最有名的研究是 Stouffer（1949）針對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士氣之探討。在他發現實際的研究結果都不能證實他的命題之後，他提出「參考團體」（Reference Group）及「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兩個概念。例如，他認為受教育較多的人比受教育較少的人更不願被徵召入伍，然而經驗資料却與此主張相反。使用「參考團體」及「相對剝奪」的概念，此一現象乃可理解。因為受教育較少的人之朋輩亦受較少教育，他們大部分可能是生產線上的工人及農人，由於他們的工作在戰爭期間被認為對國家的利益很重要，可免於徵召入伍，所以受教育較少的士兵在將自己與其朋輩相比之下，往往自認為比受教育較多的士兵易受歧視（Stouffer et al., 1949: 127）。同理，我們可預期人們有以自己的生活素質與其朋輩相比較的傾向，而且個人的消費偏好也將強烈地受同一社會經濟地位組群的偏好所影響。

雖然消費函數曾忽視社會經濟地位之重要性，但有些經濟學家已經注意到消費

需求受流行 (Bandwagon)、鄙夷 (Snob)、及范伯倫 (Veblen) 效果的社會性影響 (Leibenstein, 1950)。流行效果指對某物品之需求增加，係因眾人消費該物品。它反應出購買該物品的欲望只是要「與眾相同」，以便與他所希望參與的組群表徵相一致，或跟上「時代潮流」。流行效果通常發生在同一地位組群內。例如，牛仔褲在學生中十分普遍，而進口名牌汽車則為資本家所喜好。

鄙夷效果指對某物品之需求因他人消費同一物品而減少，這反應出消費者想顯示「與眾不同」。鄙夷效果在不同地位組群間發生作用，特別是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消費者對地位低的人所消費的物品所持之態度尤為顯著。結果，這種效果也將增加同一組群內的消費一致性。

范伯倫效果指某些消費物品的需求因價格奇高而增加，被定義為眩示性消費 (Conspicuous Consumption)。眩示性消費意謂著消費者本身之炫耀心理，例如影星往往付極高之價格購買大鑽石以為炫耀。

因此，我們可將消費品區別為由一群社經地位相同的人所消費的地位財 (Status Goods)，及所有不同組群所必需消費的普通財 (Ordinary Goods)。一般而言，同一地位組群的消費者除普通財外，還試圖繼續消費更多的地位財以改善其生活素質。也就是說，消費者在所得及財富之限制下試圖儘力擴大其消費的效用 (Utility)。在同一社經地位組群內，個別消費者之間的滿足水準 (即效用) 也相互影響。因此，我們可定義某一地位組群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如下式：

$$\begin{aligned}
 \text{ii. } \quad U_{ik} &= U_{ik} [C_{1k} (X_{1k}), C_{2k} (X_{2k}), \dots, C_{ik} (X_{ik}), \\
 &\quad \dots, C_{nk} (X_{nk}) ; Y_i, W_i | \bar{E}_k, \bar{J}_k, \bar{Y}_k] \\
 &\quad i = 1, 2, \dots, n \qquad k = 1, 2, \dots, m
 \end{aligned}$$

上式 X_{ik} 表示 k 組內第 i 個消費者所消費之財貨；

C_{ik} 表示 k 組內第 i 個消費者對 X_{ik} 之消費支出；

Y_i 即 i 的當年所得；

W_i 即 i 的當年財富；

\bar{E}_k 即 k 組內成員之平均教育年數；

\bar{J}_k 即 k 組內成員之平均行業、從業身份及職位；

\bar{Y}_k 即 k 組內成員之平均所得。

我們假設高社經地位組群內的個人比低社經地位之個人有較多的消費支出。出。

$$\text{令 } C_k = \sum_{i=1}^n C_{ik} / n$$

為 k 組成員之平均消費水準，則為 11 式可寫成：

$$12 \quad U_{ik} = U_{ik} (C_{ik} (X_{ik}) ; \bar{C}_k, Y_{ik}, W_{ik} | \bar{E}_k, \bar{J}_k, \bar{Y}_k)$$

\bar{C}_k 與 k 組群內當年平均所得 \bar{Y}_k 相關、因為 \bar{C}_k 與 \bar{Y}_k 具有單調轉換 (monotonic transformation) 之關係，所以我們可在效用函數裡以 \bar{Y}_k 代替 \bar{C}_k ，以解釋流行效果及鄙夷效果，得下式：

$$13 \quad U_{ik} = U_{ik} (C_{ik} (X_{ik}) ; \bar{Y}_k, Y_{ik}, W_{ik} | \bar{E}_k, \bar{J}_k, \bar{Y}_k)$$

一般而言，

$$14 \quad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 0$$

$$15 \quad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Y_{ik}} =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cdot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Y_{ik}} > 0, \quad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W_{ik}} =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cdot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W_{ik}} > 0,$$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bar{Y}_k} =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cdot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Y}_k} > 0, \quad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bar{E}_k} =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cdot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E}_k} > 0,$$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bar{J}_k} =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cdot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J}_k} > 0。$$

14 及 15 式暗示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Y_{ik}}$ ，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W_{ik}}$ ，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E}_k}$ ，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J}_k}$ ，及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Y}_k}$ 均為正值。因

此，我們可依照教育年數、職業及所得為指標，將消費者區分為不同之社經組群，即以社經指標 (Socioeconomic Index) $SEI_k (\bar{E}_k, \bar{J}_k, \bar{Y}_k)$ 作為消費函數之變數而說明消費行為。我們假設消費組群之 SEI 愈高，其消費支出也愈大。因此我們提出一個個別消費單位 (家戶) 的「社會經濟地位消費函數」(Socioeconomic Status Consumption Function)，其式如下：

$$16. \quad C_{ik} = f \left[\bar{Y}_{.k}, Y_{ik}, W_{ik}; SEI \left(\bar{E}_{.k}, \bar{J}_{.k}, \bar{Y}_{.k} \right) \right]$$

更確切地說，則 $C_{ik} = f \left[(Y_{ik} - \bar{Y}_{.k}), W_{ik}; SEI (E_{.k}, J_{.k}, Y_{.k}) \right]$ ，等式中的家戶所得是依個別的家戶所得與地位組群平均所得之間的差異來測量。我們相信在估計家戶消費量方面，以此等所得差異來測量將比絕對所得來得好，因為流行效果及鄙夷效果均可能使人們的消費量受他們的地位組群中其他消費者的影響。人們的消費量受他們的地位組群中其他消費者的影響。

三、資 料

本研究使用1976年台灣省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此調查從1964年起兩年舉行一次，而從1971年起則每年舉行一次。我們的研究選擇1976年的資料，並非有理論上或統計上的因素存在，而只因為這是我們機構中存入電算機的第一份完整資料。我們從行政院主計處取得1976年家庭收支調查的磁帶，此調查樣本包括9,442個家戶及其中49,507名個人資料。資料是由台灣全體戶母體中利用分層分區隨機抽樣法 (Stratified-Cluster Sampling) 抽取樣本而得。母體共有21個縣市，分為三個層次：台北市、其他市和縣。分別在每一層中隨機抽取鄉鎮市區的樣本，然後再由每一抽取出的鄉鎮市區中隨機抽取樣本戶。

由於我們所關心的只是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每戶的總收入與支出，所以我們從整個資料中取出9,442戶的戶資料檔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而暫不處理個人資料。在我們的研究資料中，有兩戶沒有戶長，35戶的戶長年齡未滿二十歲，781戶的戶長是女性，753戶的戶長從事無酬勞務。我們的分析將這些家庭除外後，這份實證報告內容包括7,871戶（佔樣本戶的83%）的資料排比，這些戶的戶長均為20歲以上的男性，而且均從事於有報酬的職業。

本研究的應變數是消費支出。我們合計整個戶內所有成員一年中對非耐久財的消費支出及耐久財的設算勞務價值而得到戶的總支出。主要的自變數是所得、財富和社會經濟地位。所得的計算是合計全戶所有成員一年之中的工資所得、產業業主

所得、財產所得和移轉所得而來。一切所得是以新台幣元為計算單位，財富係合計全戶的金融性和非金融性資產而得。在此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們的樣本戶中，有些戶的財富可能是負數。

一戶的社會經濟地位之組成要素包括：戶長的教育程度、薪資、以及他目前工作的職業、行業和從業身份。工資所得 (Wage Income) 及營業所得視為戶長的薪資 (Earnings)，教育程度是以戶長受學校教育的年數來決定。職業可分為九類：(1) 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2) 行政及主管人員，(3) 監督及佐理人員，(4) 買賣工作人員，(5) 服務工作者，(6) 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7) 生產及有關人員，(8) 運輸設備操作工作者，及(9) 體力工作者；行業也可劃分為九類：(1) 農林漁牧狩獵業，(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3) 製造業，(4) 水電煤氣業，(5) 營造業，(6) 商業，(7)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8) 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與(9) 社會團體及個人服務業。最後，從業身分則視戶長為受雇者、雇主、或自營業主而定。

四、資料分析

我們首先將樣本依戶長之社會經濟地位分組，然後在各組內計算消費對所得和財富的迴歸函數。最後，為了檢驗「社會經濟地位的消費函數」，將這些分組的迴歸方程式與沒有分組的總迴歸方程式相比較。

1. 社會經濟地位組羣

有一點應該注意的是家戶的社會經濟地位是以戶長的地位來定義的。而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 SEI_k (\bar{E}_k , \bar{J}_k , \bar{Y}_k) 是決定於他的教育，薪資，以及他目前工作的從業身份、行業和職位。我們所分析的 7,871 位戶長中，有 239 位是雇主，4,673 位是受雇者，和 2,959 位自營業主者。雇主平均有 8.13 年的教育及新台幣 165,805 元的年薪，受雇者平均有 8.98 年的教育及新台幣 88,031 元的年薪，而自營業主則有 5.73 年的教育和新台幣 74,356 元的年薪。由此可見企業的所有

權對所得的重要性 (Wright, 1978; Kalleberg 和 Griffin, 1980)。此外，我們發現教育年數、薪資、從業身份、行業、和職業使家戶的社會經濟地位構成相當複雜的分配狀況。

表一為戶長職業、行業和從業身份的分佈。有59%的戶長是商業和政府的雇員，我們發現三個變項的交叉表對於家庭社會經濟組群的鑒別很有用。雇員以資本家為主，我們預期他們將有高薪資：66%的雇員是製造業和營造業的所有者，且其中的73%位於主管人員和買賣工作人員的地位。至於受雇者，我們預期發現職業及教育程度有密切關聯，但可能由於社會發展期間行業間不平衡的發展而造成行業間的薪資差異。在自營業主中，則62%為農人而其餘的是小企業的所有者。由於表一中有許多數字小於5，可能造成不可靠的統計數，因此有必要再縮減樣本數。在排除這些「少次數」的小格 (Cells) 及其戶數後，共剩下7,700戶作為下述分析 (樣本的82%) 的基礎。

我們計算出表一內每一小格中的戶長們的平均薪資和平均教育，也就是將具有相同類型職位 (有相同職業、行業、及從業身份) 的戶長們的薪資和教育累加起來，而分別計算其平均數。然後根據每類職業的平均教育和平均薪資繪成圖一，每類職位以一個英文字母和兩位阿拉伯數字代表之。英文字母代表從業身份：「A」為雇員，「B」為受雇者，「C」為自營業主。阿拉伯數字的十位數代表行業的類別，而個位數是職業分類，分類數字之詳釋見表一。

圖一顯示出特定的職位組群，我們依之將戶長的工作劃分為四個社會經濟地位組群。換句話說，在各個社經地位組群裡戶長的工作具有同樣的社會和經濟地位，而其工作的社會地位是依該類工作者的平均教育來測量，其工作的經濟地位則由該類工作者的平均薪資來評定。總樣本的教育和薪資平均數各為7.7年和新台幣85,467元。圖一顯示，在眾多工作中分四個組群，其分界綫分別為9.24年的學校教育和新台幣111,107元的年薪或新台幣9,259元的月薪。

雖然組群是基於平均教育和平均薪資而劃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組群中

表一 從業身份、行業和職業；20歲~64歲，
在參與勞動力的有酬職業中之男性戶長

N = 7,871

A: 雇 主

行 業	職 業									Sum
	Prf. (1)	Mng. (2)	Clr. (3)	Sal. (4)	Swk. (5)	Agr. (6)	Muw. (7)	Top. (8)	Lab. (9)	
(1) Agr.						14				14
(2) Min.										0
(3) Muw.	1	49	1	22			9			82
(4) Ele.		1					1			2
(5) Con.	1	12	1	2	1		5			22
(6) Sal.		16	1	57	1					75
(7) Trp.		5		1				2		8
(8) Fin.	3	3		2						8
(9) Ser.	8	4		1	9		4		2	28
Sum	13	90	3	85	11	14	19	2	2	239

B: 受雇者

行 業	職 業									Sum
	Prf. (1)	Mng. (2)	Clr. (3)	Sal. (4)	Swk. (5)	Agr. (6)	Muw. (7)	Top. (8)	Lab. (9)	
(1) Agr.	1		4		2	320	2	1	2	332
(2) Min.	4	7	9		1		121	5	7	154
(3) Muw.	60	116	235	30	35	3	756	44	58	1337
(4) Ele.	17	2	30		3		37	1	8	98
(5) Con.	20	16	22	2	2		325	5	129	521
(6) Sal.	4	55	46	70	35		23	4	7	244
(7) Trp.	29	22	166	8	25		28	270	60	608
(8) Fin.	8	27	96	5	7		1	4	4	152
(9) Ser.	378	44	429	2	244	2	46	29	53	1227
Sum	521	289	1037	117	354	325	1339	363	328	4673

表一 (續)

N = 7,871

C:自營作業者

行 業	職 業									Sum
	Prf. (1)	Mng. (2)	Clr. (3)	Sal. (4)	Swk. (5)	Agr. (6)	Muw. (7)	Top. (8)	Lab. (9)	
(1) Agr.						1833				1833
(2) Min.							1			1
(3) Muw.		12	2	38	1		51		1	105
(4) Ele.				3	1		1			5
(5) Con.	1	1		2	1		16		5	26
(6) Sal.	5	4		739	33		2		2	785
(7) Trp.				5	1		1	63	4	74
(8) Fin.	5		2	9	4		1			21
(9) Ser.	34	1	1	10	36		23	1	3	109
Sum	45	18	5	806	77	1833	96	64	15	2959

註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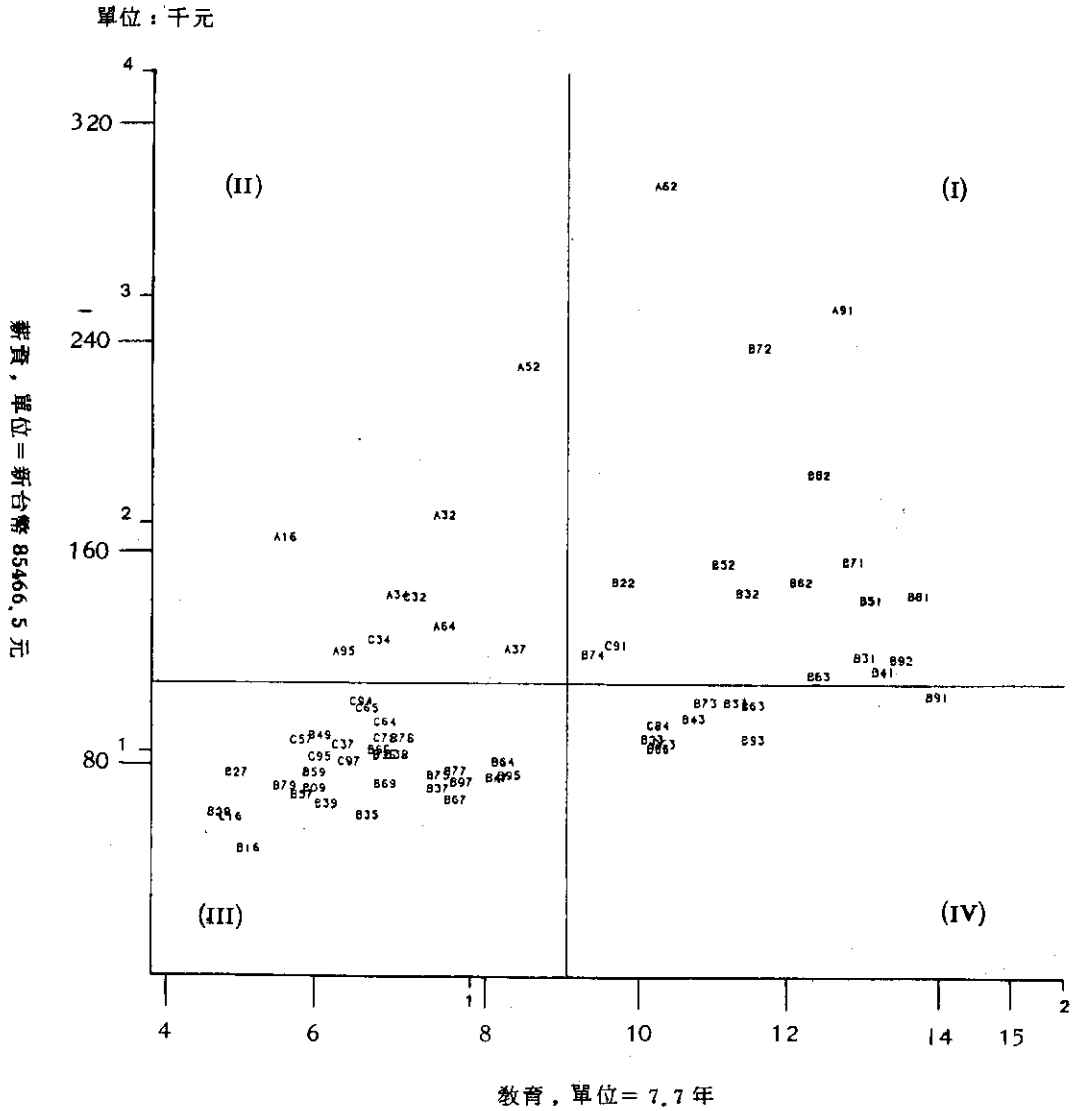
行 業 別:

- (1) Agr.: 農林漁牧狩獵業
- (2) Min.: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3) Muw.: 製造業
- (4) Ele.: 水電煤氣業
- (5) Con.: 營造業
- (6) Sal.: 商 業
- (7) Trp.: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 (8) Fin.: 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 (9) Ser.: 社會團體及個人服務業

職 業 別:

- (1) Prf.: 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
- (2) Mng.: 行政及主管人員
- (3) Clr.: 監督及佐理人員
- (4) Sal.: 買賣工作人員
- (5) Swk.: 服務工作者
- (6) Agr.: 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
- (7) Muw.: 生產及有關工人
- (8) Top.: 運輸設備操作工
- (9) Lab.: 體力工作人員

圖一：社會經濟地位組群



註：大寫字母，A、B、C分別代表雇主、受雇者、和自營作業者的地位。字母後的第一位阿拉伯數字代表行業別，第二位阿拉伯數字代表職業別。請參考表一之行業及職業分類。

的從業身份、行業、和職業顯然也很有意思。很明顯的，第一象限內(I)大部分似乎是擔任專門性職業和主管職務的受雇者，他們可稱為較高的白領階層，這一類內的唯一例外是任職為主管和專業人員的企業雇主。第二象限(Ⅱ)大部份由製造業和營造業的所有者及地主所構成，他們主要是這社會的資本家。第三象限(Ⅲ)則集合自營業主、小買賣者、農場雇工、農人、製造業和營造業的工人、商店出納員等。第四象限(Ⅳ)則以監督及佐理人員、和商業機構辦事員等較低的白領階層為主。簡言之，各個社經地位組群內的戶長顯然在教育、薪資、和從業身份、行業及職業方面都很相似。

2. 社會經濟地位組群的消費量

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到的，每個消費單位的「社經地位消費函數」可以下列等式：

$$C_{ik} = f \left[(Y_{ik} - \bar{Y}_k), W_{ik}; SEI(\bar{E}_k, \bar{J}_k, \bar{Y}_k) \right]$$

表示一個家戶的總消費量是該家戶的所得、財富、及其社經地位之函數。我們假設同一社經地位組群內的家戶將有相似的消費型態，而不同的社經地位組群的家戶消費型態則將是不同的。但在本研究中，我們先將資料依照各戶長的教育、薪資、及其工作的從業身份、行業和職業區分為四個社經地位組群後，才進行消費型態的分析。而資料一經分組後，在每一組群內計算迴歸時，我們無形中即已將社經地位 $SEI(\bar{E}_k, \bar{J}_k, \bar{Y}_k)$ 及每組的平均薪資 \bar{Y}_k 控制為常數，故可將此兩數從等式中省略掉，於是各組內則只須將家庭消費量對家庭收入與財富計算迴歸，等式可改寫為

$$C_{ik} = g_k (Y_{ik}, W_{ik})$$

而每一等式中的 k 則是常數。例如，第一組的等式為

$$C_{i1} = g_1 (Y_{i1}, W_{i1})。$$

四個組群的迴歸分析列於表2 上面部分。

表二 社經地位組群的消費函數估計

社經地位組群	常 數	所 得 (Y)	財 富 (W)	R ²	
I	迴 歸 係 數	2.7092	0.6687*	0.0149	0.8739
	標 準 誤		0.0197	0.0049	
	標 準 化 係 數		0.8729	0.0779	
II	迴 歸 係 數	4.0110	0.5983*	-0.0031	0.6768
	標 準 誤		0.0287	-0.0146	
	標 準 化 係 數		0.8246	-0.0084	
III	迴 歸 係 數	2.1979	0.6594**	-0.0522	0.6317
	標 準 誤		0.0068	0.0044	
	標 準 化 係 數		0.8114	0.0999	
IV	迴 歸 係 數	2.2407	0.6970*	-0.0536	0.7500
	標 準 誤		0.0111	0.0087	
	標 準 化 係 數		0.8961	-0.0873	
<u>所有組群</u>					
	迴 歸 係 數	1.9983	0.6812**	0.0011	0.7633
	標 準 誤		0.0051	0.0021	
	標 準 化 係 數		0.8719	0.0034	

** 0.01 顯著度

* 0.05 顯著度

然後，為測出「社經地位消費」這一概念的正確性，以最後分析樣本全部7,700戶估計總迴歸式，列於表二的下面部分。

從表二，我們發現R在所有迴歸式中都相當高，從 .63到 .87。換句話說，消費量的變異數中百分之六十三至八十七可以用我們的模型來解釋。最低的 R^2 (=.63)是屬於第三組的，而最高的 R^2 (=.87)屬於第一組群。為了檢驗我們的假設，我們採用 Fisher (1970) 的試驗來比較四個分組的迴歸和總迴歸解釋力之間的差異。我們發現如此算出的F比率($F_{3,7697} = 32.313$)達到小於.01的顯著程度，這表示在不同社經組群間的消費型態有顯著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別估計不同社經組群的個別消費函數。

在表二裡，我們發現家戶所得的迴歸係數在所有迴歸式中都是顯著的；而財富的迴歸係數則無一顯著。這可能要歸咎於有關財富的調查資料不可靠，也可能是財富測量的效度(Validity)問題所引起。甚至在經濟學家之間，對於財富的定義仍尚未有一致的看法。無論如何，這顯示我們的家戶財富對家戶消費量不是一個好的預測項。最重要的，這意謂著我們的模型之解釋力可全部歸因於家戶所得。

比較所得的迴歸係數，我們發現所有的組群係數似乎和總樣本的係數有些不同。第四組教育高而所得低者的係數較總樣本為高，而其餘各組的係數均較整體為低，此外，表二也指出各種社經地位組群的消費函數中的截距(Intercept)有不同於總樣本者。這些都指出對不同地位組群做個別的迴歸估計是比較適當的。

令人注意的是兩個一致地位的(Consistent Status)團體，即教育高而富有者(第I組)和教育低而貧窮者(第III組)，其係數是相似的。亦即上上和低下地位的組群似有相同的邊際消費傾向。這兩組消費量上的真正區別在於等式中的常數項不同。雖然兩個組群消費函數的斜率相似，故兩迴歸綫平行，但他們是在兩個不同的層次，第一組的消費量據較高層，而第三組與其他組相較則是最低層的。

至於第二組和第四組在地位上不一致，他們有兩個極端的斜率。第二組(教育低而富有者)雖有最高的截距表示炫耀性的消費，却有最低的係數表示資本家的行

為習性。相反地，第四組（教育高而貧窮者）的迴歸係數則是最高的，意即當他們在所得上有所增加時，則消遣量也隨之有不成比例的增多。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示範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之表現，貧窮而教育高者渴望有機會消費與那些教育高而富有者所消費的同地位財，一旦他們所得增加，他們很快地抓住消費的機會。

五、檢 討

我們的研究發現社經組群的迴歸模型比使用整體迴歸模型有更高的解釋能力。同時，社經組群的迴歸模型因各組群的基本消費量（ C_0 ）及邊際消費傾向（ C_1 ）之變異而顯示消費型態的社會經濟意義。比較各組的截距，我們發現基本消費量依〔Ⅲ，Ⅲ，Ⅰ，Ⅱ〕的順序而增加，若將此順序重組為〔（Ⅲ，Ⅲ），（Ⅰ，Ⅱ）〕的形式，則圖一指出這個順序只是高所得組群（Ⅰ，Ⅱ）的基本消費量大於低所得組群（Ⅲ，Ⅲ）的基本消費量所形成的關係形式。此一因所得階序而致之差異性基本消費量，可以歸屬為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

但是，比較各組的迴歸係數，我們又發現邊際消費傾向依〔Ⅱ，Ⅲ，Ⅰ，Ⅲ〕的順序而升高，若重新安排為〔（Ⅱ，Ⅲ），（Ⅰ，Ⅲ）〕的形式，則表示教育程度較低的組群（Ⅱ，Ⅲ）其邊際消費傾向亦低於教育程度較高的組群（Ⅰ，Ⅲ）。此種因教育程度階序而致之差異性邊際消費傾向，我們將之歸屬為教育效果（Education Effect）。教育程度差異可能導致不同的階層意識或消費偏好，而反映於消費傾向的差異上。

為了進一步討論所得與教育效果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我們在上述的中括號及小括號符號設計之外，再加一個箭頭符號表示所得（或教育）階序內的教育（或所得）階序。例如，在邊際消費傾向所形成的教育階序〔（Ⅱ，Ⅲ），（Ⅰ，Ⅲ）〕中，我們將之再安排為〔（Ⅱ←Ⅲ），（Ⅰ←Ⅲ）〕的形式，表示在同一個教育程度分組內的所得階序。顯然，消費傾向的教育階序內包含著同向的所得效果，所得高則邊際消費傾向低。也就是說，雖然教育程度高則邊際消費傾向高，但在既定的教育

水準上，所得高則邊際消費傾向低。不同的教育程度似乎代表不同的消費規範，低所得者受到這些規範所驅使，企圖以較高的邊際投入來滿足規範性的消費。

但是，基本消費量的所得階序〔(Ⅲ→Ⅲ)，(Ⅰ←Ⅱ)〕內，教育效果就顯得互相矛盾了。對於低所得組群(Ⅲ，Ⅲ)，而言，教育程度高則基本消費量高；對於高所得組群(Ⅰ，Ⅱ)而言，則教育程度高反而基本消費量低。我們認為，若以高教育程度組群(Ⅰ，Ⅲ)代表都市的中產白領階層，其基本消費量較低於大部由富有的企業雇主所組成的第Ⅱ組群，似乎表示著消費能力的基本差別，而其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則似乎表現類似焦慮的消費型態。另一方面，雖然第Ⅱ及第Ⅲ組群(大部由農工商的小雇主、自營業主及勞力工作者組成)分別佔據基本消費量的大小兩端，其消費傾向相對於高教育組群(Ⅰ，Ⅲ)顯得較為保守與溫和，也涵蘊著較高的儲蓄率。做為本文的結論，我們認為，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性消費型態值得進一步的考察與說明。我們的資料不但暗示著消費型態的社會階層，而且似乎指出不同階層間的競爭與示範效果。

參考文獻

- Ando, A., and F. Modigliani
1963: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ggregate Implications and Tests Pp. 55-84 AER
- Duesenberry, J.
1949: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er, Franklin*
1970: Test of Equality Between Sets of Coefficients in Two Linear Regressions: An Expository Note
Econometrica, Vol. 38, No. 2 (March): 361-366
- Friedman, M.
1957: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lleberg, Arne L. and Larry J. Griffin
1980: Class, Occupation, and Inequality in Job Rew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January): 731-68
- Keynes, J. M.

-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haps 7-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Kuznets, S.
1946: *National Product Since 1869*
New York :
- Leibenstein H.
1950: *Bandwageon, Snob and Beblen Effects in the Theory of Consumers' Demand*
QJE (May): 183-207
- Pyatt, Graham
1979: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of Measuring Living Standards or How Do We Find out Who Is Benefiting from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a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
Manila, Philippines December 1979
- Ramsey, Natalie R.
1974: *Social Indicators in the U.S. and Europe: Comments on Five Country Reports in Van Dusen (ed) Social Indicators 1973: A Review Symposium*
- Sewell, William H., Robert M. Hauser
1975: *Education, Occupation, & Earnings — A Chievement in the Early Caree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touffer, Samuel A. et al.,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l. 1
- Wright, E.
1978: *Race, Clas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May): 1368-97
- Yang, Ya-Hwei
1980: *A Study on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and Its Implication in Taiwan*
Taipei,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 A. Thesis

麥朝成評述

(評王湘雲教授、陳寬政博士、蔡吉源先生: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nsumption)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個人有機會在這兒就這篇論文提出個人的淺見，順便向各位請教，感到非常的榮幸。我想在今天的研討會中，大家都知道社會指標的研究尚無定論。一般研究者，若不是由經濟的角度來看社會指標，就是由社會、心理、文化，或是由環境、政治學等各種不同的層面來分析社會指標，而王教授等三位先生所提的論文中，可以說是屬於結合經濟與社會二方面因素所做的研究，這實在是個很大膽的研究；我所謂很大膽的研究，是因為他們利用經濟學上的消費水準或消費型態為社會指標。我想或許有很多人並不贊同他們的看法，但是王教授也提到，消費才是我們的最後目的，而所得只是一個手段，並不一定能反應我們的福利水準，所以我認為把社會指標數量化，以消費水準來作代表，實在無可厚非。我個人覺得這篇文章的內容很有意義，是一篇相當精彩

的論文，不過我仍然願意就理論及實證分析觀點提出一些意見，向諸位請教。

I. 理論部分：

(1)王教授等人利用 Leibenstein 的 Bandwagon, Snob, and Veblen effects 的概念來解釋所謂的社經地位對消費的影響，我覺得是個非常有趣、新穎的概念；如果能在討論經濟學上的消費時，把 intergroup 與 intragroup 間所謂消費方面的 externality 應用進去，我想可以把更多關於社會方面因素引進消費功能的內容裡。

(2)我覺得在談到社會指標時，關於 age structure、schooling years 或 occupation choice job training，都要涉及到 individual time 的問題（即所謂 life-time cycle）。因此，可以利用芝加哥大學教授 G. Becker 所謂 human capital 的理論，把 time 的概念引進來，那麼這些 age structure 等因素就都可以考慮進去。

(3)個人覺得第八頁理論結構方面，關於第十三、十五、十六，三個方程式的推理還不夠嚴謹。譬如，對於教育與職業對消費的影響為什麼是正的原因，並沒有作合理的解釋；而且在所謂的 socio-economic index 裡面，只考慮到三個因素：education, occupation 和 earnings，雖然也提到 industry 和 employment status 却未能在理論架構上涵蓋進去，因而跟後文的 status study 缺少關聯。

II. 實證分析部分：

(1)這篇論文的結果主要是反應在 Figure 1 和 Table 2，王教授提到他們將之劃分為四個象限，Y 座標代表所得，X 座標代表教育程度，我覺得他們的劃分太過武斷、沒有客觀的標準。譬如在 Figure 1 中，以 schooling years 9.24, earnings 十一萬多為原點的標準是什麼？如此劃分四個象限，似乎太武斷了。

(2) Table 2 的回歸係數中，以 group I 的教育程度與所得最高，group III 是教育程度與所得皆最低，而他們的消費型態明顯地非常類似；同樣地，論文中對於同一群的消費型態為什麼很類似，也缺乏合理的解釋。至於 group II 和 group IV 之間的不一致性也是相當明顯，group II 是所得高、教育程度低，group IV 則是所得低，教育程度高，而對於教育程度和所得如何影響消費，也沒有說明原因。

王教授等人對於高所得、教育程度低的團體消費型態、解釋為：因為教育程度低，而不曉得那裡或是如何消費。我覺得這種解釋不太合理。如果讓我由經濟面做解釋，或許會認為類似西方的工業革命後，group III 的人代表資本家，為了累積資本並擴展業務而必須儲蓄，加上創業艱難，所以當時都習慣於省吃儉用的；因此當他的生活到了一個水準之後，所得增加但消費並不增加，或是消費水準沒有很大的改變，因此我對於王教授等人的解釋不太同意。

(3)他們並沒有解釋在 Figure 1 的個別點裡，同一個 group 裡及四個 groups 之間的關聯，對於整體之間的關聯也沒有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能有些分析，我相信這篇論文將會更加生色。至少這篇文章給了我一個啓示：在研究社會指標時，或許應該結合不同學科的人共同努力，不要有個人的本位主義。謝謝！

綜合評述

吳聰賢：

主席、各位來賓，今天的節目分別為三個單位共同推出青年才俊而成，兄弟非常佩服。剛才是由麥教授批評第三篇論文，所以我想跟着倒順序陳述我個人的看法。

最後一篇由三位先生合作的報告，是關於教育與所得之間的關係，我覺得似乎在理論上也沒有討論到——因為教育的增加而促使所得的減少；也就是說我們受教育越高的人，出來賺錢的時間越短。至於麥教授提到對於四個Social consumption的解釋，我個人是贊同原作者。因為group I 是受過教育而又富有的人（educated rich），他們知道自己有錢可以花，所以會花得多；而group III 是 uneducated poor，沒有什麼錢可供他花，但也因他知道所剩無幾，所以反倒不如儘量花錢，因此這二個一窮一富的團體是花錢花得多的人。各位不妨到夜市場去看看，那些喝燒酒、啤酒的人，都是勞動階級的人，也是屬於group III 的人，他們是因為沒有錢所以儘管花錢；有錢的人也花錢，但他們不在夜市場花，而是在希爾頓飯店花錢，因此我覺得這二類的消費型態一致性的看法是正確的。至於group II 的 uneducated rich，這類人所從事的是有冒險性的職業，像農村裡養鰻魚賺大錢的人，還有那些有很多水田的人，以前是計甲買賣，現在則是計坪買賣因而賺了大錢，這些人不因有錢而花錢，所以不知道如何花錢；group IV 代表今天在座的諸位，教育程度之為高，也預期有足夠的消費方法，可是却没有足夠的錢來花。所以第二、四類的人都屬於不一致的消費型態。

第二篇在瞿海源教授的報告裡提到——工業化或現代化對於Psycho-system的影響是正，也就是說對神經（neurosis）有正的影響，而對精神（psychosis）有負的影響，我想這個現象是相當準確的。但是在這兒我要提出一個疑問，社會心理學或是精神心理學的研究，都是往壞的方面來講，而我們今天討論社會指標，就是如何來改善成好的生活，因此是否能用好的或美麗的名詞來代替 mental disorder；因為對於社會指標，我不太贊成嚴格地區分成兩類，而主張應該是一個函數的兩面，也就是好、不夠好二項，而不是好與不好（或則分裂、完整）二項，這是兄弟對瞿教授的研究報告所提的建議。

最後談 Thelin 教授的報告，謝先生也提到這篇報告並不是專為今天這個場合而準備的，而是一個台中港地區發展的研究計畫，不過他的文章中有二點我特別欣賞，一個是關於社會指標的定義（其實也就是方向），他提到社會指標應該有個方向，也就是一個價值，所以上文中我對翟先生的意見中，才會說到價值應該是正的，應該由好的方面來想；第二個是提到標準指標就是關於 social life，所以說提到我們的社會指標，應該涵蓋生活部分。但是他提到態度在各種時間的測量時，要求二者之間的穩定來代表它的信度的可靠性，我覺得這樣的方法有再探討的必要性；換句話說，態度在不同時間的測量應該有變化才對，而不能說二個不同時間下的態度變化相關係數低，便說它的信度低，如果我没有誤解作者的意思，我覺得態度應該變化才對，也就是說如果根據這樣來測量信度是不可靠的，這是兄弟對 Thelin 教授的建議。

另外，Likert scale 的用法好像不只在計算平均數或百分比，是否可照 Likert scale 的原來用意，以總加量化的 scale，依照總合的讀數來說明台中港地區的現代與傳統尺度。

最後，今天所關心的主題是：社會指標的目的、範圍和測量方法。在三民所陳主任的邀請函裡已提到目的是：

(1) 尋找發展的軌跡。如果沒有指標，我們怎能尋找呢？如果我們走過的路沒有留下痕跡，我們怎麼能夠改善？我覺得尋找發展的過程，一定要有指標。

(2) 觀察發展方向的正確與否？所以要討論評估的標準。

另外我還願意加上二個目的，一是指標，一是溝通的工具；譬如「指標」，我們在課堂上或在這種場合裡提到 consumption region 時，我們知道所指的是那四個象限（如果這已為大家所接受的話），因此這個指標對於我們研究社會行為科學的人是很重要的。談到範圍，我贊成用概括性的，不贊成用列舉性的，因為列舉性的方法非常困難，至於概括性的範圍應該是如何？我覺得凡是能滿足個人需要的指標都應列為社會指標，而什麼是個人的需要，我很難去提出一個界定來；不過 Maslow 提出的幾個心理需求的層次，從基本的 Physical need 一直到 self-actualization，我覺得測量 Maslow 提到的個人需要，是我們社會指標所要發展達成的。因此，社會指標可以說是研究社會生活與關係的既知指向；也因為王湘雲教授提到消費行為受同類團體的影響，所以我覺得只研究社會生活是不太夠，而應該加為研究社會生活與社會關係等既知方向。這是我個人對於社會指標方向所提供的意見。謝謝！

自由發言

瞿海源：

1.對於高先生的意見——做時間序列分析時要多加些變項，使得社會變遷的內涵更清楚；我完全接受。對於目前的論文，可能無法多加修改，因沒有其他可資利用的材料。

2.至於引用 Inkeles 的說法，在以前我是相當贊成測量所謂的現代性，但是現在却極端反對；因為即使是能測出個人的現代性，跟心理衛生的關係却很弱，而即使是承認這樣的關係，也不能認為現代化對心理衛生沒有妨礙。簡而言之，所謂現代性只不過是西方中產階級的價值取向反應而已，因此我覺得不能拿來做為一個很好的指標，同時個人現在也不相信所謂 modern man 的存在。對於吳教授建議採用比較美麗的名詞以表明社會現象，我還是不太同意，因為我認為不可能拿一個比較美麗的名詞，就可以掩蓋住社會上一些不太理想的現象；我們不是要接納社會的壞現象，而是要很嚴肅地正視社會的問題。譬如就心理疾病的增加來說，如果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便不能說建立一個指標名為心理健康指標，然後說現在的心理健狀比較差了，而不說心理疾病罹患率比較高，聽起來便好些；但是我們還是得承認心理疾病在增加，主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也只有較客觀地提出這些現象以後，才能從這些指標裡客觀而有效地解決問題。

王湘雲：

1.對於麥教授講到的年齡結構和在職訓練等與時間及生命週期 (life cycle) 相關的因素，我們都很贊同該被考慮在研究中，事實上這也是我們未來研究的目標。

2.另外，麥教授提到我們理論結構中的社經地位[$SEI(\bar{E}_k, \bar{Y}_k, \bar{O}_k)$]，只考慮到 education, income, 和 occupation, 而未包括行業 (industry) 及從業身份 (employment status)。其實我們是以 " \bar{O}_k " 包括從業身份 (employment status)、行業 (industry) 和職業 (occupation) 三個項目，因一般社會學家用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 時，就常是依照職業、行業及從業身份三種項目來分的，但是為了清楚起見，我們可能是應該再加二個符號以表

示從業身份和行業，或將“ \bar{O}_K ”改為“ \bar{J}_K ”（job），以涵蓋有關工作（job）的職業、行業及從業身份三項目，以免用“ \bar{O}_K ”使人誤以為僅限於職業（occupation）。〔請注意：此文在本刊物中已將“ \bar{O}_K ”改為“ \bar{J}_K ”〕

3. 至於認為我們的分類方式武斷，我們並不完全同意。在看已劃了分界線的「圖一」時，似會覺得分界處的空間並不明顯，但這實在只是眼睛的錯覺，而事實上在沒有劃上線時，是可以看到其間空出明顯的空間的；因此陳教授、蔡教授和我三人分別用眼睛看了工作分佈圖後，都同意在那空間劃上分界線，我們認為這是資料顯示出的自然組群（natural grouping）。

4. 我們也贊同——group II 因創業維艱而沒有花錢的習慣，不改去舊習的說法。不過我認為如說他們是習慣不改，其實跟我們的原來說法也是不謀而合，亦即是說他們不大知道可以到那兒去花錢，及如何花法，因為他們習慣於省吃儉用，從來不亂花費。

郭秋永：

1. 高先生所提到的 C. Hempel，乃是當代頗為著名的方法論學家。他的論點雖然曾在社會科學中引起了某些爭論，但他的地位與成就，是一般方法論學者所公認的，因此，他的論點是否如同高先生所說「有很大的錯誤」，個人覺得實有商榷的餘地。

2. 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高先生是將 C. Hempel 視作 Operationist。事實上，1930 年代以來，C. Hempel 在提到 Operationism 的每篇文章中，都持批評的態度，因此將他歸類為 Operationist，並不太恰當。

3. 當高先生在批評瞿先生的大作時，提到現代性、世俗化等定義，不能完全採用西方人的標準，順帶地指責了 C. Hempel。我想 C. Hempel 並不是粗略的經驗主義者，因為在很多文章裏，他強調社會科學中的語詞界定方式，勢須特別著重 explicative definition 不可。這就是說，所界定的語詞，乃是日常談論中其意義多少有點混淆的語詞，而界定的目的，乃在於將一個新的、精確的意義，賦給這個語詞，俾使正在研究的題材，更適於清晰而嚴格的討論。如此，語詞的界定，將意義分析和經驗分析，結合在一起；它自語詞的習用意義出發，其目的乃在經由一個再闡釋，而來降低語詞之一般用法的限制、歧義、不一致，進而提高其意義的清晰性和精確性，並增進它們在假設或理論中發揮作用的能力。由此看來，現代性、世俗化等語詞，當然未必要按照「西方」學說來定義，但也就因為如此，C. Hempel 的主張並非如高先生所說那樣的膚淺、那樣的囿於「量化」。

蕭新煌：

1. 王教授等三人提到消費可以當成社會指標，而此指標指的是生活品質，不曉得這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因為消費是相當客觀的，花了多少便是多少，如何能知道消費者是否滿足呢？這之間的信度又在那兒呢？是不是說花錢較多的人，他的生活品質便較高？而就這樣的品質管制去分出品質的好與壞，高與低？不知王教授等的推論方向是不是這樣？

2. 社經地位也是相當客觀的事項，但在談到社經地位時，似乎還該重視主觀的感覺；譬如我是一個教育很高的窮書生，但是我是否一定會跟同樣受高等教育，收入低的 group IV 認同呢？是不

是也該先徵求一下我的意見，才能把我歸為 group IV 呢？

總而言之，這二者之間可能都有一點主觀的指標須要留意，不知三位的意思如何？

王湘雲：

1. 蕭教授提到關於「主觀」的問題，可能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去探討的，不過一來限於目前沒有主觀的資料，二來蕭教授談到為什麼消費可以表示生活品質？我倒是要反問：「為什麼不可以？」因為假使「生活品質」是表示可以享受到一些東西，而能使你的生理、心理需求有所滿足，尤其是生理上的需求，那是一定得要有消費支出才能得到的。而心理上的需求也常受消費的影響，我想大家都曾有過這種心理滿足的經驗，當買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後，常常會覺得心理很舒服，所以「主觀」的考慮雖是有其必要性，但我們也不能否認一些客觀指標的重要性。

2. 至於提到社經地位，是否也要考慮「主觀」的感覺，在理論上，主觀的社經地位似乎是有其重要性的。不過在我所知道的很多研究裡，往往發現並不是主觀的社經地位，而是客觀的社經地位對一個人的態度及行為較有影響力，這大概是因為如果人們放棄客觀的標準而直接測量主觀的社經地位，其測量的信度與效度往往都易偏低之故。

程光薇：

「生活品質」在定義上是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人將之定義為 *suspicion*，有些人則講實際生活上的經驗，所以只是看個人怎樣去定義而已。另外提到「主觀」與「客觀」的分辨，已經有很多學者表示：「主觀」與「客觀」的相互關係並不高；所以有些行為態度可能是受客觀的影響較大，有些則較受主觀影響（尤其在心理層面上），我不曉得這樣的意見是否能回答蕭先生的問題。

瞿海源：

早上蕭教授提到反對浪費能源的主張，好像和王教授等人現在所提的說法完全相反。目前在社會現代化或個人現代化上，往往把「消費」當作是一個「現代化」的指標。但是我們似乎可以把這種行為說成西方的個人主義與中產階級意識的反應，若是放到我們的社會則可能變為強調不良的浪費傾向（假如說得嚴重些）。所以，我們應該檢討是否可以拿消費來當作是一個很好的指標？甚至應該把消費當作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指標！像有錢的人拼命花錢過奢侈的生活，這算不算是該鼓勵的消費呢？所以我個人覺得反而是第二類的人來得可愛，因為他的錢很可能是拿去投資，而不是任意花掉了；而我以為消費在所扮演的角色應該重新估定，不能隨着西方社會盲進。

楊孝濬：

我覺得今天下午的討論較偏重測度性（像剛剛瞿先生與高先生提出的觀念），我個人以為尤其是在消費的研究過程中，必須要注意到每個人是有限的，因此在消費的研究中，或許在測度過程中

不要定出極低值，而是定出個限度範圍，超過這個限度可能就是個下降值。社會指標不是一個單項的測度，而是一個多項的測度，若超過某一個限度時，或許就會形成剛剛瞿先生所謂的浪費。從下午這三篇報告到社會指標測度過程中，假如我們都能夠把某些基本觀念或文化、資源因素放入，才能測出一個範圍出來，而不是簡單地以越多越好，或是越少越好表示之，這樣或許在以後測度過程當中會比較理想。我對今天下午的報告覺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我們自己被王教授歸為第四類，我覺得我們或許也可以看看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或任何的一個社會裡，似乎知識水準很高的人知道如何對社會有所貢獻，但是事實上，社會所給他的地位與影響力的測度是比較低的。王教授等人是把消費行為做為測度用，但甚至把任何變項放在這裡，可能第四類的測度都很小；譬如講到社會影響力，可能也會發現第四類人的測度很低，雖然他應該是影響力最大的，而事實上他的影響力却是很小。在這兒幾乎都是學術界的人來參予討論，是不是應該也有其他三個 groups 的人來參加這個研討會，否則社會指標的發展是否會依照今天的討論結果來發展，我看是很值得考慮。

葉啓政：

我覺得根據王教授的分類，我們應該是在第一類。我有個問題想請教王教授（也歸論到我上午所提出來的論點）。我的問題是：坐標的原點是如何定出來的？依據的是什麼？若只是因為根據你們的統計表來判斷，在沒有劃上線的圖上可以看出明顯的空間來，所以便劃出這樣的二條線，委實是太過武斷了，我以為「武斷」至少要在現實世界中代表一種意義（或許你們已在論文中提到），這也就是我上午所提到的，我想一個社會學家在研究一個問題的時候，不要太受制於（毫無理由的）統計資料，而應當有自己的架構或理由、論點來做分類的標準。也就是說或許你們可以以九年做為標準（因為我們的義務教育是九年），或許也可以以十二年做標準，總之，標準何在應有現實意義的考慮為參考。我不曉得你們的看法是怎樣？

蔡吉源：

我一直期待論文裡架構的消費函數，會引起相當大的爭論，但是到目前為止，却只有麥先生提出：為什麼教育與職業會影響消費。我的數學式推論如有不完美的地方，希望各位先進給我意見，以期能加以改進我的式子。

文中第（15）式有關教育及職業對消費的影響現在下列二式：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bar{E}_{\cdot K}} =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E}_{\cdot K}} > 0 \quad \text{以及} \quad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bar{O}_{\cdot K}} =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O}_{\cdot K}} > 0$$

因為 $\frac{\partial U_{IK}}{\partial C_{IK}}$ 一般說來都是正數，所以上式就隱函假設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E}_{\cdot K}}$ 及 $\frac{\partial C_{IK}}{\partial \bar{O}_{\cdot K}}$ 也都為正數。吾人可以

認定受教育是求知的過程所必須，也就是視教育義務為一種殊價財（merit goods），由政府或私人提供以滿足個人的求知慾望，因此教育年限增加將使消費上升。一方面受教育者對消費財有較多的認識，眼界自然漸漸趨高；另一方面，受較多教育的人，已經沒有往昔單食瓢飲的精神，為表示其為曾受較高教育者，其消費型態自然與受較少教育者有所差異，而一般而言，往往是前者消

費較多。關於職業 \bar{O}_K 也一樣。職業有好壞之分，一般的情況是：勞心的職業優於勞力的職業，其職業聲望也比較高而為社會大眾所追求。職業聲望高（ \bar{O}_K 大），也同樣可反應在消費行為上，以顯示其地位。

三、專題演講

社會政策與社會指標之分析： 朝向實踐上的整合

高 菲 立*

Phillip E. Crunk

前 言

就科學知識的發展而言，社會指標還在未成熟的階段。同樣的，政策分析領域的拓展也才開始，離科學性尚遠。當今有一課題：審視此兩領域在整合時，先天上的困難與限制如何突破，以及施行上效益分析的問題。這也是我這篇論文的主要議題。

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早期，社會指標的探討尚在嬰孩階段。各種怪異的指標都被提出來。比如社會會計、社會簿記、各種警示社會變遷的訓誡等等，不一而足。七十年代，社會指標的探討有所突破。那是基於理論取向的改變，或者說是採用了有別於前期的指標發展的結果。十年來，大家已公認社會指標對於幫助人類社會的了解有極大的作用。各位有興，此間有極多的專書討論可供參改，在此不多述。我想我將以如下的綱要作為這篇論文的主要內容。①社會指標的回顧與結論。②政

*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教授

策分析領域的興起以及探討此兩領域可資整合的地方。③探討更進一步的發展及其可能碰到的問題。

社會指標的回顧與結論

目前社會指標的一些結論，在此次研討會上的說明夠多了，想要再做任何的結論都會有掛一漏萬之虞。我謹概要的說明如下，容或不足，尚祈賜正：

①社會指標有其時序性。允許我們做不同階段之間，或是長期趨勢或是短期變動的探討與比較。

②社會指標是一集合體。此集合體能以不同的特性加以切分。如人、種族、地區、容量大小等。

③可依不同觀點而有不同的詮釋：

(a)規範性的觀點：社會指標必須能表顯出社會的價值、理想與社會現存問題的關連。

(b)直接性：社會指標必須能直截的反應社會情況。

(c)指導性：社會指標應具指導社會的作用，不應是價值中立的。至少對存在的現象能把正面、負面的情況結果，陳明清楚。

④社會指標固然有不同的特性，但是其運用却異常廣泛。包括：

(a)改正純粹描述性研究的缺點。

(b)分析社會變遷的依據。

(c)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社會事件。

(d)幫助擬定各種計劃的目標，決定實施步驟的先後順序。

(e)協助社會計劃的評價。

(f)協助發展社會會計式的平衡表（balance Sheet）。

⑤基於理論上的指引，社會指標能整合某些相關的資料，以應付未來的挑戰。如此的發展將提升社會科學的成熟度，更有能力來分析以及批評社會政策的得失，

尋求更美好的決策方針。

⑥著名的社會學家 Philip Hauser 在審視社會指標歷來的發展中指出：未來發展中國家將(1)重視各類統計事務組織的發展。其工作將包括各類社會計劃的量化工作、普查、死亡率、抽樣調查以及行政所需要的各類統計等。(2)統計專員的儲備。(3)發展各種統計計量的技術。(4)協助行政事務更有效率的推展〔註一〕。

⑦近來的發展已逐漸體認本身的限制。由原來拙拙逼人的萬能藥方退回到較中和的態度。特別是在反省方法論上的問題以及在實際問題上多次的經驗累積的結果。假如不再把理論視為現狀唯一指導原則，轉向於把理論和實際觀察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已成為近來熱衷的議題〔註二〕。

⑧社會指標另一重要的發展就是生活品質的探討。這是一項複雜的工作。包括搜集各項民生指標，以一般性的角度來提示社會大眾生活的最低標準，顯現居民生活一般情況（也許祇是研究者主觀的偏見。）實際的例子，如美國華盛頓特區就採用了十八個主要指標來測定生活品質。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採用。一九七七年，這種新取向也擴展到了鄉村地區的研究〔註三〕。Dillman 和 Tremblay 在此項研究中發現鄉村居民對他們「生活品質的評價來得比都市居民高。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環境問題的評分較高所致」。如此的研究已為我們指出了某些社會指標所應發展的方向了。

政策分析的緣起

約在社會指標熱興起的同時，政策分析也應聲而起。我想先討論政策分析然後再集中篇幅在此兩領域的整合工作上。

在美國，政府當局之興趣於社會指標的尋求是因為需要更可靠的資料、消息的掌握來制定決策所致。本來美國總統有負責經濟問題的顧問委員會，但却對社會問題無可奈何。可是要另外設立個社會問題顧問委員會又是不太可能的事。

Harold Lasswell Dror 和其他的學者就另創一研究領域，名之為「政策科學」

。政策分析就是其中的一支。但此時尚在半科學的發展狀態中。

政策分析的主旨，在審視當前的社會問題，或是提出社會未來發展的新方向、新目標，或是修正政策以減輕所產生的社會後果。政策分析家通常選擇如下的管道以協助決策的完成：目標的確定，優先項目的選擇，研究及分析、協調、妥協以謀求折衷方案。但工作的開始可以是由分析社會問題，可也是由一個未定的計劃或需要考核的現存政策來著手。

Heffernan 認為決定社會政策的二項核心因素是政治權力與可資利用的經濟資源^{〔註四〕}。實際決策的考慮則是受著可資利用的資料、信息與各種不同需求之間的抉擇而定。由於決策帶有政治性的色彩，因此，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常是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總之，在衆多政策中，權衡輕重以求最適者，慎密思考以定其可行或不行，是政策分析中主要的核心的問題。

決策時，環繞其旁的因素異常複雜。其過程包括價值與目標的設準、瞭解其他出路的可能結果、適當的研究手段與工具、政治權力、效益分析等等。

Harry Specht 和 Douglas Grant 以精通政策形成的過程有名^{〔註五〕}。底下一表為其精心傑作。說明社會政策的形成過程和應具備的技巧。在每個階段裏，都須要專業上以及制度、組織上的相互配合。就如表中所示，衆多種類的工作員的參與以及從各種不同群體利益的調和，再再要求各方資源的配合運用。但討價還價、妥協的手段則是公認的主要過程。

好的社會決策有那些標準可循呢？Prigmore 和 Atherton 在其討論政策分析和政策形成的書中列了一系列的問題，我以為可以用來作為評價政策的「標準問題」。列示如下：

- ①政策與當前的社會理想、價值相符合嗎？
- ②合法嗎？
- ③可行嗎？
- ④效益如何？

政策形成的階段

階 段	主 要 工 作	可 責 利 用 的 組 織 與 制 度	需 要 的 專 業
(1)確定問題	案例追蹤；記錄；發現公衆服務的缺失；	機 構	專業工作者
(2)分析；收集資料	歸類；分析；概念化；	研究性機構（如大學）	研 究 員
(3)陳述給大衆	宣染；公共關係；大衆傳播；（如撰文、演講）	公共關係單位；溝通管道；志願性結社	新聞記者；社區理事會；公共關係員
(4)構思政策目標	策略的擬定；計劃的設計	計劃委員會；志願性結社	計劃專家；社區理事會；行政員
(5)促成大衆支持	產生領袖人物；達成意見的統一；	志願性結社；政黨；立法與機構委員會	遊說員；社區理事會；公共關係員
(6)促成立法（把計劃合法化）	擬定立法有關文件；撰寫計劃；	立法機構；委員會	法學家；計劃專家
(7)政策的施行	計劃的分工與行政化	法院；機構	行政員；專業工作者；律師
(8)評價、追蹤與考核	案例追蹤；記錄；歸類；公衆服務缺點的發現	機構；研究性的工作團隊	專業工作者；研究員

⑤對其他問題的解決有否幫助？

這幾個問題點出了政策分析的核心概念，提供吾人理性的思考政策分析的基礎。另外，我想社會指標的探討也與上列問題相關聯。底下我們就將焦點轉向社會指標上。

朝向實踐上的整合

近來社會科學每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向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的研究上。成果固然令人讚賞，但是却很少人討論到社會指標與社會政策之間「互動」關係的探討，以澄清此二領域的關係，進而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或許認為兩者之間有密切關聯是我的預設。但是若進一步的思考，則將發現兩者不祇異常緊密而且相互補足，相得益彰之處甚多，甚至還具備某些相同的特點。比如都需要努力於嚴密科學性的目標前進，力求效度與信度的提高。再如採用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彌補本身方法的不足。同是以關懷人類生活的社會面，以探討人與人，人與環境間諸種現象為職志。另外 Philip Hauser 指出，本質上社會指標是深受社會政策所涵蘊的政治因素及價值、理想的影響〔註六〕。

但是最具關鍵性的一點，就是基於事實、資料的社會指標常隱含有指導行動的規範性力量存在。這規範性可化為政策的價值、目標，成為政策分析家所最需要的先驅工作。於此，社會指標可說是政策分析的工具，以協助完善的決策。其理甚明。

但是何謂實踐上的整合呢？一般而言，整合有二種途徑。一種是概念性，理論性的整合。一種就是實踐上的整合。前者從各相關的知識體系之間的鋪排、構思以成就一理論性的架構為鵠的。而後者則是將知識、理論化成可實行的行動。理論成了實務之謂。

實踐上的整合由於含有概念應用的成分，因此就不能免於整合者個人偏誤在裏頭。而社會政策除了有上列的偏誤外，本身也含有政策分析者、評價者的個人因素。我以為有此特點在，要進一步達成實踐上的整合必待某些概念上的澄清後才可能

。而完善的整合尚須借一紡縷式的作用方式，不斷的在實踐上協調、修正。我暫稱它為紡縷式的整合。

紡縷式整合的紡縷有如下幾種：

- ①以巨視社會學的資料為基礎（Macrosociological Data）。
- ②以未來為探討的焦點。能有預測未來的能力。
- ③強調科際之間的合作。

以巨視社會學的資料為基礎

社會指標與政策分析所面對的問題、所涵蓋的範圍就如同巨視社會學所牽涉到的一樣廣泛、複雜。Etzioni 等認為廣體、巨視的社會觀是非常重要的〔註七〕。也唯有如此的資料，才能幫助吾人了解社會變遷的趨勢。這些性質的資料，比如普查、勞動市場統計、以及一般描述社會狀況的資料等等。

政策分析家 Dror 在他的政策科學的發展：概念和應用（一九七一）一書中也強調這一點。他舉了住屋政策和衛生保健政策來說明這之間的關係。

房屋是我們抗狂風、防暴雨的處所。但是住屋政策的重要性並不止於此。住屋會影響到社區發展、幫助社區意識的凝結、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型態，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最大宗支出。用來幫助制定住屋政策的巨視、廣體資料就包括房屋最低成本、維護成本、社會每人平均坪數、家庭組成等等。這些資料能讓我們了解某些現象，並用以幫助制定住屋政策的目標和規制，以減輕住的問題。當然一個完善的住屋計劃還要考慮得更多因素，不過舉一反三，餘可類推。

衛生政策同樣是包羅廣泛，複雜難理的社會問題。需要運用巨視、廣體的資料更見真切。資料除了每十萬人中醫生、護士的比率外、他如人口密度、疾病案例和發生率、可資利用的醫療服務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政策分析家必須盡力的整合這些巨視、廣體的資料，以求現況的了解並將所知貢獻給決策單位，協助制定完善的政策。同時社會指標分析家必須彈力於各種資料

的搜集、澄清社會問題、分析政策、評估政策的效益，使政策能發揮最大的效用，福國利民。

未來主義或先見、預測的取向

社會指標的功能應在教育吾人對未來的演變能充分的瞭解與掌握。就如以社會中年青人、老年人所佔的比例來預測未來社會將會發生的現象，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這些國家如歐洲、美國、日本等，老年人越來越多的現象就使得他的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而這種老年福利比重的加重，不是著眼於眼前的問題，而是決策者將眼光放遠到一九九〇或二〇一〇年代的情況呢！

也就是說社會指標與社會政策分析的整合不以當前問題、解決當前難關為已足。未來可能佔著更重要的分量。在一些未來學的著作上，如Tofler的未來的衝擊等都提出了回顧過去瞻望未來社會的模型。雖然這領域還是在發展中，不過其提出來的預兆却甚值我們注意。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本質還是藝術的，科學祇是人類的一項理想。無論如何，一些吾人信以為真，不自覺而接受的信念，經此一反省，實足發人深省。但重要歸重要，我不打算再費篇幅討論下去。有興者，或可往未來學，社會政策、社會指標三者的整合上走下去。也許時移勢異，台北的第二屆社會指標年會，恐怕會以此為主題也說不定呢！

未來學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指出社會指標與社會政策的整合應以未來為著眼點，是整合紡綫的作用之一。

換言之，短期性的政策、指標已不足應付變遷急劇的現代社會。任何的社會政策都要有前瞻性，都要有未來性。可以說對於工技的發展、現代化的趨勢和社會階級、結構的分化等等，已是社會指標和政策分析所不可少的部分了。

科際之間的合作

科際合作的基礎在於彙集不同學科專才，共同致力於一個或相關聯的問題的探

討。這也是整合紡錘之一。

事實上社會問題的多面性早就有科際合作的必要性。美國Tahoe湖地區計劃局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份文獻摘錄如下：

在Tahoe湖區，由於社會與環境上的交互作用，使得解決問題的方式非以科際合作的方式不為功。在我們的工作範圍內有：高山區植物再生計劃、一般娛樂設備和收容所、改良湖水的品質、政治系統的溝通網絡和社區經濟結構的改善〔註八〕。

諸如此類的問題已超出單一學科應付能力之外。因此，合作，是應付這類問題的唯一武器。

除此而外，至少有二個理由要求社會指標與政策分析要通力合作。第一，兩個領域不祇關聯性高，而且都尚未成為獨立的學科。因此，固然社會學對社會指標的建立有甚大貢獻，但是經濟學家、統計學家、人類學家也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政策分析，從一開頭就視科際合作為其重要環節，無庸贅述了。第二，社會科學以其經驗，越來越相信祇有透過相關學科之間的合作，各自的研究才有可能突破。在自然科學上，比如生物化學、微生物學、核子天文學的開展就是最好的說明了。

結 論

我在此處的努力，是企圖指出一些社會指標與政策分析在運作上或實踐上整合的可能途徑。肯定某些概念、觀點是有利於工作的推行的。但無疑的，此兩領域的理論建構還須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須經由理論的應用、實踐來加強理論的可行性。

巨視社會學的資料、未來學的觀點、科際之間的合作是整合此二領域的關鍵，具有紡錘的作用。當然，其他形式的整合並非不存在。不過我所指出的就是此二領域是互為補足，相互提攜的。

如此的討論不免掛一漏萬，許多的問題還是存在著。這裏再補充說明此二領域

更進一步的整合細節。假如能將社會指標與政策分析連成一貫的作業方式，將可改進政策、決策的速度和效率。但政策分析家如何能夠吸取社會指標、利用社會指標以幫助決策呢？雙方面都要有如下的預備才行：

①雙方要交換的計劃，互相參考的設計與本身的原初理想出入如何？

②計劃施行後，對某些團體的影響如何？對需要幫助的團體助益又有多大？

也就是說方向若往此方向推移，對於社會指標與社會政策分析將更有助益。

另外，當今的發展中的國家，力求經濟快速的成長中，長短期社會政策的施行，對個人、社會價值、理想的影響如何，也是可資探討的方向。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今全般了解社會政策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情形，猶很缺乏系統研究。例如居民從社會政策得到多少的福利？社會政策的有無，對居民福利的影響又有多大？社會政策對改變居民現代化的生活觀又有何影響？諸如此類都甚值研究探討，其對社會的貢獻將是不言而喻，無與量比的。

註 釋

1. Philip Hauser, "Social Accounting," in Lazarsfeld, Paul, *et al.* *The Us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7, p. 869.
2. Anderson, J. G., "Causal Models and Social Indicator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ystems Mode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June, 1973, pps. 285-301.
3. Don Dillman, K. Tremblay, Jr., "The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merican," *Annals*, AAPSS, Vol. 429, 1977, pps. 115-129.
4. W. J. Heffern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elfare Policy: Power, Scarcity and Common Human Needs*, Itasca, Ill.: Peacock Publishers, Inc., 1979, p. 22.
5. Harry Specht and Douglas Grant, "Social Policy Formulation."
6. Philip Hause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Social Indicator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Ill., September, 1971.
7. James S. Coleman, Amitai Etzioni, John Porter, *Macrosociology: Research and Theor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1970, pps. 107-145.

8. James McEvoy III, "Multi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blems of Initiation, Control, Integration and Reward," *Policy Sciences*, Vol. 3, 1972, pps. 201-208.

四、附 錄

一、社會指標研討會會議程序

8:00— 8:30 報 到

8:30 大會主持人陳昭南致詞：社會指標與實證研究

9:00—12:00 第一次討論會

主席：李亦園

綜合評述人：葉啓政

9:00—10:00 論文宣讀

評 述

陸 光：社會指標之介紹、製作與評估

陳 小 紅

賴澤涵：從中國政治哲學思想論我國社會指標的
建立

李 錫 銀

蕭新煌：社會指標與生活素質：回顧和批判

張 曉 春

江玉龍、周碧娥：都市計劃的設計是鄉村發展之
道

廖 正 宏

10:00—10:40 論文評述

10:40—11:00 休 息

11:00—11:20 綜合評述：葉啓政

11:20—12:10 自由發言

12:10— 2:00 午餐（由大會招待午餐）

2:00— 4:30 第二次討論會

主席：文崇一

綜合評述人：吳聰賢

2:00— 2:45 論文宣讀

論文評述

練馬可：一些選擇的社會指標：台中港區發展的
初步比較分析

謝 高 橋

瞿海源：論幾個與社會變遷有關的心理指標

高 承 恕

王湘雲、陳寬政、蔡吉源：社會經濟地位與消費
型態

麥 朝 成

2:45— 3:15 論文評述

3:15— 3:35 綜合評述：吳聰賢

3:35— 3:50 休 息

3:50— 4:30 自由發言

4:30— 5:30 專題演講：

高菲立：社會政策與社會指標之分析：朝向實踐上的
整合

二、研討會出席人員名單

(以姓氏筆劃為序)

- | | |
|-------|---------------------|
| 文 崇 一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 |
| 王 湘 雲 |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傅爾伯萊特訪問教授 |
| 江 玉 龍 |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 李 亦 園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
| 李 錫 錕 |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
| 周 碧 娥 |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
| 吳 聰 賢 | 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教授 |
| 高 承 恕 |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
| 高 菲 立 |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傅爾伯萊特訪問教授 |
| 麥 朝 成 |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
| 陳 小 紅 | 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副教授 |
| 陳 昭 南 |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
| 陳 寬 政 |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
| 張 曉 春 |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 陸 光 |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 |
| 葉 啓 政 |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 練 馬 可 |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

- 廖 正 宏 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蔡 吉 源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
- 謝 高 橋 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副教授
- 瞿 海 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 賴 澤 涵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 蕭 新 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兼行為研究組代主任

INSTITUT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4)

THE FIRST SYMPOSIUM ON SOCIAL INDICATORS

*Sponsored by: Institut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ungha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Time: June 23, 1980

*Place: Seminar Room, Institut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cademia Sinica*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June 1981